

中国经济波动

及其对农村经济的意义

盖保德

卡内及国际和平基金会

刘建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

5 月 2007 年

中国经济波动

及其对农村经济意义



目录

第一章 概论.....	6
第二章 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引论.....	11
A. 主要的宏观经济周期：1978-2005 年	11
1. 国内生产总值的周期：1978-2005 年	11
图 2-1. 国内生产总值的周期：1978-2005 年	12
2. 投资周期：1978-2005 年.....	12
图 2-2. 固定资产周期，1978-2005 年	13
3. 通货膨胀周期：1978-2005 年.....	13
图 2-3：通货膨胀周期：1978-2005 年.....	14
4. 货币供应周期：1978-2005 年.....	14
图 2-4：货币供应周期，1980-2004 年.....	15
B. 结论.....	15
第三章 略论宏观经济周期的因果关系.....	17
A. 处理因果问题的方法.....	17
B. 本文因果分析框架的概述.....	18
图 3-1：货币供应的现金和储蓄波动，1986-96 年	19
C. 实例——解释 1986 到 96 年中国货币供应中的现金波动.....	19
1. 名义存款利率的变化.....	20
图 3-2 现金增长和名义存款利率，1986-96 年	21
2. 受物价膨胀模式影响的实际存款利率.....	21
图 3-3 消费品物价上涨与名义存款利率，1986-96 年	22
图 3-4：得出的实际存款利率，1986-96 年	22
3. “存款保值贴补”	23
图 3-5：实际存款利率对现金（M0）增长的影响，1986-96 年	24
图 3-6：存款保值补贴与有效的实际存款利率	24
图 3-7：有效实际存款利率和现金（M0）增长，1986-96 年	26
4. 国际收支平衡的波动.....	26
图 3-8：外汇储备变化与现金（M0）增长，1986-96 年	27
5. 公开市场业务和政府预算平衡.....	27
D. 因果分析的示意图一览.....	28
第四章 - 国内周期的表面上成因.....	17
A. 财政走向，1978—2005.....	30
图 4-1. 财政预算走向, 1978-2005.....	31
B. 对外贸易，1978—2005.....	31
图 4-2. 中国对外贸易, 1978-2005.....	32
C. 各个波动阶段的明显成因.....	32
1. 1978—1982 周期：后毛泽东时代的支出，农村价格改革和改组.....	33
a) 1978-79 快速增长时期—过渡投资，价格改革及战争	33
b) 1980-82 慢速增长时期—削减预算及抑止投资	35

图 4-3. 1980-82 慢速时期的农村消费	36
2. 1983—1987 周期：土地改革及新工厂管理	37
a) 1983-85 快速时期的成因研究	37
图 4-4. 1980 早期及中期的粮食产量	38
图 4-5. 1979—87 年间的粮食及非粮农业产出增长	39
图 4-6. 1979—87 年间国有银行未偿付净新贷款	40
图 4-7. 1983—87 年间季度性真实利率及流通中现金增长 (M0)	40
b) 1985-87 慢速时期的成因研究	41
图 4-8. 1981-89 季度性工业生产总值真实增长	43
3. 1987-90 周期：通货膨胀，银行恐慌，信贷削减及严重下滑	44
a) 1987-88 快速时期的成因分析	45
图 4-9. 总货币及流通中现金的年度增长	46
b) 1988-90 慢速时期的成因分析	48
4. 1991-2000 周期：城市价格改革，下岗和增长衰退	50
a) 1991-96 快速时期成因分析	50
图 4-10. 1989-2000 年间的粮食价格改革经季节调整后的季度数据	51
图 4-11. 1981-2005 农村农场交易价格的购买力水平	52
图 4-12. 1986-2005 年间国内及外国直接投资对固定投资真实增长的贡献	54
b) 1997-2000 年间慢速增长时期的成因分析	55
图 4-13. 净出口需求*及国内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56
图 4-14. 1979-2005 国内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58
图 4-15. 资本构成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59
图 4-16. 1996-2005 季度存款真实利率	60
图 4-17. 城市、农村及政府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展大贡献*	61
5. 2001-2005：非典型性肺炎（SARS）时期投资繁荣及出口激增	62
图 4-18. 1995-2005 总货币供给及流通中现金的季度增长	67
图 4-19. 1980-2005 净新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68
D. 结论	70
第五章 宏观经济周期与农村经济	71
A. 介绍——四个问题	71
B. 农村经济独立发展的动力	72
1. 中国的粮食周期——充满矛盾的起伏变化	72
图 5-1 与 1985 年种植面积有关的粮食种植周期	73
图 5-2 1978-2005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	74
图 5-3. 不同农产品的净收入（2004）	75
图 5-4 每公顷非粮食农产品的净收入（1990-2004）	76
图 5-5. 政府预算的粮食价格补贴*趋势（1978-2005）	77
图 5-6. 农产品价格的实际*变化（1981-2004）	78
2. 1978 年之后迅猛发展的非农业农村经济	78
图 5-7 农村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	79
图 5-8.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状况（1981-2004）	80
图 5-9. 自筹资金给农村投资带来的实际*增长（1986-2003）	81

3. 结论: 中国的农村经济展示了自我维持的独立性	81
C. 中国的周期性宏观经济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更大么?	83
图 5-10. 农村与城市贸易条件的波动 (1980-2004)	84
图 5-11. 城市和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实际*增长	85
图 5-12. 中国城市人口中的移民大军	86
D. 国家经济发展周期如何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周期?	87
图 5-13. 农村信用社新增净贷款, 1979-2003	89
图 5-14. 农村家庭收入 – 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来源	90
E. 农村经济发展周期如何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周期?	90
图 5-15. 城市和农村*家庭消费实际增长	91
图 5-16. 农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的变化	92
图 5-17. 农村和城市住宅竣工率	93
参考书目	94

第一章 概论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其经济就在“先快后慢”的增长周期中发展。自2001年起至本报告的写作期间，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五个快速发展周期，也是目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发展周期。

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起伏波动，但是在1978-1989年间，其平均年增长速度已开始接近10%，从1990年开始更是达到了10%。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经历的任何一个经济增长周期都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直到80年代中期，农村消费得到了很大的改善，90年代中期保持了适度增长，而到了2005年，农村和城市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基本上又回到了1978年改革以前的水平。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经济增长由快到慢的每一个周期中，城市居民都比农村居民受益更多。周期分析结果显示，刺激经济新周期增长的政策，首先针对的是城市区域。这也表明，当经济过热时，降低或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政策是降低食品价格，通常是强制农民种植更多的低收益农作物。实施这种综合政策除了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到改革前的水平，对过去25年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标准化管理造成了未曾预料到的影响。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还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经济近30年增长成功的原因和机制。本报告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详细原因探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国内。外国的技术和管理通过贸易和外商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但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不同，中国经济由快到慢的增长周期模式与美国经济增长和衰退的周期模式正好相反的。最近，当美国经济处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繁荣中时，中国的GDP支出表明，其经济总体增长正处于1989年政治风波以来的最低潮，而2002年当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期，并引发了东亚国家经济的缓慢增长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却高于2001年，而且是持续性增长——这主要源于国内良好的宏观需求和供应管理。

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不是以出口为导向的，而是由于建立了一个以国内需求为主、更加均衡的需求模式的结果。甚至近年来，与中国在外贸和服务上获得的贸易顺差相比，其国内增长甚至更快，总而言之，更加基本的是优先加强国内需求，刺激出口一直起着补充作用。这个结论对外国政府制订商业战略和与中国谈判是有用的。中国比假想的出口导向增长方式更有优势。

对于中国政策的建议，通过对以往中国经济周期的细致观察，本报告得出中国的政策对中国更好地平衡国内外需求和消费与投资间的关系起到了有益补充的作用。无疑，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的最好方式是整体经济尽可能地持续增长。但是，如果考虑到不

稳定性，特别是粮食产量和食品价格的不稳定，那么，本报告建议减少运用通过对农作物种植的行政压力来控制食品价格的方法。

在这篇报告的准备工作中进行的案例研究为中国农村经济革命的方向及其未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提供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假设。研究人员对两个农业县进行了调研。其中之一是位于中国中南部地区湖南省的一个贫困边远县，是粮食生产基地；另一个是北部地区河南省一个富裕的城郊农业县。湖南省那个边远县的经济特点是农民工大批外出，去其他发达地区打工。这个县外出打工率达到40%。而另外那个富裕的城郊县的经济特点是农业种植多样化，不仅种植粮食，还种植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包括针对出口的农作物。商品性农作物用来为当地私人食品加工企业提供原料，同时，其他农作物，如大蒜，则大批出口到韩国和其他国家。

在相同的政策基础上，上述两个县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成功道路。这些政策基础包括交通、通讯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尽管湖南的那个边远县稍微落后一些，但两个县的教育水平都使得就业具有灵活性，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为农产品走向市场创造了便利条件。不过，便利的交通也使劳动力流向外地市场更加容易。教育和通讯的投资也使这两个县的互联网和其他媒体得到充分利用，特别是为市场和雇员与当地一些加工企业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利。

本报告的分析表明，对于一些紧跟市场发展方向的农民来讲，绝对不会错误的主导潮流，即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开展农作物多样化种植，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亩产净收益。土地显然仍是限制农业种植的因素，而劳动力不是。但是，这个潮流是具有反复性的，并且与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增长周期一致，与粮食库存量不足、粮食价格上涨、普通物价暴涨，以及最终行政部门采取措施强制农民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有关。与这种农作物种植周期现象有关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市场收益在决定食品供应充足或短缺、影响国家食品价格，以及宏观政策调控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从根本上讲，严重限制中国粮食供需的因素并不是对种植面积的限制和粮食亩产收益，而是中国对粮食进口的严格限制。长期以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政策是将粮食进口量限制在国民总消费的5%左右，这使决策者们不得不反复采取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付经济过热——也就是强制农民种植无收益的农作物。

但是，中国的农业安全政策也有其两面性。其一是心理上对国家安全的关切，担忧一旦出现国际危机，美国及其盟友欲对中国施压而采取切断外部粮食供应，中国就会陷入危险脆弱的境地。对此采取的政策措施并不在本报告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即便中国不进口太多的粮食，但传统上却进口农业生产必需的肥料或化肥，所以，这种在国际上的脆弱性已经存在。

其二没有那么明确，但值得一提。中国决策者们不只一次地告诉笔者，中国人口太多，不能依赖外部世界，养活这么庞大的人口。虽然这个说法能够被强烈地感受到，但是却经不起研究。这种关切仍然让人感到早些时候中国决策的余味。那时候，取得外汇是困难的事情，而且外汇主要用来进口稀有物品和引进技术，而不是消费品，特别不是那些可以让农民生产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战略好像是集中投资现代城市建设的同时，延缓抛弃早期政策。在新的时代，当中国对外界开放以后，进口粮食将对农村家庭有所帮助而不是损害，所以，这种总的政策姿态看起来有些滞后，需要重新考虑。

本报告的其余部分不是关于这些政策的结论和建议，而是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周期中各种因素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对农村经济的意义。这个部分有四个附录。

第二章介绍了中国基本经济周期的发展情况。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方法将1978年以来的年份进行分期，但很多指标——例如，GDP增长率、通货膨胀、投资增长及某些货币政策——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将改革以来的时间分为快——慢的周期阶段。本章以一系列图表的方式划分了这些周期，这些图表中的分析数据贯穿在本报告的其余部分。这种方法使我们更加容易对大范围的趋势和波动周期与基本的快——慢次周期进行比较。

第三章介绍了本报告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主要在于弄清引发中国经济周期的原因。报告没有采用大的统计模型作为研究方法，而是采取最基本的方法研究这些问题。本报告在方法上明确承认，没有一个假设或理论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只不过最多可以被证明不是错误的。作为结果，在每一个周期的每一个阶段，方法论给予的都是一种可能的解释，然后，寻求统计指标来证明命题是错误的，或证明不了这个命题的错误性。这些存在的假设被列出来，用以证明可能是某个特殊阶段波动的原因。

第三章也使用了这种方法论，用来作为1986-1995年这十年间，现金流通出现强烈波动的原因的例证（例如M0），这种波动严重地扰乱了中国经济。这种例证有时候变得无聊乏味，其总的作用效果是阐明研究方法，所以在第四章可以被用来作为研究每一个宏观经济周期的比较全面的方法。

第四章系统论述了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周期中的9个次周期，并确定了最有可能引起这些周期的原因。采用的方法是引述中国学者的评论和建议。这些学者参加了本课题第一阶段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两次会议。最强烈的建议是要区别看待每一个周期中的次周期，因为仔细研究之后会发现每个周期都有独特的特性。此外，仔细检视这些短周期，就会发现很多周期缺少季度和月度统计表，这么少的数据点和不可量化的政策干扰只能意味着此项工作把焦点更多的集中在定性的分析上而不是定量分析。然而，这些个案研

究汇总的结论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反映了国内因素比国际因素更加重要。

最后，第五章从第四章的原因分析中得出了关于本报告中四个主要问题的结论。该章还对农村经济周期波动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了背景分析，即中国粮食产出和农村企业在改革头十年里迅速发展的历史。

目前首要的核心问题是，在基本假设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经济在宏观经济中是否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否可以使其发挥独立的作用来影响国家宏观经济模式？结论是，对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情况，回答是否定的。大多数情况下，农村经济对国家决策者造成的周期性影响的反应相对被动的。但是，在1996-1999年，农村经济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正如本报告中的结论一样，它确实表现出自己的特性。1995-1996年，中央政府对信贷采取了严厉措施和经济降温政策后，农村经济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开始了为期3年的增长，其中包括农业和非农企业两个方面。

农村经济的独立快速增长最后被迫停止，其中一个因素是农民再次被迫由种植非农作物转向种植粮食作物。在之后三年的时间里，也就是1997-1999年，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绝对下降。

只有在2000年，粮食种植放宽后，农村消费开始有所恢复。但是，尽管政府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1997-1999年农村物价跌落状况依然持续。

第二个研究的假设问题是，在1978年之后的所有经济周期内，农村经济是不是没有经历比城市更大的波动，这里的答案还是否定的。一个例外就是产品价格和农村-城市之间的贸易。事实上在所有的周期内，农产品价格的上下波动都比工业品价格波动大，而多数工业品是在城市生产的。但是，从其他非价格因素得出的持久性的总结则是，在增长快的经济周期内，城市比农村更加不稳定，也就是说，城市的产品、收入和投资增长更快；而在增长放慢的周期内，农村更加不稳定，也就是说，农村的生产、消费和投资增长更慢。因此，结论就是，总体上农村经济更加不稳定，但在每一个周期的两个阶段（至少1984年以后），农村经济都差一些，结果就会造成我们已经提到的农村-城市消费模式的长期恶化。

第三个研究问题是，国家宏观经济模式的波动是否对农村产生影响？在第四章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大体上说，除了1996-1999年以外，国家政策和经济周期对农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最后，第四个研究问题是，农村经济的独立性是否会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趋势，并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性。结论仍然是肯定的，只有在1996-1999年这个时期，开始时是发挥积极作用，后来发挥消极作用。农村消费者购买城市生产的耐用消费品，以及这些年农村住房的完成情况与第四章的列举的证据联系更加实质。

总之，本报告的分析明确地指出有必要更多的考虑农村经济对制订标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是因为恶化的农村福利对贫困水平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动荡的风险，而是因为农村经济具有的潜力，这种潜力是支撑基于国内高水平消费和投资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巨大力量。

第二章 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引论

自从1978年启动市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一再显现周期性的波动。这些变化的周期表现出明显的统计模式——经济迅速增长，然后是缓慢增长；物价暴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率走低；投资强劲，然后是投资疲软并且伴随着其它各种变量和政策倡议上的周期性波动。这些波动的规律大多数往往趋向一致。通过波动的显著特征，我们可以分析出哪些波动占主导地位并影响其它波动，从而进一步分析出哪些政策可能在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上发挥大的作用。就这方面而言，了解中国正规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周期性互动，对中国决策者所面临的政策制定问题就尤为息息相关。

本章介绍了由1978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数据所展现的最为明显的周期。随后几章将在大体上解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周期，并且诠释全国的经济形势如何影响中国的农村经济，并反之，农村的变化如何能够影响全国的趋势。

A. 主要的宏观经济周期：1978-2005 年

虽然在1978-2005年这个阶段的周期的最开端与最结尾超出了这个时期，但一些统计数据一致显示出这些年间的5个迅速和缓慢的波动周期。将这5个周期的迅速和缓慢的阶段排列如下，附上描述性的简短名称。这份报告划分改革时代的经济周期为：

1. 迅速：1978-79 年，毛泽东后时期的消费和农村价格改革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缓慢：1980-82 年，预算赤字和国际收支的回落
2. 迅速：1983-85 年，农村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贯穿 1985 年夏天）
缓慢：1985-87 年，对工业过热的纠正（贯穿 1987 年夏天）
3. 迅速：1987-88 年，银行恐慌造成的通货膨胀（贯穿 1988 年夏天）
缓慢：1989-90 年，物价稳定计划（直至 1990-91 年冬末）
4. 迅速：1991-96 年，城市价格改革和乡镇企业繁荣
缓慢：1997-00 年，农村家庭消费疲软
5. 迅速：2001-?? 年，“非典”造成的投资热潮（截至 2005 年依然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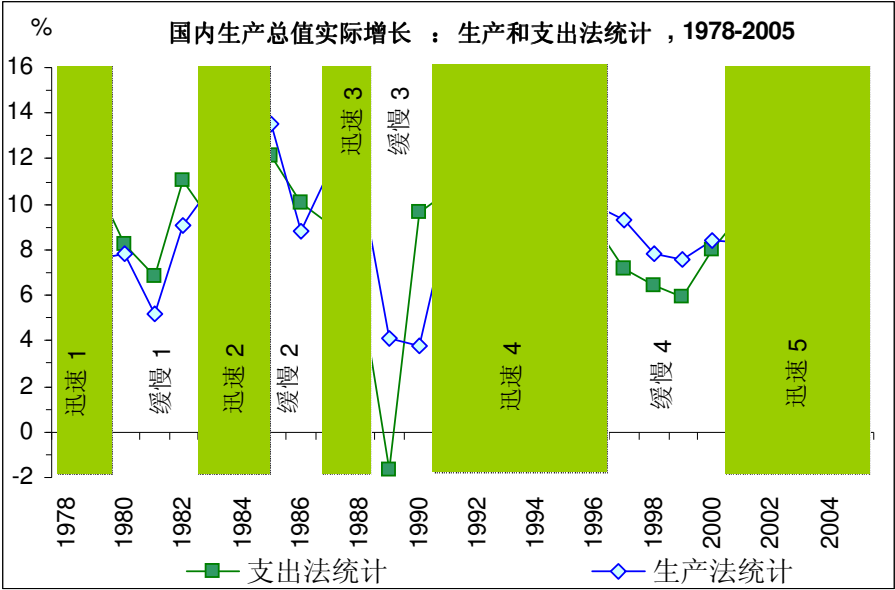
本报告中所有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利用这9个阶段作为参考和坐标轴上的时间段。对大多数周期来说，无论是从城市还是从农村的角度考察，这些阶段都是有益于分析的。一些统计模式与这些阶段并不完全吻合，比如说，通货膨胀的来去比经济增长的变化都要晚一些时间。同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的繁荣时期延伸到长于同一阶段的城市繁荣。但是，将1978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切割为这些时段，更有易于我们分析影响这些周期的因果关系，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

1. 国内生产总值的周期：1978-2005 年

基本的周期度量是国内生产总值。它是最为普遍接受的对一国经济生产成就总量

的测算标准。国内生产总值发展的迅速和缓慢阶段意味着一系列的其它变量，比如新就业岗位的迅速和缓慢形成、生活标准的迅速和缓慢提高、一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和缓慢发展。

图 2-1. 国内生产总值的周期：1978-2005 年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多年，及作者自己的计算

对中国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变化与上面描述的5个周期性阶段密切相符。图1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状况，它根据两种国际上最广为使用的测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展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变化。这两种方法是支出法和生产法。生产法的数据基于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产出，是中国官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些数据最新修正于2005年，而先前年份的数据反映了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的调查结果。

支出法遵循测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国际标准，基于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用途，即家庭消费、政府消费、投资、库存变化和净出口。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名义形式（即包括通货膨胀的影响）公布支出数据，而这里的数据利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标准测算，将名义数据转化为价格不变的增长率。¹这些数据以2004年经济普查为基础，也反映了2006年公布的修正。关于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详细情况，请参见“统计附录”中的表一。

2. 投资周期：1978-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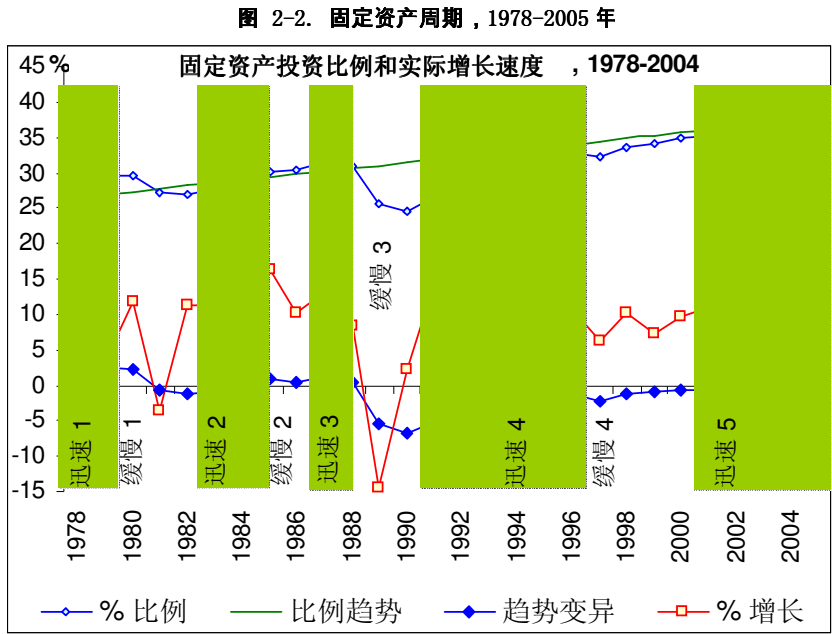
在任何宏观经济的周期当中，投资流动往往是波幅最大的，而中国也不例外。以

¹ 关于这种方法，请参见盖保德（Albert Keidel）……

2004年经济普查为基础，中国最近修正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统计数据证实，投资增长的低迷时期对应于上面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确定的这些周期。对于有数据可以利用的年份来说，图2表明，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投资增长率可以在缓慢增长阶段里下降接近10%或以下，也可以在繁荣时期里剧增到20%以上。

同样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低于30%上升到2005年的40%以上。图2中的趋势线表明了25年间中国投资率的平均线路。“%比例”线表明，实际的比重在这条趋势线上下摆动的状况与中国经济周期同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里，投资率高于趋势，尤其是在2003-05年间；在缓慢增长的阶段里，投资率低于趋势，尤其是在1989-91年间。这种趋势的变化又在图2中由“趋势变异”线表现为零位上下。

这些中国投资的周期性模式，在将周期性效应传递到不同的经济部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报告将会阐明这些周期性模式有时会在农村和城市地区里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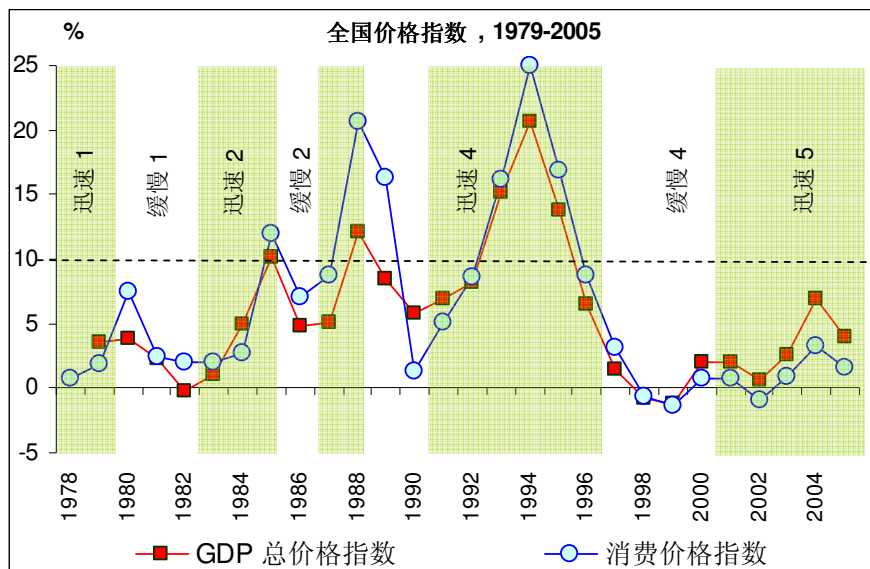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多年，及作者自己的计算

3. 通货膨胀周期：1978-2005 年

当决策者考虑经济波动时，他们对于通货膨胀的关心程度往往不亚于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投资趋势的关注。其重要原因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其它主要的周期指标密切相关，从而增强了这样的信念：对探究中国改革时期的全国和农村发展趋势而言，这些周期模式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手段。

图 2-3：通货膨胀周期：1978-2005 年



注：中国政府并不公布国内生产总值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必须根据真实和名义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的官方数据加以计算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多年，及作者自己的计算

它们往往在那些周期的“迅速”区间的末尾到达。除第一个以外，在这些高位阶段中通货膨胀率都攀升到10%以上，而在1980年的第一个峰值，消费品价格通胀率达到7.5%的水平，惊动了那时的决策者——虽然这个水平按以后的标准说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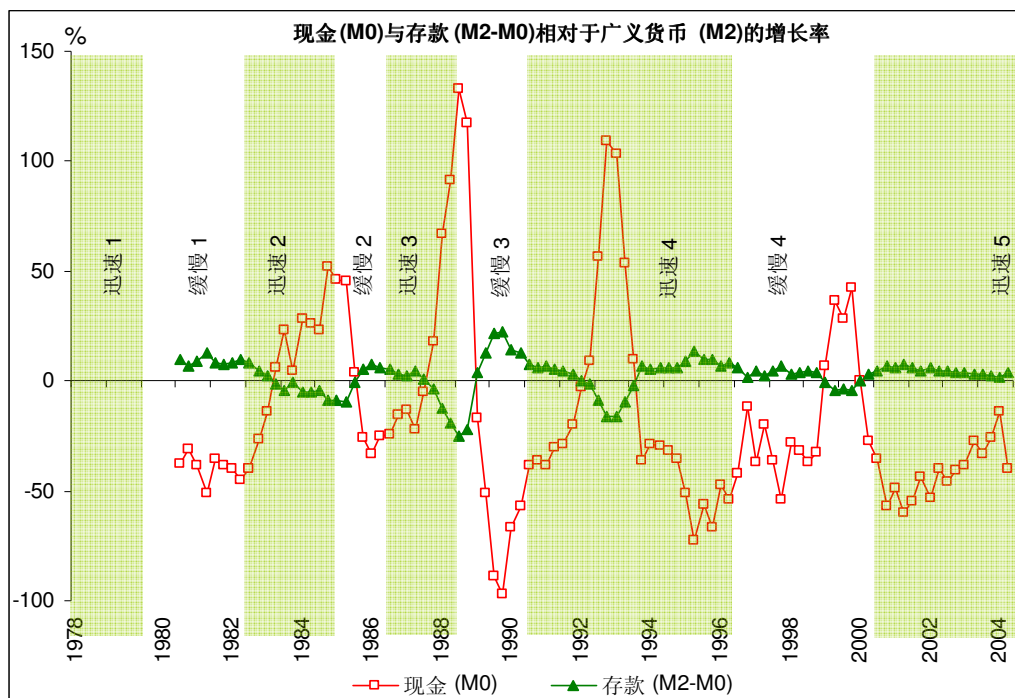
最后，4个峰值的每一个都高于先前的那个，而按这种比较的标准来说，2004年通货膨胀率的上涨看上去并不那么严重。而2005年的通货膨胀率随后走低有几种解释。要么是有关当局发现了更为及时的方式以扭转了通货膨胀加剧的压力，要么是最新的增长速度上扬的通货膨胀部分到2005年还没有出现。也有可能是随后的统计修正将表明通货膨胀率比现在所展示的更高。无论如何，根据所有3种测算标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投资水平和通货膨胀，自1978年以来中国第五个迅速增长阶段似乎还没有走完其过程。

总而言之，所有3种最常见的对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行为的度量结果都符合本章开始时所概述的周期模式。

4. 货币供应周期：1978-2005 年

在通货膨胀呈现出这样的周期性变化的情况下，货币供应模式也呈现出类似的起伏就不足为奇了。图4显示了在改革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现金流通（M0）相对总体货币（M2）增长所呈现出的明显的增长周期。

图 2-4：货币供应周期，1980-2004 年



注：这些变量是 M_0 增长率以及 M_1 与 M_2 之和的比率，除以 M_2 的增长率；它表明了中国货币供应的现金结构的变化。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月度货币供应统计数据，及作者自己的计算

显然，居民和企业从银行存款中抽取资金，导致大量现金进入流通环节，在这个周期的不同部分里达到其高峰。在1985年和1988年，流通的现金在每个周期阶段的末尾达到高峰。在这些高峰之后流通现金的急剧减少似乎预示着缓慢增长阶段的到来。

不过，自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关系不再那么明晰。我们将看到90年代初的高峰还符合这个规律，那个时候城市经济活动的密集正值高峰期。但1999-2000年间相对小很多的高峰处在第四个缓慢阶段之末，其步调却非常不一致。它符合的是1999年6月名义储蓄率的下降，中国人民银行以此解释M0的暂时激增，但这次激增并没有延续6个季度以上。然而，尽管最新的几个周期具有不确定性，货币供应变化和总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通货膨胀和投资水平的波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改革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稳固的。

B. 结论

通过如上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大体分析，我们得出：中国经济在最近之前一直呈现出规律的经济周期，这些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策行动与反应的结果。有待考察的是这些周期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是否不同于它们对城市地区的影响，

还有这些影响是如何传递的。也有可能是农村的经济周期影响全国的周期，其部分原因在于农村经济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动力，使其能够发挥比单纯被动接受全国周期变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略论宏观经济周期的因果关系

确定和解释中国经济波动及其相互联系的原因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当目标是以有助于政府决策者的明晰明确而非技术的方式展示因果关系时，情况尤为如此。使用数学符号和逻辑术语而不是提高其通俗易懂的程度会使人们难以把握论点，使得非专业的操作具体事务的人员感到沮丧。

幸运的是，对于回答本文中的问题而言，等式和术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是确凿无疑的——因为无论任何类型的因果结论实际上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确凿无疑。我们至多能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的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的可认识的解释。

A. 处理因果问题的方法

本文处理因果关系问题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因果分析的哲学基础。即便亚里斯多德对此也有所贡献，尽管根据现代学者的看法（利维-弗尔，[Levy-Faur]，2006年），现代因果分析基于哲学家大卫·休姆（1711-1776）²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²³。尤其是我们感兴趣的是具体事件的因果关系，而不是验证解释一整套事件的理论——虽然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具体方面的因果研究可以有助于后一种更为广泛的努力。

从这种传统出发，我们通过提问来研究因果关系。所指出的原因出现的时机是否恰当？使用得到深入研究的经济和其它关系是否会找到有可能存在的逻辑联系？所观察的趋势是否与所提出的逻辑联系的预期成分相一致？我们已经成功地排除了其它合理的和有潜在可能性的解释吗？这些是本次研究中所涉及的基本问题。

当然，不可能确定的是我们已经考虑到所有可能相关的其它解释。因此，这项工作作为后续研究发现新的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留下了更广阔的空间。不过，情况总是这样的。本文承认人们永远不可能真正有把握地证实任何因果关系。人们只能说迄今为止的证据无法排除这种因果解释，从而表示它是正确的可能性最大。

因为本文分别研究每一个中国的经济周期，这种方法就更加必要。这种方法不会假定在每种情况下起作用的原因影响力(causal forces)。事实上，对每个周期的统计趋势、不同的政策背景和不同的市场条件的考察，还有探究决策者对每个周期的评估的调查工作，它们都表明一种解释的模式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周期。

最后，本文的主要兴趣在于全国层面上（大部分是城市的正规部门）的波动对农

² 参见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2006年中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文内“穆勒的经验主义：知识的相对性”一节里的“枚举与排除”的讨论。<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mill/>

村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农村的波动是否影响到全国的波动、以相关的方式而言农村经济是不是波动的独立源头之一。鉴于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波动数量众多，互动性强，本文只不过仔细研究看来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最有用的一些例证。

B. 本文因果分析框架的概述

对具体现象的每一次因果分析来说，本文采用了双层式的框架。第一层列举了可能存在的对所考察的周期性现象的主要解释，比如说农村家庭收入的下降或乡镇企业投资和产出的激增。第二层随后以两种方式针对事实核查每一种可能的解释，即探究支持的趋势和对立的趋势。像下面所列的“因果图解3-1”这样的示意图表有助于概述证实和拒绝所提出的解释的过程。

成因图表 3-1：示意图的样表——解释现象“P”

总的结论：假设“1”和“2”成功地解释了现象“P”。		
该假设是否得到证实？它所需的支持性的事实和数据有效吗？		有效？ 证实？
1. 假设“1”是否解释了现象“P”？		是
A. 数据或信息“a”检验解释“1”	是	是
B. 数据或信息“b”检验解释“1”	是	是
C. 数据或信息“c”检验解释“1”	否	是
依此类推		
2. 假设“2”是否解释了现象“P”？		是
A. 数据或信息“d”检验解释“2”	否	是
B. 数据或信息“e”检验解释“2”	是	是
C. 数据或信息“f”检验解释“2”	是	是
依此类推		
3. 假设“3”是否解释了现象“P”？		否
A. 数据或信息“g”检验解释“1”	否	否
B. 数据或信息“h”检验解释“1”	否	否
C. 数据或信息“i”检验解释“1”	是	否
依此类推		
4. 假设“4”是否解释了现象“P”？		否
A. 数据或信息“k”检验解释“1”	否	否
依此类推。		

*注：支持的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却依然不能证实该假设；同样，不能成功地确认某个相关的事实可能支持该假设；它取决于已知关系的逻辑性。

来源与解释：请参见正文。

利用经济理论、其它国家的宏观经济经验、所研究的中国周期的现有分析、与熟悉这种周期的中国官员和其他专家的面谈，本文分析中的这种第一层面（在“因果图解3-1”中的编号为1、2、3）选取了可能存在的因果解释——即列出可能的假设或因果机制的清单。因此，第一层面是本文确保在考虑过程中没有“遗漏的变量”或其它的主要解释成分的最佳努力。对批评本文的分析来说，这也是一次机会，因为它邀请批评家指出未在本文中加以考虑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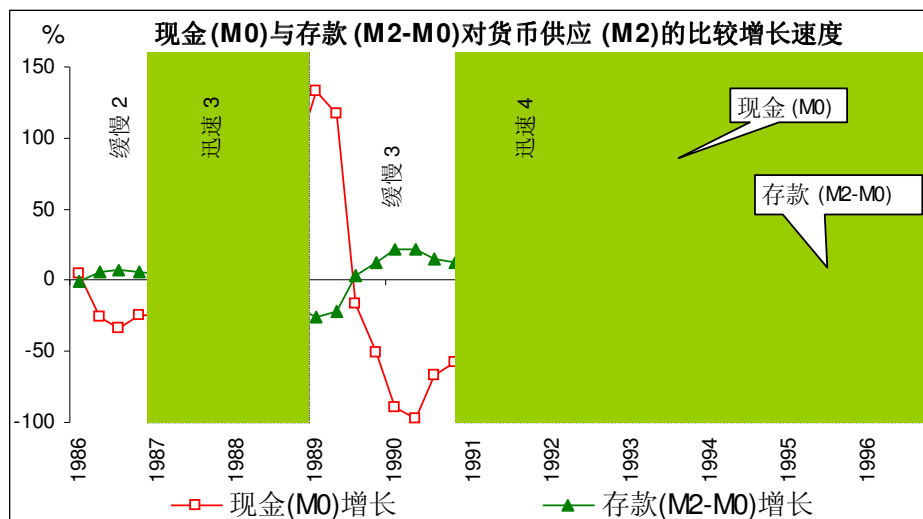
第二层面的检验（在“因果图解3-1”中的编号为A、B、C）纳入每一种所提出的因果解释并进行核查，以便观察统计趋势和其它证据是支持还是反驳这种解释。同样，谈到逻辑理论和历史经验，我们可以预料具体的趋势或现象会有某些解释相伴，而其它的解释会被排除在外。第二层面的检验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会问一些应该有效的预期关系是否确实有效。第二种会问一些应该无效的关系是否确实无效。

图 3-1：货币供应的现金和储蓄波动，1986-1996 年

C. 实例——解释 1986 到 1996 年中国货币供应中的现金波动

作为一个例子，考虑一下许多分析家所熟悉的中国经济模式之一：中国货币供应

当现金 (M_0) 比货币总量增长更快时，储蓄 (M_2-M_0) 增长得更慢，反过来也一样。



*注：这里所定义的“相对货币供应总量的增长”对现金来说为 $100 * (g_{M_0} / g_{M_2} - 1)$ 以及 $100 (g_{[M_2-M_0]} / g_{M_2} - 1)$ ， g_{M_0} 、 $g_{[M_2-M_0]}$ 和 g_{M_2} 分别是与上年同期相比的现金 (M_0)、所有储蓄 (M_2-M_0) 和货币总供给 (M_2) 的季度增长率；它表示现金增长或存款增长是否领先于（正数）或落后于（负数）货币总供给的增长以及领先或落后的程度。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年鉴》，各年份。

中现金部分的周期性波动。我们在第二章的图2-4中看到，在大多数周期的“迅速”部分里，现金的增长快于总体的货币供应，但随后在“缓慢”阶段里落后于货币的增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了这些货币供应的现金（M0）成分增长的激增和锐减？利用本章的框架来证实或排除解释，我们可以探究这个问题。具体说来，这个实例将考察1986年到1996年间的两个周期。图3-1展现了这个阶段的货币供应波动，它显示的是第二章的图2-4中所选择的年份。

图3-1中的波动是惊人的。这些波动表示在某些时间点上，银行存款的增长慢于现金，意味着存款人将一些存款提出并转化为现金。我们将探究根据我们从在这个时期的中国经验以及从经济理论得出的一些合理的解释。它们是：

1. 中央银行的存款名义利率方案的变化：如果这些变化对实际的储蓄率具有重大影响，那么在现金增长变化之前的官方存款利率的重大变化也许能验证这种解释。

2. 由于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物价暴涨而造成的实际储蓄率的变化：在不对名义存款利率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的激增和锐减会改变实际（据通货膨胀率而修正）的存款利率。经济理论说，当决定是否将现金从银行存款中提出或存入现金时，实际利率会影响储蓄者。在现金增长发生重大变化之前的这种通货膨胀变化以及实际存款利率的相关变化会验证这种解释。

3. 中央银行对存款的“保值贴补”津贴将利率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在现金增长急剧变化之前由这种政策造成的实际利率的突然变化会证实这种解释。

4.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出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波动：在现金增长加速或减速之前，大量外汇的流入（由中央银行转化为国内货币）或外汇反过来大量流出会证实这种解释。

5. 在公开市场上中央银行向国民经济注入现金或从中抽取现金的业务操作：就在现金增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的大规模的适当种类d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证实这种解释。

6. 巨大的政府预算结余或赤字：更大的结余或更小的赤字使政府债务（绝大部分由国有银行持有）的增长能够更慢或得到消除，现金（M0）的增长放慢；通过使更多的现金（M0）注入国民经济，更大的赤字或更小的结余会反过来加速现金的增长。

让我们逐一考虑这些情况：

1. 名义存款利率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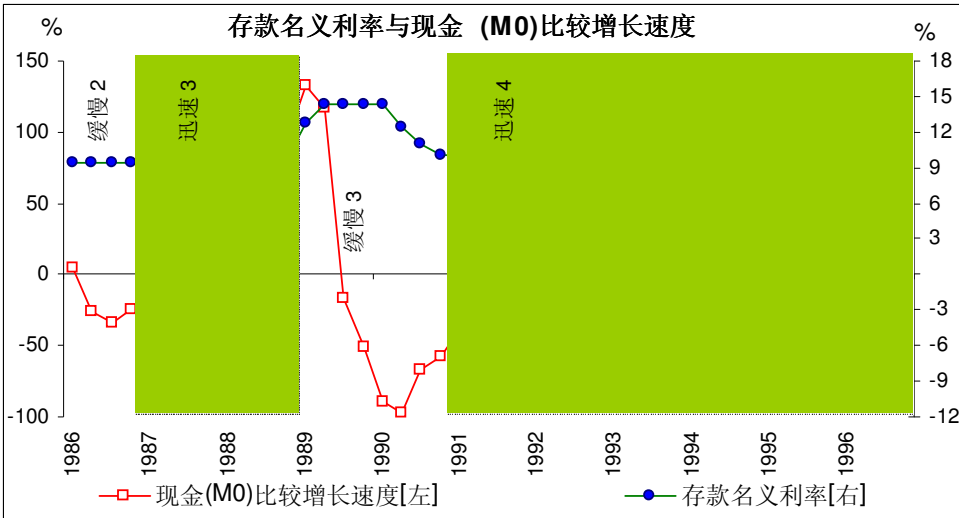
这里的研究检验官方利率的显著变化是否与货币快速增长或者是货币增长滞后息息相关。图3-2展示了图3-1中的货币增长与名义存款利率的情况。马上就能看清楚的是，在这个时期内，存款利率并没有非常大的变化。中国的存款利率在那时不是由市场决定

的。相反，中央银行执行的是内阁（国务院）有关调整利率的决策。

我们需要分别考虑（1）现金增长的激增和（2）现金增长的突然锐减。（1）在图3-2所示的阶段内，名义利率在现金增长凶猛的大多数年份之前和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必定是其它因素造成了现金激增。（2）至于现金增长锐减，它与存款利率略升有一些关联，好像更高的利率会吸引现金，使之成为银行存款。但这样微小的调整有可能造成现金增长如此惊人地减速吗？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名义存款利率对实际存款利率具有重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存款利率因通货膨胀而得到修正，那它就可能具有这种效应。如果是这样，那么名义利率也许是重要的。如果不是，那么它们就不能很好地解释现金增长的锐减。

图 3-2 现金增长和名义存款利率，1986-1996 年

对于 1988 和 1992-1993 年的现金增长加速来说，名义存款利率的下降无法解释；……至于在 1989 年和 1993-1994 年现金增长突然减速的阶段里，它们与名义利率的上升有关，但利率上升的幅度不大引发了对其重要意义的疑问……



*注：关于“现金 (M_0) 相对 M_2 的增长”的解释，请参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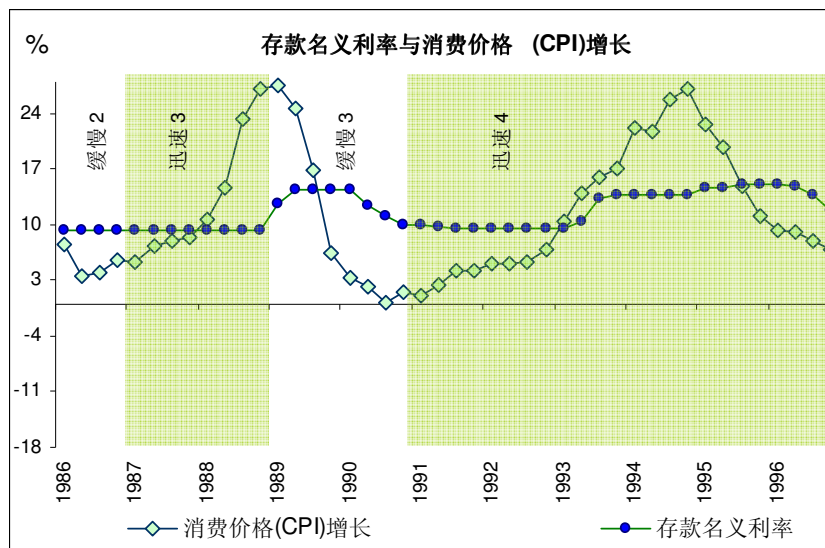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年鉴》，各年份。

2. 受物价膨胀模式影响的实际存款利率

图3-3展现了有关消费品物价上涨与名义存款利率的相对重要性的证据。事实证明，如上所述，名义存款利率的变化与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变异相比是微小的。在考虑对实际存款利率可能具有的影响时，名义存款利率在1989年上半年和1993年上半年进行些微调整的重要性远远小于消费价格指数的飙升。

图 3-3 消费品物价上涨与名义存款利率，1986-1996 年

消费价格指数的波动显然大于名义存款利率.....因此，存款利率的变化不可能严重地影响到实际的存款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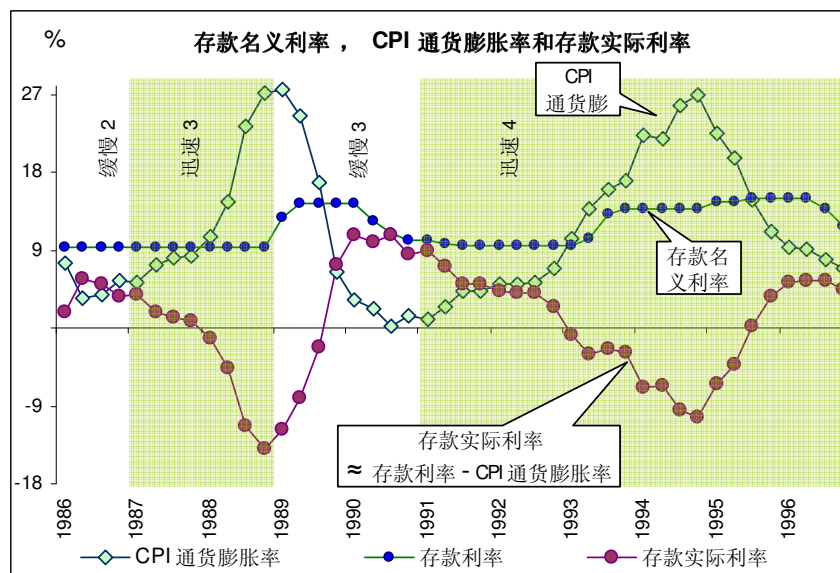


*注：关于“现金 (M_0) 相对 M_2 的增长”的解释，请参见图 3-1。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报告”各期与图 3-2。

图 3-4：得出的实际存款利率，1986-1996 年

实际的存款利率在这些年份里上下波动激烈。它们很有可能影响到持有现金 (M_0) 或是将其存入银行的决定.....



*注：关于“现金 (M_0) 相对 M_2 的增长”的解释，请参见图 3-1。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报告”各期与图 3-2。

不过，如果我们把通货膨胀与名义存款利率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实际的存

款利率。从图3-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实际存款利率的变化远远大于名义利率的变化。事实上，银行存款的实际回报率自1988年开始到1989年末为止是负值。实际存款利率自1992年开始到1995年下半年为止也是负值。经济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负的实际存款利率是抑制银行储蓄的强大因素，而我们可以预期现金流通的增长（M0）将会随着实际存款利率变成负值而加速，并且会随着实际存款利率再度大幅度转为正值而减速。不过，当我们比较实际存款利率的变化与图3-5中所示的流通现金（M0）的变化时，我们发现，虽然实际存款利率的两次巨幅下挫似乎足以解释1988年和1992-1993年现金（M0）的急剧增长，但解释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现金（M0）增长的两次急剧下挫时不能说同样的话解释该情况。

图3-5表明，在1988年和1992-1993年，实际存款利率突然逆转为负值与现金增长的爆发密切相关。事实上，1988年第二季度的最强有力的现金增长与同一季度的第一次负的实际存款利率相对应。同样，1993年上半年最强有力的现金增长伴随着实际存款利率第一次出现负值。显然，实际存款利率出现大额负值是诱导居民和企业提取现金的动因，他们在银行的储蓄使他们亏损钱财，所以他们投资于实际的物品上，比如说耐用消费品。因此，数据表明通货膨胀导致的实际存款利率下降至少有可能是1988年和1993年流通现金（M0）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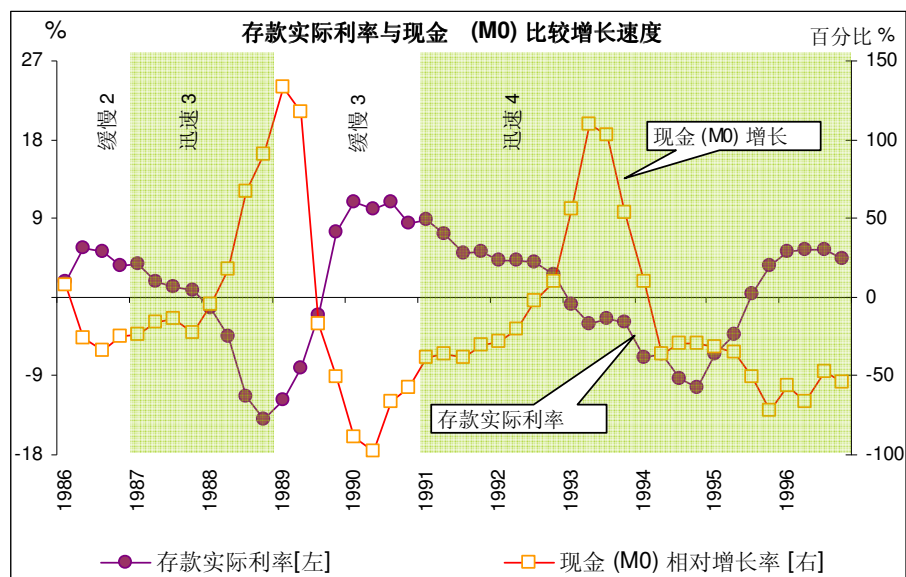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实际存款利率并不能解释现金增长的减速。现金增长在1989年以及在1993-1994年再次大幅度减速。但无论在这两个阶段的哪一个里，当现金增长降幅最大时，实际存款利率走出负值范围的幅度都不明显。在1989年，实际存款利率依然在第三季度里为负数，在那时现金（M0）实际上增长得比货币总供给更为缓慢（即它的相对增长是负数）。在1993-1994年，实际存款利率在1993年的后三个季度中依然处在负值范围之内，随后在1994年它的负值甚至变得更大。与此同时，现金增长在1994年下半年之前急剧减速，它的增长速度至少比货币总供给（M2）的慢一倍。现金增长减速显然不是实际存款利率更高的结果。

3. “存款保值贴补”

在1988年和1993年，中国国务院决定对3年（或以上）银行定期存款的储户实行补贴，而后在1993年对3年或以上国库券的到期持有人实行补贴。当这些存款到期时，它们的价值将由中央银行公布的方案来确定，该方案规定了对储蓄中的每个货币单位的利息支出。该方案基于“价值担保”，即在存款期限内储蓄不会失去购买力。事实上，得到担保的回报率足以与消费品物价上涨保持同步。在名义存款利率由此实际上提高到与消费通货膨胀率同步的情况下，实际上的实际存款利率就成为0。

图 3-5：实际存款利率对现金（M₀）增长的影响，1986-1996 年

当实际存款利率变为负值，流通的现金在 1988 年和 1993 年激增……但在现金增长减速时实际利率依然为负数，所以实际利率似乎在那里毫无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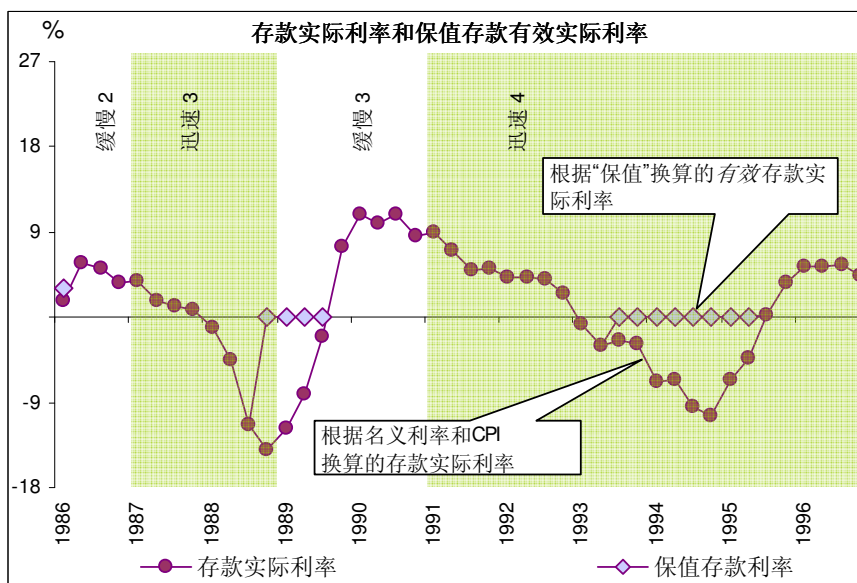


*注：关于“现金（M₀）相对 M₀ 的增长”的解释，请参见图 3-1。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报告”各期与图 3-2。

图 3-6：存款保值补贴与有效的实际存款利率

虽然实际存款利率在 1988 年和 1993 年依然是很大的负数，中央银行关于储蓄不会失去购买力的保证使得有效的实际利率为 0。



*注：关于“现金相对 M₀ 的增长”，请参见图 3-1。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报告”各期与图 3-2。

图3-6 展现了“存款保值”政策对实际存款利率的这种影响。在1988年的第四季度，虽然在9月份实行存款保值政策之后，实际的官方存款利率继续在负数范围内进一

步下滑，对所有3年或以上的定期存款来说有效的实际利率跳升至0。同样在1993年的第三季度，虽然实际的官方存款利率依然为负数（而且在1994和1995年负值变得更大），有效的实际利率跳到0并保持不变——同样，对所有3年或以上的定期存款而言。这些存款的有效实际利率的情况会看上去非常不同于如果没有存款保值贴补的情况，非常不同于更短期限的存款的实际利率。

将有效的实际存款利率的这种形式与现金（M0）的变化相比，所显示出来的是在确立“存款保值”制度与现金（M0）增长急剧减速之间的因果关系上看来存在着时机上的一致性。图3-7表明，在1989-1990和1993-1994年，在引入存款保值贴补之后，现金（M0）增长的相对急剧减速滞后1到3个季度。

虽然现金（M0）增长在显露1988年非负值的实际存款利率的影响上相对缓慢，但在1993-1994年表面的影响显露得更快。存款保值制度始于1988年9月，在第三季度之末。正如图3-7所示，现金（M0）增长相对货币总供给增长的减速始于3个季度之后，在1989年第二季度；而在1989年的第三季度变得加剧。1993年，存款保值始于7月，在第三季度之初；而现金（M0）增长的相对减速在那个季度立即显现，在第四季度和1994年整个上半年进一步急剧减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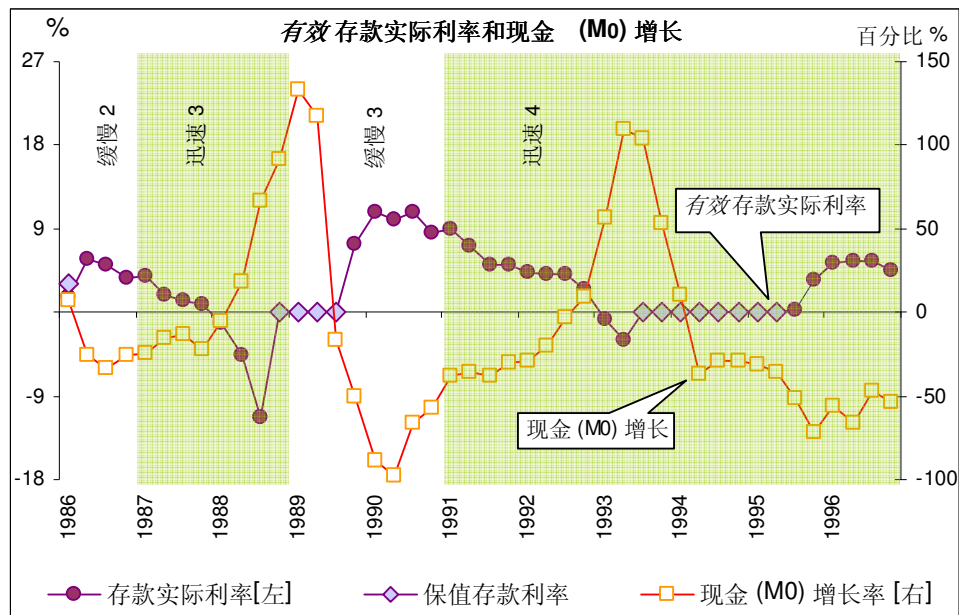
谈到在1988-1989年有效存款利率变为非负值之后现金（M0）增长减速的滞后，有一些合理的解释。可能性最大的是，因为中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实行过这样的“存款保值贴补”制度，所以民众需要一些时间对之加以了解并判断与这项政策有关的收益大小。此外，1989年上半年有过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不稳定的阶段，尤其是在第二季度，那有可能导致市民把他们的储蓄留在手上并且从银行取出存款。

相比之下，在1993-1994年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储户为获得存款保值贴补而快速采取的行为反应。可能是民众在1988-1989年了解到存款保值贴补制度的价值所在，再度出现这种制度时他们很快加以利用。

总而言之，根据存款保值贴补调整后的有效实际存款利率似乎可以解释相对货币总供给增长的现金（M0）增长的加速和急剧减速，尽管存在着与1988-1989年滞后效应有关的疑问。

图 3-7：有效实际存款利率和现金（M₀）增长，1986-1996 年

当负的实际存款利率实际上由于“存款保值贴补”而跃升至 0 的时候，现金（M₀）增长速度显著减慢，因为钱财转为定期储蓄存款……



*注：关于“现金（M₀）相对 M₂ 的增长”的解释，请参见图 3-1。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报告”各期和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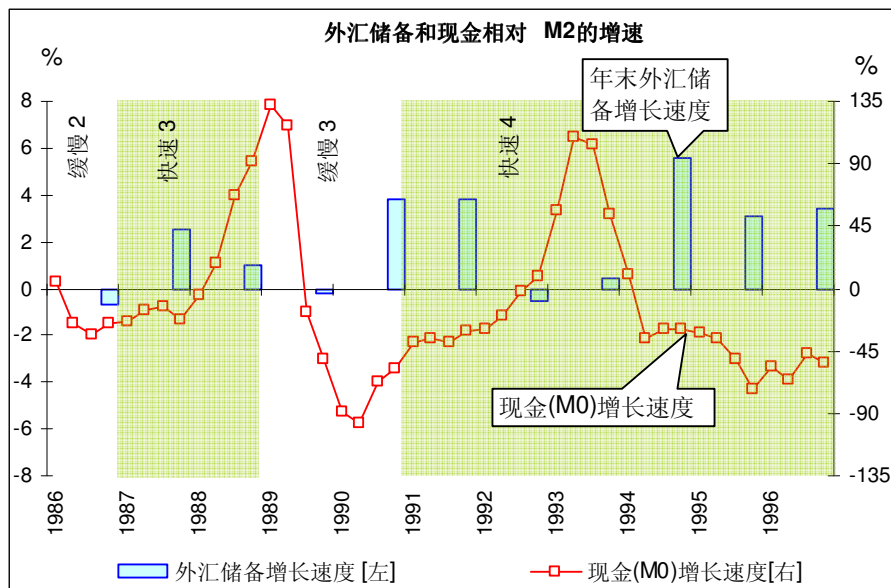
4. 国际收支平衡的波动

可以设想的流通现金（M₀）戏剧性变化的解释是外汇的流入与流出。理论上，外汇储备的变化反映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流动的综合统计。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长会要求中央银行将外汇转化为人民币，从而增加 M₂ 并可能增加现金（M₀）。最终的影响将取决于储户的行为——持有现金还是将外汇所得的收益存入银行。

不过，对 1986-1996 年这个阶段的外汇储备增减情况的研究表明得出外汇流动可以解释流通中的现金（M₀）波动的结论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图 3-8 展示了在年末外汇储备增长占中国货币供应（M₂）的比重，因为 1986-1996 年这个阶段的季度储备信息无法现成地得到。研究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现金（M₀）增长相对强劲的年份里，外汇储备要么下降，要么增长，都是微不足道的。反过来，当现金增长疲软，外汇储备增长似乎达到其峰值。单是这条就足以宣告外汇储备增长不是可以接受的现金（M₀）增长波动的解释。

图 3-8：外汇储备变化与现金 (M₀) 增长，1986-1996 年

当现金 (M₀) 显著急剧增长时，外汇储备的增长很少，即便不是负值的话；而反过来 M₀ 缩量时储备激增；因此，筹备不能解释 M₀ 的波动。



*注：关于“现金 (M₀) 相对 M₂ 的增长”的解释，请参见图 3-1。

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1992 年) 和《中国金融展望》(1998 年)，北京：中国人民银行，第 89 页。

不过，情况还不仅限于此，外汇储备增长的规模太小了，即便这种变化的方向与假设相一致，以至于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在这些年份里中国货币供应的增长几乎一直是两位数的，而在迅速的周期里有一些年份的增长范围在 20% 到 40%。在这种背景下，一般来说代表不到 5% 的货币供应的储备变化在决定现金 (M₀) 增长的相对速度上起到因果作用的机会不大。

最后，如前所述，作为外汇储备增长的结果，M₂ 增长的一般加速或减速无法表示 M₂ 的变化是否显现为现金或是存款。虽然可能有因果关系，但在这点上并不明显。总之，我们断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储备的变化不能用来解释在中国的通货膨胀中所观察到的波动。

5. 公开市场业务和政府预算平衡

假设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在二级或一级市场上买卖债券的活动会影响到现金 (M₀) 增长的相对速度是诱人的。不过，正如外汇储备波动的情形，虽然这些政府金融活动显然能够影响到货币供应 (M₂) 的规模，但它们并不能确定货币供应的增加或减少是否对流通现金或存款水平具有更大的影响。对储户行为的影响——比如说本章之前对实际有

效存款率的影响的研究——更有可能回答那个结构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结论必定是公开市场业务或政府预算决策都不能解释所观察到的流通现金（M0）相对增长的波动。

D. 因果分析的示意图一览

这个因果分析的示范总结于如下的“因果图解3-2”示意图中，它遵循本章之处作为“因果图解3-1”而介绍的样板。

在“因果图解3-2”中只有两种解释经过有效性的检验而成立。它们是解释2和4。正如在前几节中所分析的，解释2宣称更高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使实际存款利率降低为负值，造成储户提取现金，流通中的现金（M0）增长。这就解释了这些时期里现金（M0）的快速增长。解释4宣称“存款保值贴补”对实际存款利率的上升具有重大影响，从而减少了现金（M0）的增长。所有其它可能成立的解释未能通过实际有效性（factual validity）的检验，或与在其它经济体中常见的关系不相一致。

总而言之，本文使用理性的和诠释的方法而不是计量经济学建模的方式研究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有关的因果关系问题。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它不能为所探究的现象（因变量）而在数量上为每一个多重有效解释（外生变量或解释因素）确定显著性。它也不能彻底排除外部的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掩盖了与政策关系更大的因素在解释力量上的显著程度。多元回归分析在因果分析的这个方面更为占优。

尽管如此，在类似这样的研究中理性和诠释方法的好处大于其缺陷。首先，中国的不同周期乃至每个周期的不同的缓慢和迅速发展阶段似乎源自不同的因果关系。那就是说所分析的每种现象代表着一段非常短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阶段没有留下在复杂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中综合各种潜在因素的机会——用术语表述就是，自由度太小。

其次，理性的和诠释的方法强调确保在分析中没有遗漏中国所特有的以及这些时间阶段所特有的因素的必要性。以图解方式列出任何特定事件的可能解释引发其他研究人员进行补充。它满足了因果分析的最基本的原则：分析者永远不能够真正证明一种特定的因果关系，只会不能够对它做证伪。必须始终为发现矛盾的或更好的解释的可能性留有余地。

最后，在列出潜在的解释并逐一对它们进行讨论的情况下，理性的和诠释的方法有助于政策讨论，而抽象的计量经济学建模结果往往不能显示政策在过去实际具有的影响的直观情形。这种方法的直观方面增加了博学之士——不熟悉或不习惯于复杂的计量经济学陈述方法的人士——将补充重要情况或提出其它解释的可能性，而事实证明这将极大地加深我们对所研究事件的最终理解。

成因图表 3-2：解释中国货币供应中的现金（M₀）波动，1986-1996 年

总的结论：更高的消费品价格上涨造成现金 (M_0) 的相对急剧增长，而随后的“存款保值贴补”造成现金 (M_0) 的相对急剧减少。

该假设是否得到证实？它所需的支持性的事实和数据有效吗？ **有效？** **证实？**

1. 名义存款利率的变化使现金增长快于/慢于货币 (M_2) 了吗？		否
A. 存款利率的下降对应于现金 (M_0) 快速增长吗？	否	否
B. 存款利率的显著增长对应于现金 (M_0) 增长的减速吗？	否	否
C. 名义存款利率的变化对实际储蓄利率的变化来说是否重要？	否	否
2. 消费品价格上涨降低了实际存款利率、加速了现金 (M_0) 增长吗？		是
A. 消费品价格飙升造成了实际存款利率骤降吗？	是	是
B. 实际存款利率在现金 (M_0) 激增之前大幅度下降吗？	是	是
3. 消费品价格走低会提高实际存款利率、减缓现金 (M_0) 增长吗？		否
A. 消费品价格显著降低造成了实际存款利率急剧上升吗？	是	是
B. 实际存款利率在现金 (M_0) 增长减速之前变成正数了吗？	否	否
4. “存款保值贴补”提高了实际存款利率、减缓了现金增长吗？		是
A. “存款保值”造成了实际存款利率显著上升吗？	是	是
B. 现金 (M_0) 增长在“存款保值”启动之后显著减速了吗？	是	是
5. 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流入与流出影响现金 (M_0) 增长吗？		否
A. 在现金 (M_0) 增长强劲的阶段内外汇储备增长吗？	否	否
B. 在现金 (M_0) 增长减速的阶段内外汇储备缩减吗？	否	否
C. 现金增长变化的方向能不同于货币总供给 (M_2) 吗？	是	否
6. 中央银行现金公开市场业务可以解释现金 (M_0) 增长吗？		否
A. 现金增长变化的方向能不同于货币总供给 (M_2) 吗？	是	否

注：支持的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却依然不能证实该假设；同样，不能成功地确认某个相关的事实可能支持该假设；它取决于已知关系的逻辑性。

来源与解释：请参见正文。

那表示对所提出的任何特定解释来说，在第二层的检验中统计的精准性乃至计量经济学的复杂性自有其用武之地。对所讨论的时期来说确实存在必要的关系吗？相关、方差和回归分析都可以加以卓有成效地利用，尤其是如果它们能够显示容易理解的直观的相应结果的话。

第四章 - 国内周期的表面上成因

从1978年改革开始，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长、投资、通货膨胀及货币流通额的上下波动？在此呈现的各项统计数据及历史资料显示出这些

因素的根源都在中国国内，而且这些因素都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它们或是刺激经济的政策或是对过度刺激进行调整的政策。

这是一项重要的结论。外国投资、出口需求变化、加入世贸组织或外国援助都不能解释中国在近三十的发展中的起起伏伏。诚然，上述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自1978年开始长期增长的每一个里程碑都作出了贡献。不过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增长与这些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这些因素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就错了。

在每个周期中——实际上是每个阶段中，这些因果细节是不同的。对每个周期中的各个阶段的基本领会是理解本文主题，即“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背景。这一章将每个循环阶段在一个或许有些苛刻的框架中进行受到必要的限制的因果关系分析。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见，没有一项因果关系分析成为定论。所以，这一章不仅对于这份报告的其余部分，而且对于未来的相关工作来说都是一个起点。如果其作用超出了本研究的需要，那是因为它涉及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转变——甚至可能是秘密。

在进入到各个子时期之前，先介绍一下政府财政及国际交易的走向是有益处的。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哪些因素造成了子时期的波动，哪些没有。

A. 财政走向，1978—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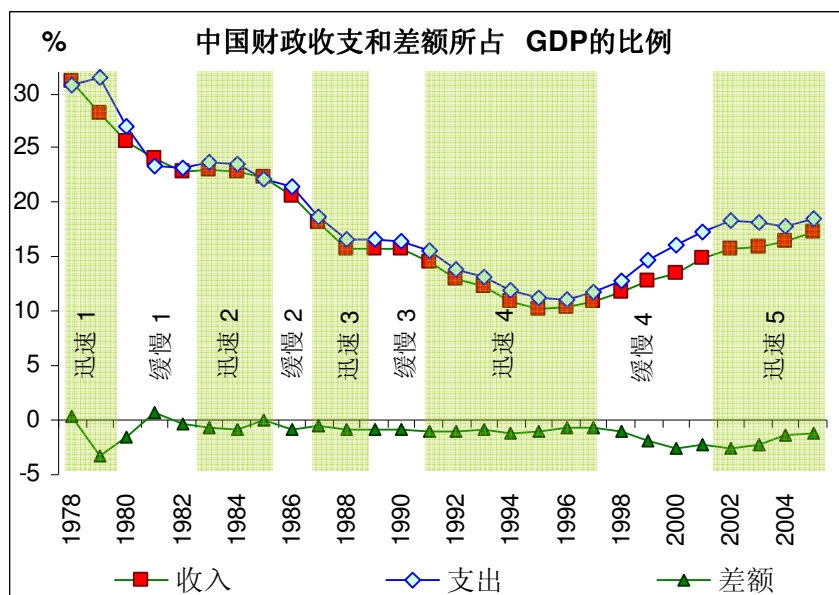
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统计走向都会呈现出清晰的周期特性。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政府预算走向。在许多采用市场经济模式国家的中，政府预算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因为在经济放缓的时期，税收减少，但在经济高速扩张时期税收则会增加。这就形成了一个周期性的模式，即周期中的高速时期出现预算盈余，而低速时期出现预算赤字。

但是，在那些预算和财政制度不完善的国家中，由快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所导致的预算赤字，常常是引发一段时间内经济快速增长和衰退的根本原因。这些产生了不良后果的高预算支出，在许多国家中与宏观周期期间形成了一个有关联的模式。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的财政模式的分析显示出财政波动与中国的经济波动之间有着很小的系统的联系，除了两个例外：第一个例外，在1978—80年间，赤字开销引起过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和越南在边境上的战争引起的。第二个是在这一时期将要结束时的1998—20002年间，有意识的赤字开销帮助中国从一个严重的经济低潮中恢复。

图 4-1. 财政预算走向, 1978-2005

政府预算走向显示赤字支出在改革时期前期及后期两次升高。大多数年份中, 预算与经济活动的快慢周期没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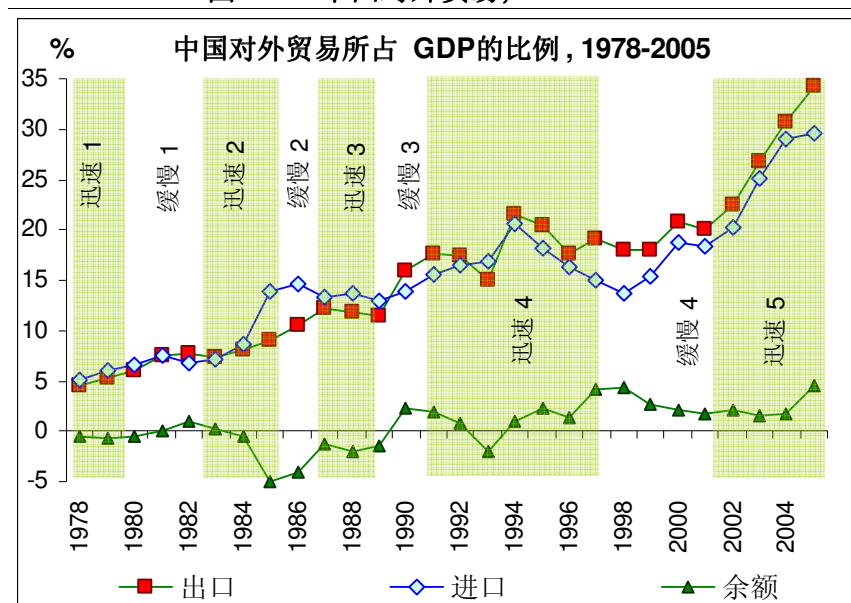
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06 统计年鉴 (CD) 图表 8-1; 中国财政部, 中国财政年鉴 2003 ["Finance [Fiscal] Yearbook of China 2003"] 336-7 页.

图 4-1 显示除去这两个时期外, 收入与支出表现出长期的波动, 只在相对较小的预算赤字上有很小的偏离。此外, 收入与支出的走向并未显示出与第二章中所述的快慢时期相关的明显模式。作为GDP一部分的收入, 在1978—1995年间长期滑落, 在这次滑落中出现了两次平缓。但前一次是在快速期而后一次是在慢速期。1995年之后, GDP中的收入部分恢复, 但其恢复节奏是不够直观的, 在1997—2000年间的慢速期的节奏反而要快过2001—05年间的GDP加速增长期的节奏。

B. 对外贸易, 1978—2005

对外贸易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来表明中国的统计学走向与周期性波动看起来并不相符。拥有高额对外贸易的国家的一个常见模式是在高速发展时期进出口都会剧烈增长, 如果该国家的增长是由出口所带动, 则还会伴随贸易顺差的增长。相反, 在慢速时期, 进出口都会减慢, 如果出口需求是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则会出现减小的顺差或更大的逆差。对于其他的众多经济来说, 特别是那些有着灵活的汇率的, 通货膨胀严重增长的过热增长时期最终会由于货币价值被严重高估而导致贸易逆差。这些模式在中国发展的不同的子时期混合出现。

图 4-2. 中国对外贸易，1978-2005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6(CD)，图 18-3 及中国统计摘要 2006，169 页

图 4-2 展示了中国贸易的起伏。最让人吃惊的异常现象是中国贸易在慢速时期的剧烈增长，特别是1980—82，1989—90和1997—98年间。相反，除去1994—95和2005年间的特例，贸易顺差在高速时期却减小或是成为逆差。

将这两个部分分开考虑，进口似乎在大多时间遵循期望的模式，在高速时期加速增长，而在慢速时期GDP的那一部分下降。不过出口的模式就较混杂。在最初三个慢速时期，出口加速增长——一个不同寻常的模式。但是出口却在最初的四个高速时期显出严重的不稳定性，在第四个慢速时期先下跌而后却出现井喷式增长，之后在第五个高速时期出现高速增长。总体上看，中国的贸易走向并没有清晰的模式，尽管之后的分析会考虑其对于数个子时期的相关性。

C. 各个波动阶段的明显成因

就像在前一章介绍因果关系时所概述的，寻求印证政策、相关事务及经济波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在历史数据给定的前提下，它至多是一个排除的过程：或否定某一不太可能的因果联系或保留某一因果关系的的可能性。完全确定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随着关于某一波动的数据及事件记录逐渐丰富，某些因果联系可能是合理的概率，同时，与其它联系不合理的概率也会逐渐清晰。

可能形成波动的成因多种多样。某些反映了政府的国内影响，某些仅仅是由于一些外因而出现。关于后者，我们已经提及了全球外贸交易的波动。其他的可能性包括：战争，国际制裁，恶劣的天气及流行性疾病。

除了政府预算之外，政府还对以下因素有着更多的控制，包括：货币及利率政策，行政管理下的投资水平，价格管制及解除管制，关税及其它贸易领域成分的改变，国际资本帐户管理，汇率政策，劳工权益及移民管制的改变，对金融及非金融企业的管制和规章的改革，还有种种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

最后，为求取利益及自身好处而产生的自我推动的经济力量，也对刺激和抑止经济活动有着强大的影响：常常是对政府行动的回应或是无视。常常是一些出人意料的事件、官方政策及经济行为的组合得以解释某一特定时期的波动。

政府政策及外部事件的记录是什么？下面展示的是各个时期的年表。这些数据，与经济统计记录和基本经济逻辑结合起来后，使我们能够评价关于中国周期性波动的种种相互竞争的解释。随后几节逐一分析了第二章中所介绍的各个子时期。

1. 1978 - 1982 周期：后毛泽东时代的支出，农村价格改革和改组

对1978至1982年间的快慢周期成因的分析指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及意外的打击共同造成了这个周期的快、慢阶段。特别是期望过高的投资计划，与越南的边境战争，以及造成价格升高的农村改革的组合在第一次过热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之后，政府利用削减政府支出及减少行政投资来对经济过热做出反映，造成了慢速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旱及农作物减产并未造成重要的全国性影响。

a) 1978-79 快速增长时期—过渡投资，价格改革及战争

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前两年，继承了之前已经被过度刺激的经济状况。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继任者华国锋推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投资扩张计划，此计划部分依赖于由新出现的石油出口收入资助的进口科技。到1978年后期正式实施改革开放时，很多决策人已经认为投资活动过密并产生了浪费。到1979年，一项旨在修正的改组计划开始成型。

不过，作为改革的第一年，1979年仍然见证了华国锋投资计划的继续繁荣。此外，需求和相关的通货膨胀压力也在急速上升。第一，1979年4月，中国与越南爆发边境战争，造成难以预期的预算及外汇费用。第二，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广，农业价格改革在1979年开始实施，并引发了一场在后毛泽东时代既温和但是又令人忧虑的普遍性价格上涨。

用以验证这些影响的 合理性的证据来自经济统 计及政策声明两方面。第二 章的图2-3中的关于混合资 本投资的数据显示了投资 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 分已经远远高于走势线。其	年表 4-1 - 1978-1979 快速增长时期	
	日期	政策及事件
	1976	毛泽东去世
	1977-79	华国锋后毛泽东时期的强力投资计划
	1978 12 月	市场改革及国际开放启动
	1979	农村价格改革大幅提高农作物价格
	1979	对越边境战争
	1979	关于改组及投资减缓计划的争论
	来源：董 1999，第二册，多页。.	

次，关于1979年农场交货价格的价格统计显示了在当年平均农场价格出现了一次高达22%的跳升。第三，中国财政部长在1980年把军费开支的增加列为1979年中四个导致改组成为必须的四个发展之一。

成因图表 4-1. 对 1978-79 快速增长时期的成因解释

总体结论： 华国锋时期（1976-78）频繁的投资行为，1979 年农村价格改革及 1979 年对越边境战争解释了 1978-79 年的跨速增长。

假设是否被验证？其所需的论据及数据是否有效？	有效？	证实？
1. 政府资助的投资是否刺激了此时期的快速增长？		是
A. 政府是否在 1977 年启动了一次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	是	是
B. 1978-79 年间的投资水平是否异常的高？	是	是
C. 1978-79 两年中政府预算支出是否都很高？	是	是
D. 消费增长是否大大慢于投资增长？	否	否
E. 官方政策声明是否批评投资过度？	是	是
F. 建筑活动是否反映了 1978-79 年相对于 1977 年的快速增长？	否	否
2. 1979 年的农村价格改革是否造成通货膨胀？		是
A. 主要的接近年尾的收割是否在 1979 年至 1980 年间推动价格增长？	是	是
B. 粮食采购价格是否在 1979 年出现大幅升高？	是	是
C. 政府财政赤字是否过大且是由于价格补贴造成？	是	是
D. 1980 年晚期的严重减产是否造成了 1979-80 年间的高价格？	否	是
3. 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需求造成了快速增长？		否
A. 出口增长是否在 1978-79 年间特别强劲？	否	否
B. 净出口增长是否在 1978-79 年间特别强劲？	否	否
C. 中国在两年中是否出现都贸易逆差？	是	否
D. 经济特区是否在 1979-80 年间首次建立？	是	否
4. 1979 年对越边境战争是否造成当年经济活动加快？		是
A. 预算报告是否印证了军费开支是造成赤字的主要原因？	是	是
B. 工业产量是否在 1978-79 年间大幅提高？	是	是

来源及解释：请见正文。

这三项发展都被认为会造成一场突然的财政支出的井喷，因为在1979年投资及农业采购几乎都是由国家资助。中国的预算赤字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也确实大于此后的每一年（见图4-2）。此外，图4-2显示了在1978-79年间的出口销售没有发生巨额增长，故并未导致在第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及价格的增长。所以，1979年

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在1978-80年间被关注的贸易逆差给改组添加了压力。作为结论，1978-79年间的第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几乎可以被肯定是对升高的农场价格的政策、国家资助的投资扩张以及战争带来的无法预料的经济后果的产物。

b) 1980-82 慢速增长时期一削减预算及抑止投资

中国在改革时期经历的第一个宏观周期中， 1980-82年间的慢速增长时期在1981年时清楚地触底，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及投资增长处于最低点。 这一慢速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针对前面1978-79年间快速时期的政策反映造成的。政府在运作与投资两方面支出的收紧似乎是最重要的因素。

年表 4-2. 1980-1982 满速增长时期

日期	政策及事件
1979	针对高投资的宏观经济改组
1980	经济特区成立
1980 3 月	关于 1979 年高额赤字的报告
1980 夏	中国北部干旱 — 大量粮食进口
1980	外汇管制从省级上升为国家级
1980 秋	预算投资支出改为银行贷款 (拨改贷)
1981	银行信贷收缩计划启动
1981 春	引入较高的“议付”农场超额价格
1981	行政减缓建设活动
1982 春	向农民依法分配公社土地、牲畜及工具
1982 春	镇取代合作社成为农村监管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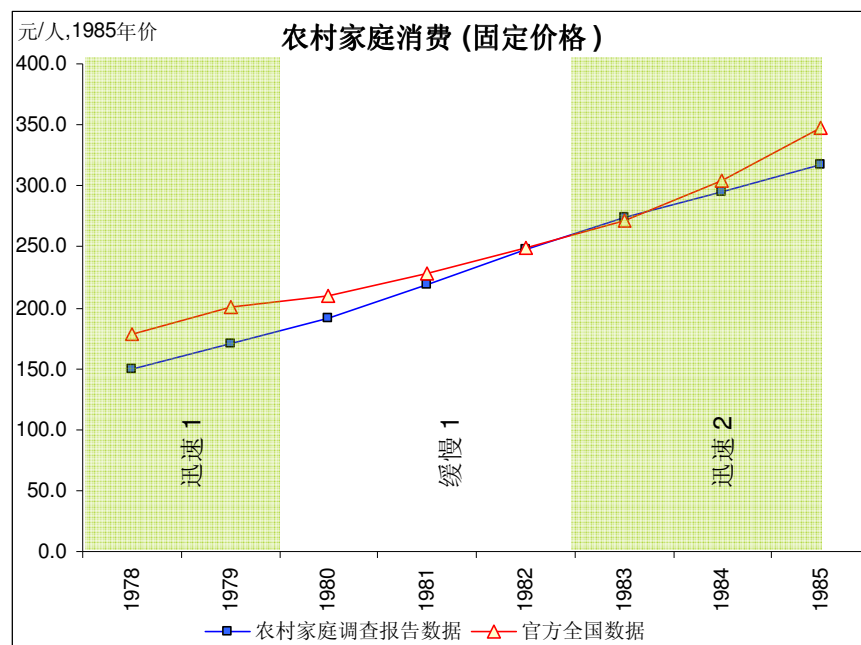
来源：董 1999，第二册，多页；王 1981 页 II-79ff

与此同时，1980年华北平原地区发生一场严重的旱灾（由于收割及相关收入均在每年的秋冬之际实现），使当地的农业产出及收入严重受损，并在来年的1981年对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1980-81年间中国北部的农业困难亦有可能造成家族耕作的复苏，伴随着农村合作社的废除以及在1982年开始实施并在下一个周期中的快速时期（1983-85）取得全效的国有农田改革。

尽管这场旱灾为当地（中国北部平原地区）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其在全国农村家庭消费上带来的冲击是微不足道的。在改革初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直接考量和比较是困难的，不过，由于随着1982-83年间公社解体及家族耕作的复兴，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显示出从“工资收入”（即合作社分配收入）到“家庭企业（即大多家庭耕作）收入”的虚假变化。不过，图4-3展示的此时期中真正的消费走向显示，旱灾在全国范围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图4-3展示的强劲的国内农村消费走向极有可能反映了家族耕作动机及1981-82年间的较高的农作物价格，特别是超额生产的销售奖金，所带来的产量增加。

图 4-3. 1980-82 慢速时期的农村消费

根据调查及（官方）行政数据，1980 年中国北方干旱并没有严重降低农村家庭消费的增长。在这些年中，1979-80 间较高的农村价格及合作社耕作向家庭耕作的转变，都改善了农村家庭的收入。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多年。

从1980年这一时期开始，决策者们就已经开始治理经济过热。1980年早期的预算报告³ 显示1979年出现了巨大的赤字，为1979年开始推行的改组计划添加了一份动力。决策者们缩紧了政府财务，预算数据（图4-1）1980-81年间的支出出现巨大回落，预算再次达到平衡。记录⁴ 显示旨在限制增长及通货膨胀的政策在1981年继续实施，并伴随着信贷紧缩及行政措施来减慢作为投资行为最集中行业的建筑业的发展。外贸数据（图4-2）也确定了由于政策改组引发进口下滑，到1982年中国的贸易平衡再次出现顺差。这次顺差为增长提供了一个反周期的推动。

我们可以将此分析概括为以上成因图表 4-2。

³ 见 王 1981.

⁴ 见 董 1999.

成因图表 4-3. 1980-82 慢速时期的解释

总体结论：表现为预算及投资削减的政府对抗过热发展的政策导致了经济减速—而不是进口减速或农业减产。

假设是否被验证？ 其所需的论据及数据是否有效？*	有效？	证实？
1. 出口暴跌是否导致了 1980-82 年的经济减速？		否
A. 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再这几年中是否下降？	否	否
B. 净出口（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是否下降？	否	否
2. 预算紧缩是否造成了 1980-92 年间的减速？		是
A. 政府指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是否急剧下降？	是	是
B. 大额贸易逆差是否被贸易顺差取代？	是	是
D. 政府是否在 1979 年颁布一项重组及紧缩计划？	是	是
3. 天气相关的农作物减产及收入下降是否造成了经济减速？		否
A. 1980 年中国北方是否出现重大粮食减产？	是	是
B. 粮食减产是否在当年及随后几年影响了农场收入？	是	是
C. 国内农村家庭消费增长是否在 1980-82 年间明显变慢？	否	否
4. 政府资助投资的减缓是否导致了经济减速？		是
A. 是否这个时期大多数非预算投资仍为国家所控制？	是	是
B. 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是否显著下降？	是	是

来源及解释：请见正文。

2. 1983 - 1987 周期：土地改革及新工厂管理

中国的第二个宏观经济周期开始自1983年的农村繁荣，终于1986-87年间的反通货膨胀紧缩，是后1978年改革时代的第一个成熟的周期。在这个期间，巨大的结构性及政治性改革，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改革涉及对重点资产的直接控制的转移。这个期间出现了过热的增长，货币政策的扩张，通货膨胀以及随后突然的信贷紧缩和旨在为经济降温的其它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及宏观经济动荡的来源的能量，相对于政府及共产党的政策的直接影响，有了明显的增长，这也在此后的周期中变得更加显著。在这第一个完整的周期中，中国的经济情况日趋成熟。

a) 1983-85 快速时期的成因研究

处于80年代中期的快速发展时期，反映了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发生的，包括金融自由化在内的巨大变革。随着企业、所谓的银行业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行为、个人和企业搭建了舞台。1983-85年间的快节奏活动也反映了延迟的改革造成的影响和其它在先前慢速时期开始的发展工作，特别是土地改革（即废除合作社）以及企业监管改革。

最重要的是在农业及各类型企业中开展的管理改革。1982-84年间的土地改革，包括合作社废除以及将耕地、牲畜及工具发放给个体家庭，直接将控制权交到农民手里，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实现自己的粮食及其它产品的销售份额。由于改革中实行的是一套

土地承包和约系统而不是对土地的完全所有权系统，所以这个系统被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系统”而不是“农田私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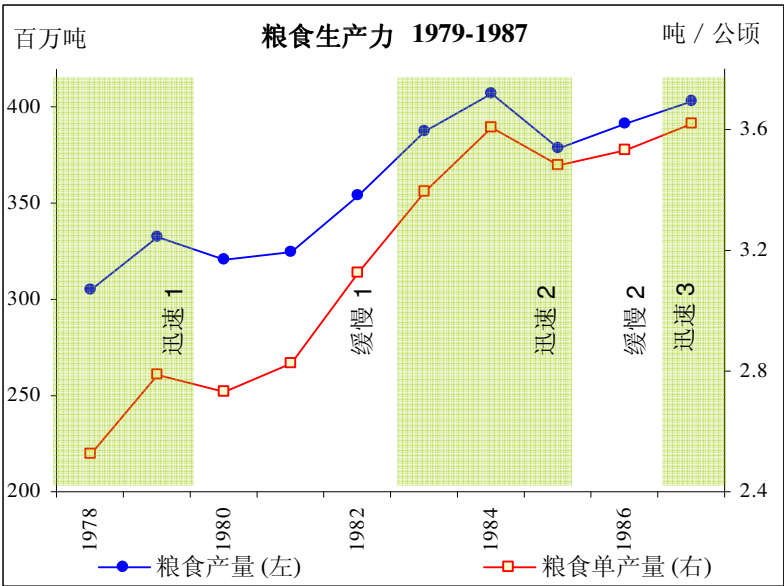
年表 4-3. 快速时期 1983-1985

Date	政策及事件
1983	把土地及牲畜非配给家庭的行动从合作社蔓延到国有农场
1983	非政府预算的国有企业可以保留利润担需缴税 (利改税)
1983-84	农村企业及农村非农劳动力收到鼓励
1983-84	中国的四大银行作为商业银行启动
1983-84	银行向企业提供借贷，鼓励了改革
1984 秋	基于利润的城市企业管理改革开始
1984 秋	农村现金及粮食丰足，但是难卖难买
1984-5 冬	资源的销售合同允许对自由选择作物来替代粮食配额

来源：董 1999，第二册，多页。

图 4-4. 1980 早期及中期的粮食产量

公顷产量及总产量都显示出，随着土地被分配给家庭，粮食产量在 1982-84 年间连续三年增长。注意粮食销售的现金回流有延迟，在每年晚期及次年早期的主要收割之后。



来源：中国农业部向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报告，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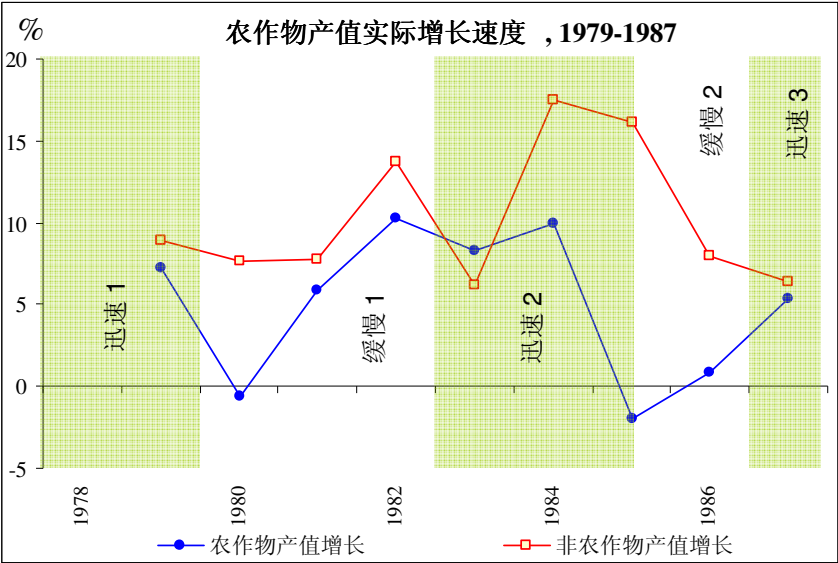
改革带来的成果就是产量的巨大增长，特别是粮食（见图4-4）及非农作物产品如畜牧业、渔业和副业。农民也可以自由使用剩下的资源，包括创业和制造业资源，来谋生。这些自主权要经常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并且常常是建立在改革前的“合作社产业”设施上的，它们造成了农村企业的爆炸性发展，这些企业也被称为“乡镇企业”。

在城市地区，于1984年10月宣布的城市改革标志着多年来对以利润为导向的管理的改革达到了顶峰。其中，工业中的“厂长责任制系统”与农业土地改革相对应。尽管这个新系统存在着向短期利润偏移的弊端，但对其的应用仍对1984年及1985年初的城市

工业活动造成了一阵骚动。

图 4-5. 1979—87 年间的粮食及非粮农业产出增长

1983—85 期间，所有农场产品均扩速扩张，但是例如畜牧业、渔业、非农作物产出、林业及副业等非农产出增长尤为迅猛，反映在合作社解体及土地、牲畜及生产工具非配给家庭后个人诱因的改变。



注：为了消除价格膨胀的影响，固定价格数据的转化使用了每个子时期的平减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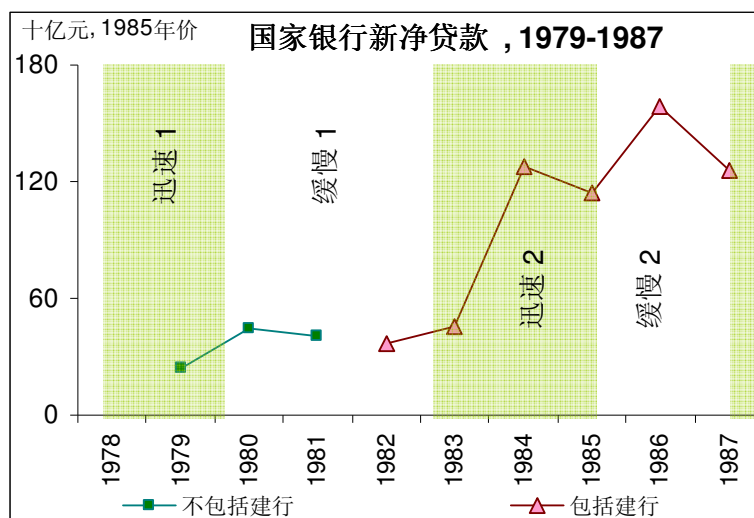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1990)，页 52-53。

与这些管理层面上的改革相一致，金融部门的改革使重组后的（国家控制）地方银行网点及信用合作社可以更方便的贷款给农村及城市企业。在1983-84年间，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鼓励这种行为。其结果就是在1985年前半段产生的过快的工业扩张及相伴的通货膨胀（见第二章，图2-1，2-2及2-3，1984-85年间的发展、投资及通货膨胀峰值）。

因此，对于1983-85年间快速发展时期的因果关系分析聚焦在以下假设：对城市和农村资产管理的自由化，以及资金、劳动力的大量涌现，加快了经济活动的步伐。

图 4-6. 1979—87 年间国有银行未偿付净新贷款

新重组的国有银行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发放贷款，而不仅仅是处理付款及政府帐户收入。1984 年这些新贷款的数额翻了三倍，大部分增长是在第三季度及出于工商业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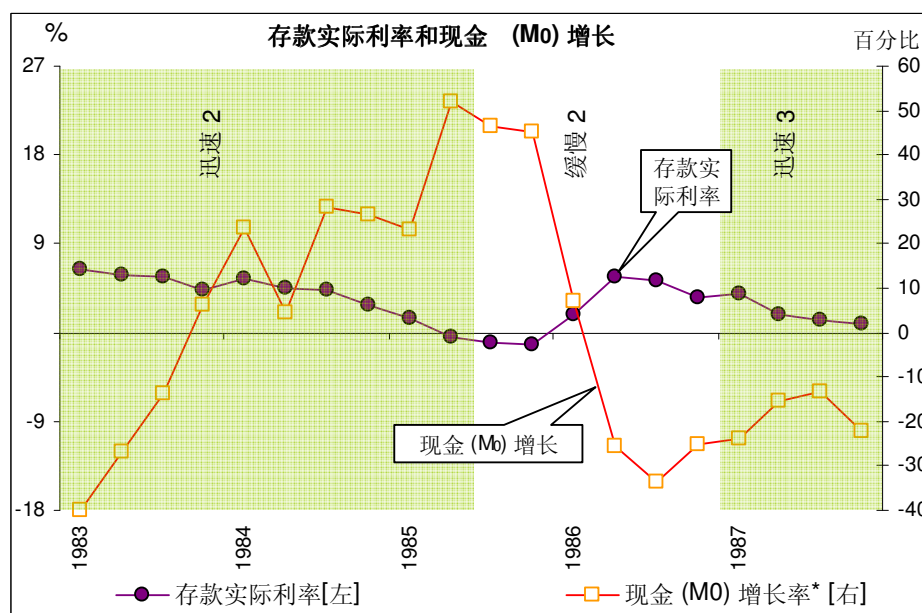


注：国有银行贷款重新定义导致了 1981 和 1982 年间的增长序列间断。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年鉴，多年。

图 4-7. 1983—87 年间季度性真实利率及流通中现金增长 (M0)

货币供给 (M_2) 在 1984 年后迅速增长，但是随着通货膨胀逐渐严重，流通中现金 (M_0) 在两个季度后的 1985 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比总货币供给更加快速的增长。此时由于票面利率几乎没有随着通货膨胀增长而做出任何变化，真实利率下跌到负值。



*注：流通中现金的增长被表示为流通中现金增长占货币供给总增长的比率。

来源：中国统计局，月度统计公告，1986 年二月，1987 年一月 页 78—80 及中国银行统计。

对符合此假设的统计学走向的抽样包括：改革政策的颁布时间（见表 4-2，4-3），

投资数据（第二章，图2-2），流通中现金的相对增长数据（第二章，图2-4，4-5），农村产量走向（图4-4，4-5）及银行贷款数据（图4-6）。流通中现金的模式尤其有用，因为它是季度数据而且显示了流通中现金在1985年前半年仍在持续增长，但在后半半年急剧减少。1985年的半年模式与工业增长的月模式及季度模式一致，在1985年的前半年出现超过20%的涨幅但在后半半年急剧减少。成因图表 4-3概括了因果关系的研究。

成因图表 4-4. 1983-85 快速增长时期成因解释

总成因结论：

假设是否被验证？ 其所需的论据及数据是否有效？*	有效？	证实？
1. 对外贸易是否刺激了 1983—85 年间的快速增长？		否
A. 出口是否在 1983—85 年间迅速增长？	否	否
B. 中国贸易逆差是否在 1984—85 年间迅速增长？	是	否
2. 农村土地改革是否明显刺激了总产量增长？		是
A. 土地、牲畜及农具的分配是否在快速增长之前？	是	是
B. 粮食产量及公顷产量是否在 1983—84 年间迅速增长？	是	是
C. 农业总产量，特别是非农作物，是否在此时期迅猛增长？	是	是
D. 农村家庭消费增长是否在 1983—85 年间大幅增长？	否	否
3. 银行的低存款利率及高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货膨胀是否导致流通中现金的暴涨？		是
A. 这个时期的流通中现金增长是否快过货币供给总增长？	是	是
B. 这是否于过低或负存款利率有关？	是	是
C. 高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货膨胀是否降低了真实利率？	是	是
D. 票面利率提升的延迟是否造成了低真实利率？	是	是
4. 改革刺激的投资资金是否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		是
A. 在此时期投资自身是否迅速增长？	是	是
B. 这一时期是否发生重大银行及其他金融部门改革？	是	是
C. 1983-84 年间政府赤字支出是否有大幅增长？	是	是
D. 银行对企业借贷是否在 1983—84 年间出现大幅增长？	是	是
5. 国有企业(SOE)监管改革是否刺激了产出激增？		是
A. 主要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厂长责任制系统，是否在此时发生？	是	是
B. 工业产出增长是否在国有企业改革后激增？	是	是

来源及解释：请见正文。

b) 1985-87 慢速时期的成因研究

政府对于1984-85年间的过热增长的反应带来了一系列紧缩经济的措施，用以减缓增长并降低通货膨胀。这些措施大体上都是行政方面的，比如限制银行贷款的数额而不是提高票面贷款利率。从年表4-4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些矛盾的措施带来的骚动。为了理解此周期中的慢速增长部分，我们必须再次集中研究那些显而易见的，旨在降低被认为是过度的通货膨胀的政府政策的力度。

图4-8显示了80年代的季度工业增长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次减速的特征。对于1985及86年来说，增长率的下降是巨大的：在调整季节变动后的每一季度的基础上来测量，增长率从1984年第四季度的每年30%下降到了1985年第三季度的0%。如此的增长波动虽不如上年同期般极端，但仍然是惊人的。

年表 4-4. 1985-1986 年间慢速时期的成因解释

Date	政策及事件
1985	国有企业信贷削减
1985 秋	国家领导人对粮食减产表示严重关注
1985 秋	两年(1986-87)的经济降温期公布
1985 秋	采取措施逆转过快的货币供应增长
1985 秋	银行严格削减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1985 秋	银行严格削减农村企业贷款
1986 冬	引入粮食种植奖励机制
1986 冬	决策者警告工业的官方增长率将严重下跌
1986 春	中央银行放宽货币供给
1986 秋	中央银行进一步放宽货币供给

来源：董 1999，第二册，多页；陈 1986，页 II-1 至 II-6；薛 1987，页 II-1 至 3；王 1987，页 32-33

图4-8中由两种不同的测算方法计算出的增长率的不同是具有指导性的。调整季节变动后的季度增长率的峰值与谷值始终比官方年度统计中的峰谷值早半年出现。事实上，这只是由于两种方法的性质不同。官方年度增长率其实采用的是前四个季度的季度变化的平均值。因此，它的显示结果自然的会有六个有的延迟性。这个延迟将会与我们对此段慢速时期成因的讨论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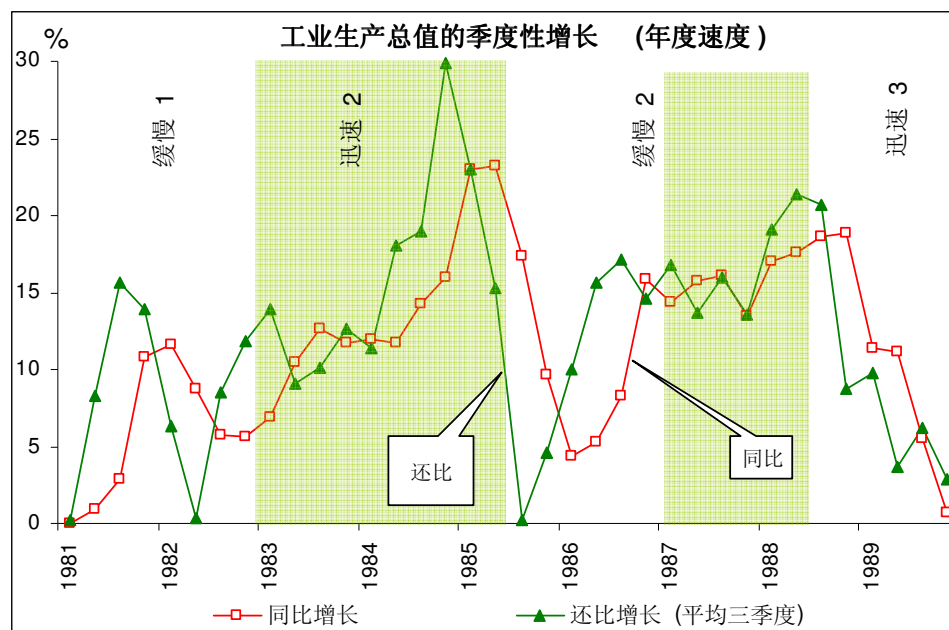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工业增长如此急剧的下滑？与其它子时期的情形一样，此次减速既不是对外贸易也不是财政政策措施能够解释的。图4-2中1985-87年间的走势显示在这段慢速时期中，出口仍然有相当的增长，同时进口趋于平稳。因此，出口下跌或竞争性进口暴涨都不是造成此次增长暴跌的原因。

在预算平衡方面，图4-1显示微小的预算赤字几乎没有变化。1984到1988年间收入与支出的双双下滑令人费解，因为传统上预算收入包括国有企业的毛利（包括未付折旧费用）。随着银行业、企业财务及税收在八十年代前半段的改革，预算收入中的这些成分逐渐消失并被税收所取代。同样，由于税后利润被企业保留继而直接被用来投资，一些国有企业中传统的预算支出，例如资本投资，也消失了。

所以，预算收入与支出两者在这个时期的下滑是由经济制度上的改革造成的，而不是税收下降。把工业增长减缓归咎于预算走向是没有根据的。

图 4-8. 1981-89 季度性工业生产总产值的实际增长

最动态大产出部门—工业，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剧烈的周期波动。数据显示传统的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率延缓了对真实改变，由与上季度同期比较数据更好的表达，的感知。这一延迟导致了政策的过度反应，加剧了增长的波动。



注：季节性增长率被换算成相应的年度变化率并且由对原始季度数据中三个季度的滚动平均值得出（为了平缓参差不齐的季度数据图型）。

来源：中国经济咨询服务（香港），中国经济新闻，多期，1980—1985 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1985—1989，及作者自己的计算。

其他的最有可能的成因就是政府针对 1985 年后半年出现的通货膨胀所出台的政策。实际上，当 1984 年末的货币供给扩张测量在 1985 年初期变得清晰时，信贷紧缩就已经开始了。1985 年下半年的通货膨胀显示出，政府加强了对减缓增长和价格上升现象的控制力度。

事实上，冷却经济的工作持续了太久，以至于造成了经济的过度滑坡。造成过长的信贷紧缩的主要原因在于之前提到的统计指标的滞后。在 1985 年后期，当季度性增长测量已经显示政策发挥了作用时，当时唯一的统计数字“年度增长率”仍继续显示过快的增长，引起了进一步紧缩经济的努力。此时，决策者们显然没有得到在调整季节变动后，这一时期的月度或季度统计。当与上年同期相比的测量显示出降温政策的成效时——经济已经被过度降温，这一发现导致了 1986 年底一次宏观经济政策的急速掉头（见年表 4-4），引发了接下来的快速时期。

因此，对 1985 年中经济急速下滑以及 1985-86 年间通货膨胀下跌的原因的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旨在控制经济行为的快节奏的政府政策是有效的一正确来讲是过度有效。

其余的解释并没有说服力。下面的成因图表概括了这一分析。

成因图表 4-5. 1985-86 慢速时期的解释

总成因结论：政府信贷收缩及其他旨在降温工业投资、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国内行政措施造成了这一慢速增长时期。

假设是否被验证？其所需的论据及数据是否有效？*	有效？	证实？
1. 减弱的对外贸易是否造成了 1985—86 年间的慢速增长？		否
A. 出口是否在 1985—86 年间大幅增长？	是	否
B. 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否在 1985—86 年间大幅增长？	否	否
2. 预算支出的下降及减速是否造成了 1985—86 年间增长减速？		否
A. 国家预算收入及支出是否由于改革而减少？	是	否
B. 中国预算赤字是否在这个时期大幅减少？	否	否
3. 政府是否宣布了削减投资及银行贷款的增长减速政策？		是
A. 政府是否在 1985 年早期颁布信贷紧缩政策？	是	是
B. 政府是否在 1985 年底三季度宣布对抗通货膨胀的政策？	是	是
C. 国有银行是否在 1985 年大幅削减城市及农村投资贷款？	是	是
D. 国有银行的净新贷款是否在 1985 年底下滑（相对于 1984 年）？	是	是
4. 工业增长的季度下滑是否对应着银行削减贷款？		是
A. 削减信贷的政策是否在 1985 年的前三个季度内颁布？	是	是
B. 1985 年的净新贷款水平相比 1984 年是否下降？	是	是
D. 工业产值增长（与上年同期相比）是否在 1985 年全年下滑？	是	是
5. 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是否将支出能力送回了银行？		是
A. 反通货膨胀倡议是否在 1985 年秋天开始？	是	是
B. 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货膨胀是否在 1986 年上半年大幅下滑？	是	是
C. 通货膨胀的这一下滑是否使真实银行存款利率变会正值？	是	是
D. 流通中现金的相对增长是否在 1986 年中期大幅下滑？	是	是

来源及解释：请见正文。

3. 1987-90 周期：通货膨胀，银行恐慌，信贷削减及严重下滑

从1987年到1990年末产生的中国的下一个“繁荣萧条循环”依然是由国内政策引起，但是这一次，市场经济力量使得周期性的极端发展更加严重。在前一时期，1985-86年，随着经济紧缩及下滑，中国面临着众多经济及社会难题，导致了1987年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但是却没能改变经济改革的方向，使得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价格调整和进一步自由化处于表现形式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故实用性措施是可以被接受。

但是，1988年的通货膨胀比之前改革时期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它激起了在1988年后期的一项旨在削减投资信贷，及将通货膨胀在1989-90这两年目标时间内降到正常水平的计划。在1988年大力实行的这次经济紧缩，特别不受城市地区所欢迎。到了1989年后期，产出已经下跌；到1990年，产出及通货膨胀都已处于低水平。1990年后期，

随着两年目标时间的结束，国家决策人决定振兴经济。尽管此次循环为时不长，但期间的波动却很猛烈。

a) 1987-88 快速时期的成因分析

1987和1988年中出现的通货膨胀及过热增长似乎是由诸多因素所造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率政策迟滞。这一阶段是由初期的，旨在为了抵抗过度信贷紧缩且几乎引起恐慌的政策掉头拉开序幕，但是政策自身并不足以引发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是1987年进行的，针对农副产品在城市销售的价格改革，由于改革的自身特性，引起了价格的上涨，最终导致了全面的通货膨胀。1988年初，更多的价格改革建议，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于通货膨胀得恐惧。最终，缓慢的利率政策带来了危机。到1988年中期，官方已无力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来跟上通货膨胀，导致了随着价格进一步恶化而出现得银行现金取款恐慌。带来的结果就是城市消费者惊惶地将货架及存货一扫而空。

年表 4-5. 1987-1988 快速增长时期

Date	政策及事件
1987 冬	保守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更换总理
1987 春	“养猪危机”爆发，政府规定的较低的猪肉价格导致普遍的幼猪遭到屠宰
1987 春	价格改革提高了肉类及其他农场付产品的价格；城市收入也有增长
1987 秋	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任何实用的政策都是可行的。
1987-88	自由的货币政策迅速地增加货币供给及流通中现金。
1987-88	国有企业改革加剧了国有企业经理与党支部书记间的矛盾
1988 3 月	五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代总理接任总理职位
1988 春	新一轮国内物价改革开始
1988 夏	一年一度的党政军暑期研讨对价格改革进行辩论
1988 夏	通货膨胀、银行恐慌及狂乱的消耗品购买清空了货架

来源：董 1999，第二册，多页

在1986年早期，这一子时期开始前，信贷紧缩政策几乎在十二个月里将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货币增长减少到只有5%。为了应对似乎突然转变的过度缓慢的工业发展，政府在1987年早期将货币总量及流通中的现金增加了20%以上。这一次信贷及货币供给的增长为之后的过热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及其它子时期的货币增长模式见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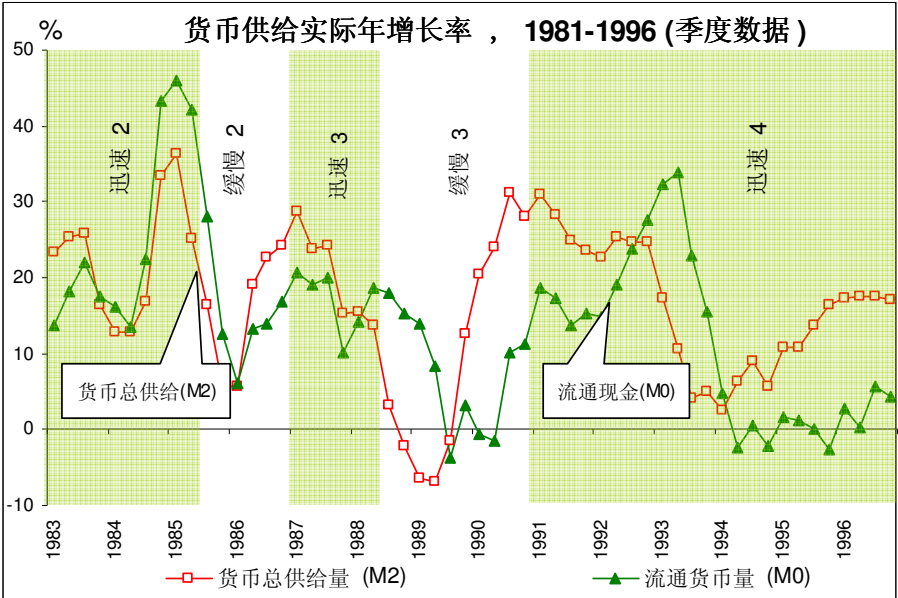
首先是什么造成了通货膨胀的复苏？鼓励信贷扩张的政策是原因之一，但是价格改革，特别是提升了城市居民食物价格的改革，似乎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85-86年间的农村政策转变以及1985年粮食上缴配额的完成，引起了市场粮食价格随着时间逐渐上涨。同时，其它农产品价格仍然受到控制，特别是占肉类消费90%的猪肉。由于粮食价格升高但同时猪肉价格又被限制在较低水价，猪业在1987年早期成为了一项赔钱的买卖，一场“养猪危机”爆发了，养猪户杀掉了母猪和幼猪，以避免成猪被低于成本价出售。为了解决此问题，新上任的国家副主席李鹏，于1987年抬高了猪肉及其它农副产品

的价格并同时为城市家庭作出补贴，来应对更高的城市食物价格。这一提高价格及收入的政策组合为过热的增长及通货膨胀打下了伏笔。

最后，在1987年党代表大会及1988年新任领导班子上任的余波中，一系列改革倡议，特别是价格改革倡议，开始在决策者中流传。1988年春，政府宣布计划实行一套以提升主要消费品种零售价格的价格改革新方案。1988年夏，对这些价格改革范围的辩论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预期。消费者的预期是，及实际的价格上涨和银行储蓄低利率，刺激了当时的消费。

图 4-9. 总货币及流通中现金的年度增长

货币供给增长及快慢周期中间的联系强调了这一区域的政策变化常常为随即的快速或慢速周期打下伏笔。1987—88年间的快速周期开始使货币增长已然很快；1988—90年间慢速时期出现全面的慢速甚至付真实货币增长但是同时流通中货币却激增。



*注：真实货币合计增长是经过季度性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的。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数据及国家统计局月度公告，自 1985—86。

图4-9中的数据显示直到1988年初期到中期，尽管货币量加速增长，但流通中的货币量比总货币量的增长速度要慢。随着现金从银行流出，这个情况在1988年夏天发生了转变。见图2-4及第三章中关于此时期流通中货币量暴涨的分析（M0）。当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无力以提高票面银行存款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时，市民感觉到通货膨胀以及预期的进一步价格改革会削弱他们的银行存款的购买力。他们在1988年夏突然将存款从银行中取出，惊惶地涌去购物，急剧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显然引发了关于推迟进一步价格改革同时将通货膨胀重新控制住的政策辩论。

图标4-5中概括了这些成因分析。

成因图表 4-6 1987-88 快速时期的成因解释

总成因结论：1987—88 年间过热的增长是由价格改革及政策、数据的缺点造成的，并不是由外因造成。更高的食品价格及更多的城市收入补贴最先出现。接下来年度增长率延迟了准确的产量报告。最终，僵硬的低银行利率造成存款贬值，引发了取款和购物狂潮。

假设是否被验证？其所需的论据及数据是否有效？*	有效？	证实？
1. 对外贸易或投资的改变是否造成了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加速？		否
A. 是否出口大幅下滑同时贸易逆差却几乎不变？	是	否
B. 这一次外国投资是否是重要因素？	否	否
2. 政府刺激是否为本次大幅增长做出了贡献？		否
A. 政府支出是否在这一时期大幅减少？	是	否
B. 微小的政府赤字在这一时期是否几乎没有变化？	是	否
3. 统计测量的延迟是否造成了 1987—88 年间的过热？		是
A. 政府是否在 1986 年宣布重新刺激经济？	是	是
B. 1986 年开始的货币供给增长是否在 1987 年仍在继续？	是	是
C. 工业增长是否在 1986 就大幅提升但是在 1987 年的官方统计数据中才显示出来？	是	是
D. 1987 政策是否在 1987 年的加强的价格改革中延误了平均货币增长？	是	是
4. 政府的太搞了部分物价的物价改革是否刺激了通货膨胀？		是
A. 政府是否在 1987 年引入了重大的行政价格调整？	是	是
B. 1987 年下半年通货膨胀是否经历了从个位数字低位到高位的增长？	是	是
C. 1988 年早期通货膨胀是否由于新公布的价格改革而增长到两位数字？	是	是
5. 在提升利率方面的政策延迟是否严重加重了通货膨胀压力？		是
A. 票面银行存款利率是否在 1988 年全年保持 10% 以下？	是	是
B. 1988 年超过 10% 的通货膨胀率是否造成了真实利率负值？	是	是
C. 真实利率负值是否引起了银行取款及购物狂潮？	是	是
D. 季度货币数据是否显示流通中现金增长在 1988 年中期激增？	是	是
E. 流通中现金的激增是否与通货膨胀在 1988 年后期的进一步激增有所关联？	是	是

*注：一个论据可能是真的但是仍然不能检验一条假设；同样，对相关论据的不成功的检验也有可能支持假设；这都决定于已知关系的逻辑。

来源及解释：见正文。

经过上述对历史事件的总结，复苏且急速增长经济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看来很成因包括了1986年后增长复苏的突然发力，急进的价格改革倡议，特别是针对农产品的价格改革，以及利率政策上的失误。还有因素可能造成1987-88年间的增长加速和通货膨胀？几种可能包括对外贸易刺激，政府预算刺激及国外直接投资的增产。

不过，统计学记录并不支持这些外在因素。这一时期的出口实际上在下滑，而且中国的外贸赤字一直保持稳定（见图4-2）。预算支出及收入在这一时期双双下滑，保持了微小的赤字。这些模式与人们在解释增长和通货膨胀暴涨时所期望的结果恰恰相反。此外，此时的国外直接投资作为总投资的一部分还无足轻重。中国的宏观经济在这一子时期的波动似乎再一次由国内因素所造成。

b) 1988-90 慢速时期的成因分析

1988-90年间的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在一些测算中出现了负值（见图2-1），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但是中国在这几年经历了社会动荡及政治变化。始于1988年后期的一次强有力的信贷收缩，使得第四季度的工业产量增长率在调整季节变动后的测算中降低了超过一半（见图4-8）。1989年春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国内其它主要城市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及工人示威。随着1989年6月以军事镇压结束的示威游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发生了变化，并加强了对在1988年后期宣布的反通货膨胀措施的施行。投资行为在1989年急剧减少，到1989年第四季度，工业产量增长在所有测算中都接近零点（见图4-8）。截止到1990年第三季度，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显示的通货膨胀事实上已经为零（见第三章，图3-3）。

年表 4-6. 1988-1990 年间的慢速增长时期

Date	政策及事件
1988 秋	银行信贷及投资活动的剧烈收缩
1988 秋	两年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宣布启动
1989 春	针对通货膨胀及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
1989 春	银行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保值储蓄）
1989 春	针对通货膨胀及信贷紧缩的示威游行
1989 秋	信贷紧缩计划加强
1990 冬	粮食种植规定加强以保证粮食供应和物价的稳定
1990 春	旨在消除企业间债务互锁（三角债）的项目启动
1990	对 100% 外资企业的强力法律保护
1990 12 月	中国共产党大会决定结束为期两年的反通货膨胀计划 (1989-90)

来源：董 1999，第二册，多页；王 1981，页 II-79ff

这一周期中的低迷时期清楚地反映了官方政策，即针对1988年通货膨胀的政策和1989年下半年的加强实行。1988年夏天的提款事件及耐用消费品购买恐慌，让政府领导人意识到要快速减慢投资、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对紧缩信贷及推迟两年施行的进一步的价格改革的决议似乎是在1988年八月被通过。紧缩政策在秋天被正式执行，其效果最终在1989年完全显现出来。

年表4-6显示了政策倡议与第二章图2-1至2-4中展示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投资增长、通货膨胀及货币供给中的改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确保银行存款可以得到至少与消费物价指数增长持平的利率的决议与第三章中记录的1988-89年间银行现金流出的逆转强烈相关。

成因图表 4-7. 1988-90 年间慢速增长时期成因解释

总成因结论：1988 年开始，政府对显而易见的减速计划的实施更加有效，紧缩了信贷并依比率减少了投资与货币供给，造成了 1990 年之前这一时期较慢的，如果是非负的，增长并且消除了通货膨胀。1989 年的社会动荡几乎肯定影响了产出，但是它也引发了对 1988 年政策倡议更加严格的执行。

假设是否被验证？ 其所需的论据及数据是否有效？*	有效？	证实？
1. 1988-90 年间对外贸易的改变是否减缓了经济发展并且压制了通货膨胀？		否

A. 1988 年由于出口几乎没有减少，贸易逆差是否减少？	是	否
B. 出口及贸易顺差是否都在 1990 年明显增长？	是	否
2. 政府的预算削减是否造成了这次增长暴跌？		否
A. 1988—90 预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是否明显下滑？	否	否
B. 这一时期政府的微笑赤字是否几乎没有变化？	是	否
3. 政府公布的旨在减缓增长及通货膨胀的政策是否造成了这次暴跌？		是
A. 政府是否在 1988 年公布了对信贷和投资的大幅紧缩？	是	是
B. 政府是否在 1988 年晚期延迟了进一步的价格改革？	是	是
C. 货币供给是否在 1988 年第四季度出现负值？	是	是
D. 货币供给是否在 1989 年前半年出现更严重的下滑？	是	是
E. 中央银行是否在 1989 年将存款与通货膨胀挂钩？	是	是
F. 流通中现金的增长是否随即大幅下滑？	是	是
G. 1987 年政策的延迟是否意味着加强的价格改革中的货币增长？	是	是
4. 1989 年的社会及政治动荡是否造成了这次减速？		是
A. 大范围的社会动荡是否在 1989 年第二季度爆发？	是	是
B. 工业产出增长是否在同一季度暴跌？	是	是
C. 在 1989 年严厉的镇压后，政策执行是否被加强？	是	是

*注意：一个论据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仍然不能检验一条假设；同样，对相关论据的不成功的检验也有可能支持假设；这都决定于已知关系的逻辑。

来源及解释：见正文。

对外贸易或国内预算变化是否影响了这几年经济的严重低迷？统计记录再一次显示了否定。图4-2清楚地显示了1989年在出口量轻微下滑的同时，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变得更小。在1990年，中国的出口剧烈增长，贸易逆差转变为高额顺差，但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恢复则参差不齐，支出数据显示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恢复但生产数据却显示其仍在下滑（见第二章，图2-1）因此，出口增长可能先行于1991年的增长恢复，但是不存在造成总体增长减慢的出口暴跌。同样，1988-90年间的预算数据显示，作为全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收入及支出水平实际上没有变化。

对这次增长减速的其它可能的解释包括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其扰乱了大部分中国主要城市特别是北京的社会秩序超过一个月，给全国各城市地区的社会混乱明显带来了严重干扰。事实上，调整季节变化后的季度工业增长率（对政策影响最精确的测算）的突然下跌显示了急剧了产量下跌正好在1989年第二季度开始（图4-8）。此外，在六月四号后加强的国内秩序为1988年第一次提出的宏观经济紧缩政策的施行提供了支持。

尽管如此，中国放缓增长的政策明显是在动乱发生之前的1988年开始，作为对当年夏天通货膨胀激增的应对措施。1989年春的利率标定指数也比动乱要早，而且与经济放缓有着相关性。因此，尽管社会动荡和相关的纪律措施，在这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及通货膨胀下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们只是起，到一定作用并不是根本原因。

成因图表 4-6显示了1988-90年间的慢速增长时期的成因分析。

4. 1991-2000 周期：城市价格改革，下岗和增长衰退

接下来的一个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几乎跨越了90年代的全部十年，这个周期对研究周期本身及国内需求，包括家庭消费需求，所扮演的角色来说可能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它见证了90年代早期国外直接投资的激增，先前未完成的价格改革的终结，一场与过热通货膨胀的较量，中国农村地区迟来的繁荣，以及90年代后期轰轰烈烈的企业改革和职工下岗。农村地区在此周期里的参与非常重要，虽然在本章只是轻轻带过，但是将在本报告之后的部分进一步分析。

a) 1991-96 快速时期成因分析

1991国民生产总值突然暴涨（官方公布超过9%，支出方法分析得出10.5%）标志着一个长达六年且速度最快、最持久的发展阶段的开始，也迎来了1978年改革时代开始后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1992-93年间的过热发展引发了1993年中期一次剧烈的信贷收缩，但是增长和通货膨胀仍然继续了3年，部分归因于农村经济释放出的市场和宏观经济力量。到1996年底，随着城市发展的放缓，农村经济也重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动力。

年表 4-7. 1991-1996 年间的快速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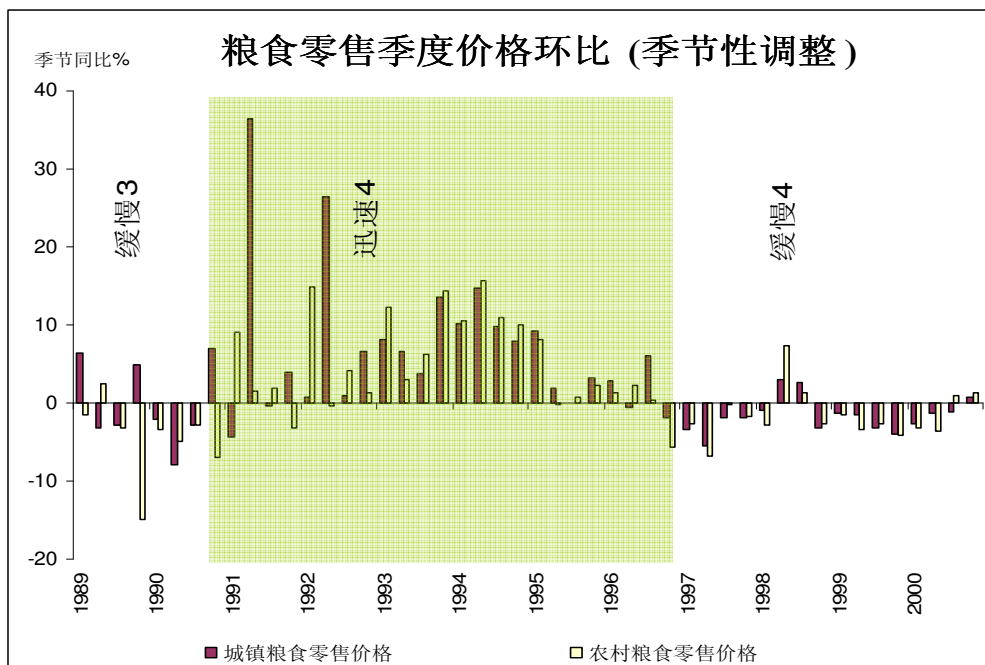
日期	政策及事件
1991 春	城市被行政管理的粮食价格明显上涨
1991	存款及贷款利率下降
1991	商业化“四大改革”自由化了管理，价格，分配和劳动力
1992 冬	邓小平“南巡”，为市场改革添加了动力
1992 春	粮食配给终止，粮食价格再次大幅上涨
1993 夏	央行行长被撤职；留号文件启动了 16 条信贷紧缩措施
1993 秋	银行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
1993 秋	党全体大会为这一年代制定了改革日程
1994 冬	双重汇率系统终止，汇率稳定在 8.7 元/美元
1994	行政采购价格提高，例如煤、石油、粮食、棉花、油类
1995 晚秋	省官员下令粮食增产来抵抗粮食价格通货膨胀
1996	1994 试水的工人下岗及再就业计划扩展到 200 个城市中。
1996	新的五年计划包括 1995 年的企业改革，“弃卒保车”（“Hold onto large, drop the small”）

来源：董 1999，第二册，491—494 页；高 1993；宏 1995；Bidani 等人 2002；Garnau 等人，2004，页 3。

邓小平（Deng Xiaoping）在1992年初著名的“南巡”（“Walk in the South”）中发表讲话，表示对市场改革的大力支持。国民生产总值复苏结果被夸大，成为对90年代早期经济发展复苏的被普遍接受但却不正确的一种解释。年表4-6及4-7显示中国的快速增长在邓小平南方视察前的1991年就已经恢复，与1990年后期的一系列政策决定及货币走向相关。图4-9中的季度货币数据展示了之前货币政策宽松的影响，因为货币供给（M2）在1990年后期激增，随后1991年前期流通中现金（M0）也出现快速增长。

图 4-10. 1989-2000 年间的粮食价格改革经季节调整后的季度数据

早在 1991 年和 1992 年，中国价格改革政策便分为两个阶段，从行政上明显提高了城市零售粮食的价格。配给终止。城市及农村地区一段延长的由市场驱动的粮食价格通货膨胀时期在 1993 年中期严格紧缩信贷的政策被施行后开始变得严重。当被控制之后，粮食价格在 1997—2000 年这四年中持续下滑。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公报，多年，及作者的计算

1990年还出台了旨在治理连锁性债务积压的（即所谓的“三角债”）——一种造成企业间交易冻结的环式应收款帐户及应付款帐户。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政府指示在中央银行的支持下的商业银行，发放战略性贷款，以向那些经分析显示会引发向下付款连锁反应的机构注入资金。这一举措及其它信贷及货币政策恢复了企业间交易以及总体流动性。第二章图2-2显示了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投资增长从1990年的2%上升到1991年的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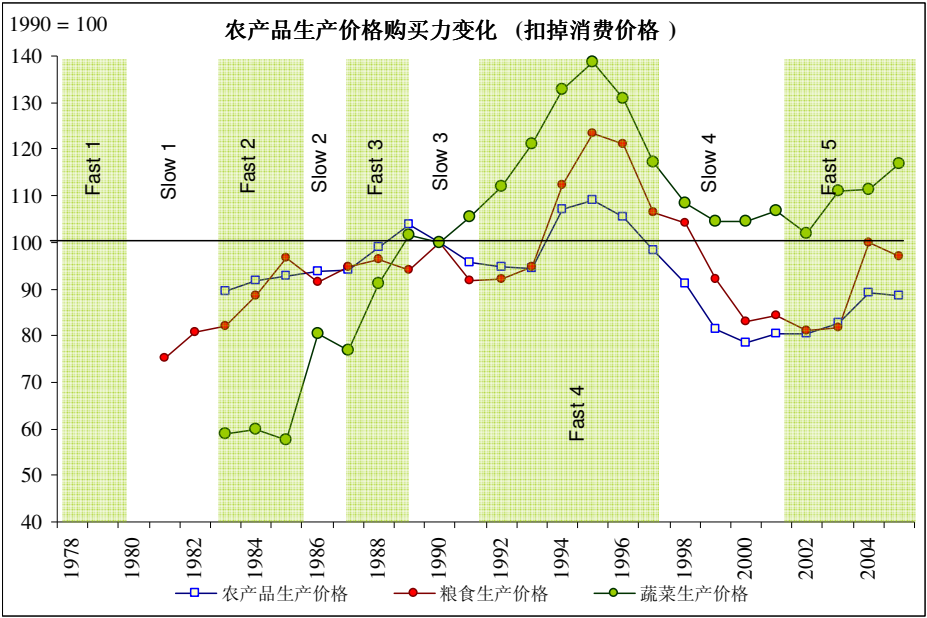
改革倡议方面，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前近一年的1991年3月，中国开始施行对城市粮食价格的显著改革。粮食价格在一个月之内升高了35%。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城市粮食零售价格改革在次年（1992年的4月）到来，将粮食价格再次提高了25%。图4-10显示了关于这次两个阶段的价格改革的数据。此次粮食价格改革的第二阶段还消除了自50年代便 在城市居民中使用的、可以以补贴价格购买粮食的粮票，城市户口家庭的收入也被通过行政手段调高，以弥补家庭预算中粮食消费的提高。第三章图3-3中的数据显示，尽管经济处于这些改革中，但是总体消费者物价指数只有适度的升高，1991年全

年大约升高5%，1992年的增长率也未达到10%。

因此，邓小平“南巡”带来的影响并不完全清楚。1992年价格改革第二阶段的政策争执是否影响了其实施？尽管担心通货膨胀，但邓小平的话实际上却鼓励了通货膨胀的发展（是否使其可以继续实施）不过，到1992年后期，官方显然开始忧虑高个位数的通货膨胀，第三章图3-3显示到1998年六月，通货膨胀已经爬升到十位数。

图 4-11. 1981-2005 农村农场交易价格的购买力水平

农民收到的农产品出售价格，经农村生活品价格调整后，在1995中得到改善——在1994年中更为明显——但在之后的九十年代后期出现下滑。粮食价格在2004年恢复到1990年时的真实价格水平。



注：2001 年中的蔬菜价格缺失，所以这些计算将对所有农产品价格的计算应用到当年的蔬菜价格上。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多期。

为了应对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对银行信贷施以严格控制的政策于1993年六月开始迅速实施，并持续加强至秋季（见年表4-7）。不过奇怪的是，这一次的信贷紧缩并没有发挥作用。

成因图表 4-8. 1991-96 年间快速增长的解释

总成因结论：这一快速增长时期早期的增长是由 1990 年旨在扩张货币供给及信贷的政策，以及 1991 年开始并持续到 1992 年的、受到邓小平 1992 年“南巡”鼓励的、两个阶段的价格改革所引发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也在 1992-93 年间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其后则作用不大。这个子时期扩张之后的加速及通货膨胀似乎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1994 年货币贬值引发出口的增长是当年一个次要的因素。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及财政刺激都不相关。

假设是否被验证？其所需的论据及数据是否有效？*	有效？	证实？
1. 对外贸易是否引发了 1991-93 年间早期的增长		否
A. 出口是否在 1991 年显著增长？	是	是
B. 贸易顺差是否在 1991 年中增长？	否	否
C. 出口及贸易顺差是否在 1992-93 年均出现下滑？	是	否
2. 对外贸易是否造成了 1994-96 年间令人吃惊的增长加速？		否
A. 出口及净出口是否在 1994 年中大幅增长？	是	是
B. 净出口在 1994 年中对国内生产总值作出的贡献是否重要？	否	否
C. 出口或净出口是否在 1995-96 中出现增长？	否	否
3. 外国直接投资是否造成了 1991-93 年间的增长井喷？		是
A. 1993 年中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是否似乎足够强劲使其成为重要因素？	是	是
B. 1993 年中平均汇率的贬值是否夸大了外国直接投资？	是	否
4. 外国直接投资是否影响了 1994-96 年间高速增长的持续？		否
A. 外国直接投资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是否在 1994-96 年间崩溃？	是	否
5. 政府预算支出的激增或其赤字是否促进了增长？		否
A. 预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列是否在 1991-96 年间减小？	是	否
B. 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1991-96 年间是否几乎没有变化？	是	否
6. 刺激信贷及货币增长的政策是否造成了 1991-93 年早期的国内生产宗旨增长？		是
A. 1990 年晚期的官方会议是否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反通货膨胀运动？	是	是
B. 1990-91 年中的政策是否明显增加了企业信贷？	是	是
C. 货币供给增长是否在 1990 年快速恢复？	是	是
D. 是否所有的利率（存款及贷款）都在 1991 年大幅下降？	是	是
E. 流通中货币的增长是否在 1991 年显著加速？	是	是
F. 投资的真实增长是否从 1990 年的 2% 加速到 1991 年的 15%？	是	是
G. 官方报道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否从 1990 年的 4% 增长到 1991 年的超过 9%？	是	是
7. 1994-96 年间持续的两位数增长是否反映了官方政策？		否
A. 明显的经济降温措施是否在 1993 年 6 月开始？	是	否
B. 使存款利率等于通货膨胀率是否结束了净银行提款？	是	否
C. 全部货币供给及流通中现金的增长是否在 1983-84 年间暴跌？	是	否
8. 1994-96 年间农产品价格的飞涨是否刺激了农村发展？		是
A. 1991 至 1995 年间蔬菜价格是否经历了飞快的上涨？	是	是
B. 粮食价格是否在 1994-95 年间经历了迅速上涨？	是	是

注意：一个论据可能是真是的但是仍然不能检验一条假设；同样，对相关论据的不成功的检验也有可能支持假设；这都决定于已知关系的逻辑。

来源及解释：见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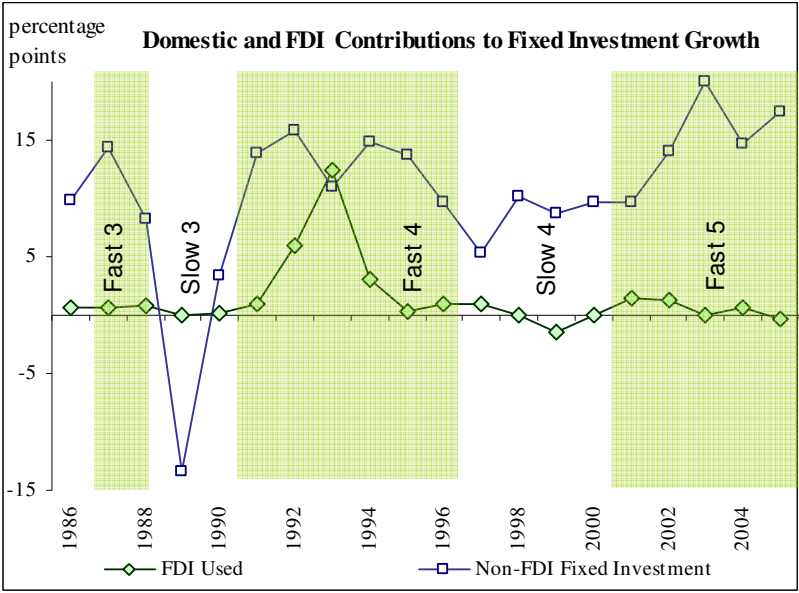
1991-92年间，由于政府采购指导价格出现了暂时的崩溃，城市粮食价格的自由化引发了农村地区粮食市场非正式的自由化，随着农村粮食及其他农作物价格在1994年中的上涨，官方采购价格不得不作出相应调整。见图4-11显示了当时农村农场采购价格的显著上扬。1994年提高的采购价格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暂时逆转了农村生活水平

的提升慢于城市的状况)。本报告后面会更加详细地分析九十年代的农村发展。可以说，农村收入的提高为1991-96年间的快速发展时期在1993年对国内过热增长试图降温后的扩张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解释。

另一个对1994年经济持续的强劲增长作出贡献的因素是与1992年国外直接投资快速累积和1991-93年中正在进行的中国双重汇率系统商业汇率贬值及1994年一月一日的一次性官方汇率贬值相呼应的出口加速。在繁荣时期（1991-93）早期，出口下滑，对外贸易出现逆差（见图4-2），所以对外贸易显然不是繁荣时期最初三年的成因。但是出口及贸易顺差确实在1994年中出现跳升，不过在随即的1996年，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出现下滑（见图4-2）。

图 4-12. 1986-2005 年间国内及外国直接投资对固定投资真实增长的贡献

中国总的固定投资增长经过了明显的暴涨和暴跌，但是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数据显示这个图形的形成几乎都是受国内波动影响。唯一的例外是 1993 年的暴涨，当时外国直接投资明显的贡献与国内投资相等。中国实际上的汇率在 1992-93 年间严重贬值，使得这几年中的外国直接投资被夸大。



注：以美元标识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平均汇率换算至人民币，并以国内投资价格平减指数调整。这一投资的真实走向随后与国内的对等物进行比较。请注意国内平减指数可能无法完全说明反映了 1991-93 货币贬值的国内价格变化。
来源：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多年。汇率为官方公布汇率，除了 1981-93 年为中国的多重汇率的加权平均数。

出口是否是中国在1994年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因？中国官方及国际测量方法对当年增长的测算都在13.5%左右——一个极端快速的扩张步伐（见第二章，图2-1）。简单的计算得出这一增长中仅有3.1%归因于贸易扩张。其余部分要归因于国内消费及国内投资需求的组合。因此，虽然贸易为1994年经济持续增长作出了贡献，但把其看作是一个起作用的因素而不是主要成因则更为合理。

九十年代中期这一繁荣时期也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最汹涌的一年。但是图4-12

显示其对整体投资增长仅在1992-93年间作出有力贡献。外国投资在这几年迅猛增长，但是这几年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价值也由于1991-93年间的中国商业兑换汇率贬值而提高。中国在这一时期拥有双重汇率，其中第二种汇率有一个不恰当的呢称—“掉期率”，其官方名称为“外汇调整市场”汇率。除去这个曲解，外国资本的流入在中国1992-93年间经济飞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可靠的。但是图4-12也显示了这些影响在1994-96年间大为减弱，所以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能解释1991-96年间的扩张中的持续快速增长。

关于政府预算及财政政策，图4-1清楚地显示了在整个1991-96年间收入与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有的比例 均在下滑，除了在1994年中微弱增长微小的赤字也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因此，财政政策对增长的刺激即使不为负，也是可以被忽略的。

总体上，纵观1991-96年间的快速增长时期，增长的加速是一个包含两个阶段的过程。上面的成因图表 4-7对此成因分析作出了概括。

b) 1997-2000 年间慢速增长时期的成因分析

在九十年代末，具体说是1997-2000年年间，国民生产总值明显放缓，特别是通过支出方法计算出的增长（见第二章，图2-1）。在这几年中，通货膨胀亦被消除，有些价格指数甚至显示物价下降（第二章，图2-2）。其他众多发展也集中在这几年中。例如，政府发起了企业改革，大量工人下岗（laid off）待业。亚洲金融危机也给其他许多亚洲地区及国家带来了经济及金融混乱。

对1997-2000年间，压抑住通货膨胀的减速存在着至少四种互不相容的解释。第一是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二则主张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取得的成功如此巨大以至于中国实现了“过剩经济”，其意味着产品供应超过需求。第三种可能是政

年表 4-8 - 1997-2000 年间的慢速增长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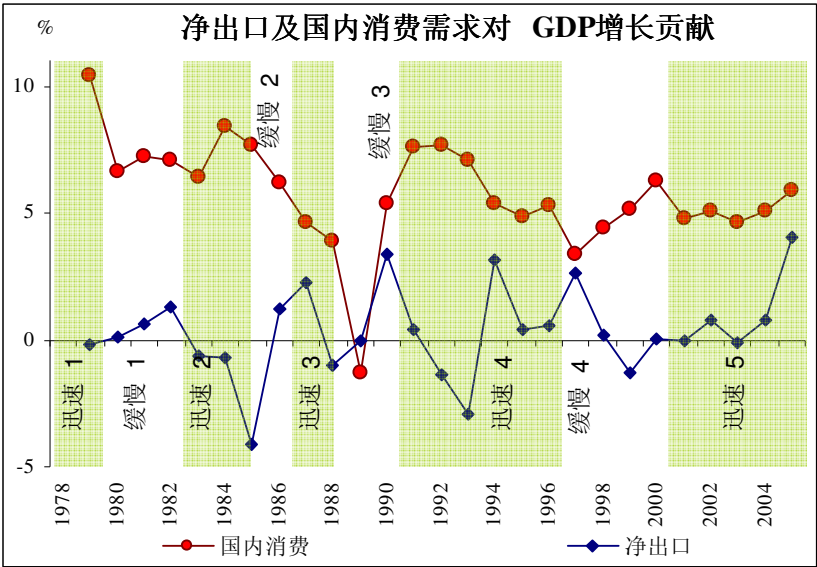
Date	政策及事件
1996-97	消除了外国直接投资的税务优惠
1996-99	1999 年六月利率七次下调—最多一次下调 1.5%
1997 冬	中国媒体广泛报道国有企业亏损
1997	亚洲金融危机，在南韩、泰国及印度尼西亚尤其严重
1997	国企职工开始大规模下岗
1997	三层城市社会保障网启动
1998	以增加公共投资支出为手段的经济刺激战略开始
1998	升级的“西进”政策加强了投资刺激
1999	中国同美国议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0	粮食种植要求明显放宽
2000	安徽“费改税”改革开始削减农村的税收及收费负担
2000	部分乡镇开始农村政府合并，人员削减

来源：董 1999，第二册，多页；新闻剪辑

府在四年前的1993年为了缓解过热及通货膨胀开始实行的“软着陆”方法，这些旨在削减投资及银行贷款的政策措施最终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冲击。第四点，由于农村家庭消费在九十年代后期连续三年出现的负增长，加上农场价格的崩溃，国内消费者有效需求的匮乏以及相关投资减缓的雪上加霜，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全面减速。

图 4-13. 净出口需求*及国内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支出帐目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国内及国际部分显示大多快慢子时期与净出口及经济活动之间如果有的话，也只有很小的负关联。特例是 1998 及 2005 年—每个快慢时期的后期当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净影响与整体经济行为方向一致时。



*注：净出口指货物、服务贸易，付款基础余额。

**注：子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表达为百分率，与增长率同总长份额的成绩相等。它们被相加来取得总增长曲线。对于支出帐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见第二章图 2-1。

来源：支出帐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及多个价格指数，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报，多年，及计算。采用 Keidel 2001 的方法。

1997-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冲击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转变。图4-2中对外贸易的图形显示，尽管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1997年增长了几个百分点，但是在此之后的2000年—此次慢速子时期的最后一年—暴涨之前，出口却先是出现了下滑而后又趋于稳定。不过，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和逆差之间的变动，是对外贸易直接影响国内生产总值需求的最相关渠道。图4-13显示了在1997-2000年间的慢速时期的开始阶段，净出口实际上刺激了而不是拖慢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最明显的结论是并非贸易暴跌打击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实际情况是贸易积极地抵消了部分造成增长低迷的因素。图表还显示净出口负值在这一慢速时期可能带来了冲击的证据只在此子时期开始一年后（1997年）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后出现过。更甚者，图4-2显示净出口需求的此次下滑不仅来得较晚而且是由于进口暴涨导致的。范例可能是更强大国内需求，更宽松的进口政策，或由于众多亚洲竞争对手在

金融危机中货币贬值，从而导致的中国进口市场的繁荣——或者以上几点的结合。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数据显示，尽管跌幅比1997-98年间的跌幅小，存货在1999年已是第三年持续减少。国内存货的持续减少增加了进口并未严重驱逐国内生产及输出销售的可能性（见图4-15）。

亚洲金融危机给有利于中国的贸易汇率及相应的进口竞争力带来了冲击，就1999年中净出口衰减反映出的这一冲击的程度而言，我们可以说这场危机可能是严重的，它可能是慢速时期在1999年触底的原因之一。但是持续了一年的在时期末的而且是短时期的危机的影响是次要的。除此之外，中国的通货膨胀在危机之前，也在中国与危机相关的货币有效重估值对通货膨胀带来可能的影响之前就已经跌到接近零点。所以整体上的结论一定是亚洲金融危机对贸易的影响并不是引发1997-200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严重下滑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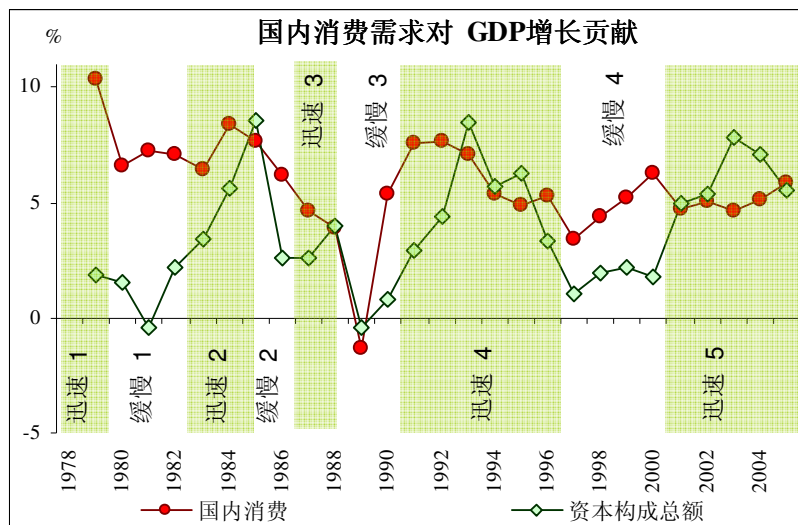
在外国投资方面，数据走向及政策时间的组合，严重降低了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明显削弱外国直接投资（FDI）而伤害到中国增长的说法的可信度。图4-12显示外国直接投资在整体投资增长中所占比率在1996-1999年间下降了2.5%，这一下降与1995至1997年间源自国内投资的10个百分点的下降相比起来是微小的。单在1997年一年，源自国内的投资就下降了4%，将整体投资增长拉低到6%——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外，外国直接投资在1997-99年间的减少深受1996年中被撤销的一系列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重大税收优惠的影响。这一变化在同外国直接投资下降的结果中明显地显示了出来，与之前的且与亚洲金融危机无关的税收政策变化在时间上非常吻合。因此，数据走向及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两者的图形都极具说服力地说明了亚洲金融危机给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影响并不是造成中国在1997-2000年间经济发展减速的重要因素。作为最后的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并未造成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增长减缓。

对这一时期慢速增长的“剩余经济”这种解释也很难令人信服。在农村及城市地区，中国一般及高档消费品的人均消耗水平远远低于世界标准。拿这些数据与国际做比较很难得出中国国民满足于其对食物、服装、交通工具、娱乐及个人服务的需求的结论。未被证实的消息认为被削弱的需求量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2002年，作者之一与河南省中部一家镇区方便面厂的经理进行了面谈。这位经理解释说，销售于1997年中崩溃并不是因为农民厌倦了方便面，而是因为农民们买不起方便面了。

图 4-14. 1979-2005 国内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内需求部分走势显示了投资及消费两者在 1978 年后决定总增长率时的强大角色，随着消费在除去最近几年中的全面领先。两者在 1997 年都大幅下滑。2003 年投资井喷反映了意在对抗非典型性肺炎的政策的效果；2003 年是 2001—2005 年快速增中时期中的亮点。



*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以百分点计算，被相加来得出小计及总计的增长数额。关于整个支出帐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见第二章中的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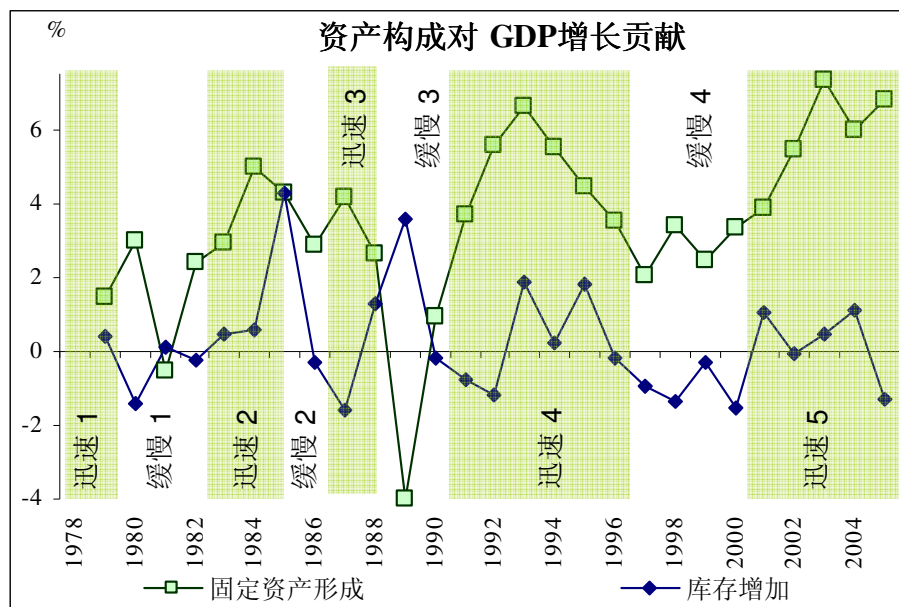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及计算。采用 Keidel 2001 的方法。

更加概括的是，2000年后，在所有商品及服务上人均产量及消费在继续快速增长，显示问题并不是国民物质满足最大化所带来的“剩余”问题而是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引起的有效需求匮乏。造成如此缓慢的销售和低档货物存货积压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较低的农村需求。这一可能性将在下面进行讨论（见图4-17）。

对1997-2000年间慢速增长的第三类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导向的解释明显得到统计学证据的支持。但是，分析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什么造成了增长的减缓，第二个是之后几年是什么维持了增长的缓慢？似乎有意识的政策明显不是使缓慢期坚持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图 4-15. 资本构成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投资（也叫资本构成）有两个部分，但是中国经济中的非市场力量会让它们变得难以理解。一个似乎代表了投资增长超过产出需求的图形结合了快速的固定资产增长以及之后的存活大幅增加。这是 1992 至 95 的图形。2004 年后，存活的减少也反映了净出口的激增。



*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以百分点计算，被相加来得出小计及总计的增长数额。关于整个支出帐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见第二章中的图 2-2。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及计算。采用 Keidel 2001 的方法。

在审视初始阶段的减速时，1997年中明显变慢的投资增长所扮演的角色需要得到关注。中国官方在1993年就开始奋力紧缩经济。真正的投资增长率从1993年的24%稳步下跌到1996年的11%，并于1997年跌倒更低的7%（第二章，图2-2及图4-12）。按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图4-14确定了投资从1993年到1997年一直在稳步、剧烈的下跌。这一政策的成功也在通货膨胀记录中反映了出来：消费物价指数减慢并在1997年中期低于5%（第二章，图2-3）。

两个互有关联的趋势共同导致了投资的下跌。首先，流通中货币（按购买力调整后）的实际增长在1994-96年间跌至零点（图4-9）但是却在1997年反常地回复（见图4-18）。显然，减速开始前的货币政策紧缩严重削弱了经济流动性的增长。

其次，实际利率水平（也就是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利率水平）从1994年及1995年初的零点升高到1996年的5%（见第三章，图3-7），之后暴涨到1997-98年间的大约10%。从1994年到1997-98年间真实利率如此重大的提高本身肯定对投资及消费两者都有着衰弱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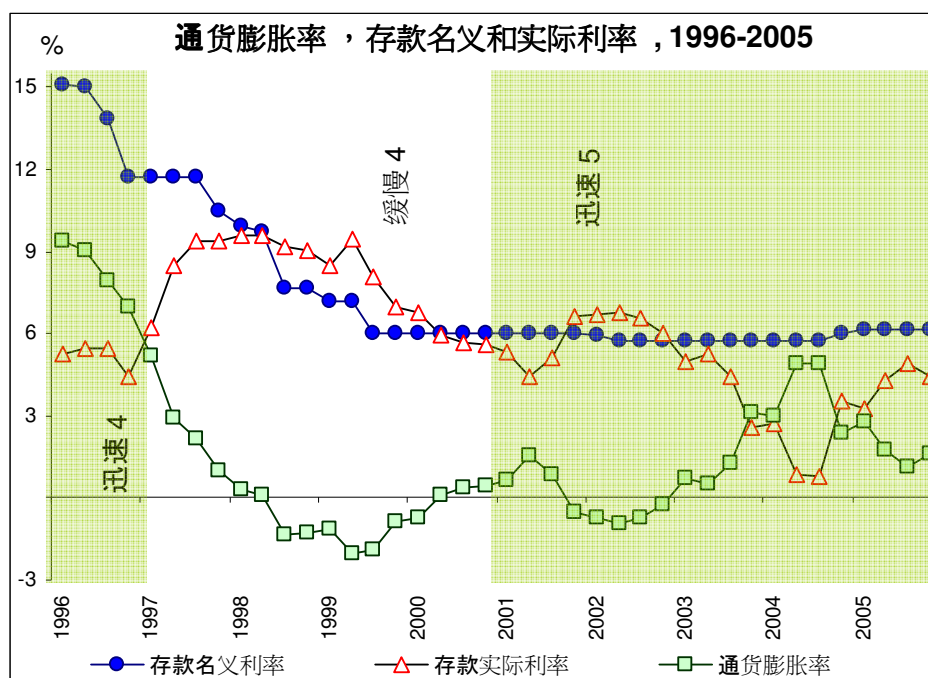
但是1997年后国内投资的持续下跌是否实这些政策有意的结果还不清楚，特别是当1996年中新的五年计划(five-year plan)的启动伴随着政府消费支出的重大提升(图

4-17)。

1997年中实际利率的跳升是一个相关案例。1996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官方政策理论上是用来降低票面利率的。但是由于这些下降过于缓慢的利率，不能和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持平。图4-16显示了利率水平的这个关系。中央银行利率时间表显示出银行贷款利率出现了相似节奏的下跌。再一次，尽管官方政策旨在降低利率如此高的真实利率意在阻碍投资借贷及存款取现。不论官方动机如何，利率下降的过慢的节奏延长了这一时期早期的紧缩政策，远远超出了政策转为刺激经济效果的时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看到与通货膨胀斗争的胜利带来了一段慢速发展时期，因为行政调整后的利率对此胜利反应过慢。

图 4-16. 1996-2005 季度存款真实利率

90年代后期，官方在1996至1999年间分多个阶段降低了存款（见图）及贷款利率，一开始难以匹配通货膨胀的下跌，造成了一段时期的高利率，持续到1999年下半年而且可能抑制了消费及投资。2000年后，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不规则地将真实利率降低到5%以下，特别是在2003—2004年中，威胁到了过热的银行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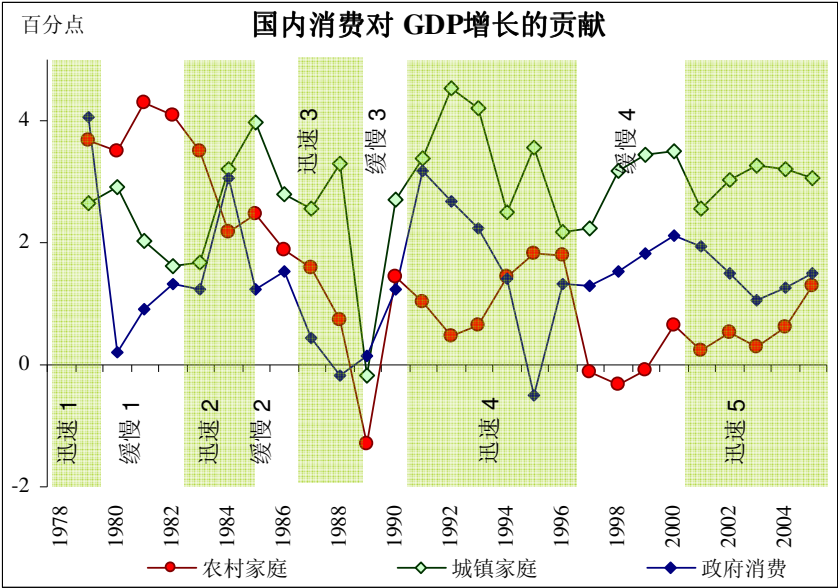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报告，多期，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利率基准表

高实际利率是否是在1997-98年间经济增长保持缓慢的唯一原因？反通货膨胀的政策结束并被这一时期的财政刺激所取代。官方政策全力刺激经济，并最终来抵抗通货紧缩。举例来说，除下降的票面利率之外，财政赤字在1999-2000年间的增长（图4-1）以及1996年开始并持续到2000年的政府消费刺激核实了刺激，宏观经济的官方政策。这一政策亦与1996-2000年间针对中国西部的五年计划中的“西进”（“Go West”）投资

优先权有所联系。因为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刺激经济的努力，使得1997-2000年间延长的增长加速，抛开拖拉的利率下调和先前“软着陆”计划的延迟影响，并不是有意识的官方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图 4-17. 城市、农村及政府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大贡献*

在中国的改革时代，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只有在 1984 年前以及 1996 年早期超过了城市消费增长。在 1997—2000 年的慢速增长时期，持续增长缓慢的最明显的原因就是 1997—99 三年间农村家庭消费的负增长。



*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以百分点计算，被相加来得出小计及总计的增长数额。关于整个支出帐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见第二章中的图 2-1。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6 及计算。采用 Keidel 2001 的方法。

对1997年中投资下跌的最后一个解释来自中国农村。之后的分析的主题—农村企业中一场自主的、由市场决定的投资崩溃也看似相关。这于农村家庭消费在1997-99三年中的绝对下跌有关。下面的图4-7的数据恰恰相反。这次崩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与之前时期城市食品价格通货膨胀，中国的国际粮食安全政策及前一时期农村经济内部的多维—农业与非农业—震动相关联。从图4-11中可以清楚看出对农场产品价格的冲击。

关于农村经济对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冲击问题将是本报告其余部分的重点。农村消费在这个慢速增长时期的下滑与城市消费的迅猛增长相比起来显得尤为惊人。尽管1997-2000年这段时期因城市严峻的劳动力改革而意义重大，其间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城市家庭消费取得相当的增长。这些改革造成的事业本应导致城市消费者需求减弱并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减缓，但是图4-17中数据显示出的结果恰恰相反。确实，城市失业补助方案及再就业培训提供了重要的收入补充和职业再培训的机会，这些似乎对城

市生活水平的贡献突出。对农村家庭则不存在这样的计划。

总体上，1991至2000年间的快慢交替周期是复杂的，因为尽管通常的改革及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似乎要为经济走向的改变负责，但是1991-96年间的快速增长时期持续了如此之久以至于使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同样的，1997-99年间的低弥时期程度之严重、延续时间之长使其不可能由1993-94年间的强烈的信贷削减及投资许可所造成的。我们将会在本报告的后面见到这一时期农村层面显出不同寻常的复杂及不规律的，特别是在粮食在农村收入中所扮演的角色上。

1997-2000年间这一慢速增长时期最有可能是由一系列国内因素的组合导致而成，这些因素包括低投资增长，高实际利率及农村经济困难的一些贡献。它并不是亚洲金融危机，“剩余经济”或有意的政府政策的产物。确实，政策失误可能是概括其成因的最好方法一票面利率降低过慢及农村事务处置失当。

下面的成因图表 4-8总结了相关的成因分析。

5. 2001-2005：非典型性肺炎 (SARS) 时期投资繁荣及出口激增

中国至今最后一个宏观经济周期，于2001年的强力增长恢复开始，到2007早期本报告开始撰写时仍在持续。此次扩张在2004年经历了政府的一次较小的降温措施，但是强劲的增长仍在继续，且至今为止中国的统计数据还未显示通货膨胀成为一个问题。因此，这个周期似乎还处于初期的、延长的快速增长阶段。

从2001年至今中国最近的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的时间的长度使得对其成因的分析更加令人感兴趣。随着这个扩张加速时期的延续，其开始时期的支配因素似乎逐渐被其他因素所补充。例如，周期开始之后，2003年中爆发的比预期要短的非典型性肺炎传染病及其导致的刺激投资的政策倡议，紧随其后的2004年中包括恢复粮食种植奖励机制的经济降温措施。此时期中晚时，对外贸易于2005年晚期开始的突起明显加强及提供了延续至今的重要的补充性增长刺激。

成因图表 4-9. 1997-2000 慢速时期的解释

总成因结论：政府的紧缩政策，追溯到 1993 年，无法有意地造成 1997 年的低投资水平，因为它们是不连续的。对增长下跌最好的解释是过慢的利率削减，其导致的高真实利率及低投资，农场价格及农村消费在 1997—99 年间的崩溃，以及作为次要因素的 1999 年的净出口疲软。政策与统计记录排除了其他的解释，如亚洲金融危机，“剩余经济”的出现，大规模城市工人下岗或政府在 1997—2000 年中的有意识的减速政策。

假设是否被验证？其所需的论据及数据是否有效？*	有效？	证实？
1. 亚洲金融危机是否造成了中国增长在 1997—2000 年的减速？		否
A. 出口是否在 1997 年增加，之后又小幅下滑并在 2000 年中稳定？	是	否
B. 净出口是否在 1997 年暴涨之后到 2000 年一直维持历史高点？	是	否
C. 净出口在 1999 年是否由于进口激增而下滑 1.5%？	是	是
D. 1999 年的进口激增/净出口下滑反映强劲的国内需求？	是	否
E. 1999 年的进口激增/净出口下滑反映放松的进口管制？	是	否
F. 1999 年的进口激增/净出口下滑反映亚洲竞争对手的真实贬值？	是	是
G. 存活增长是否在 1999 年持续 3 年下滑？	是	否
H. 外国直接投资占总投资份额是否严重下滑？	否	否
I. 外国直接投资的微弱下滑是否反映了政策改变先行于亚洲金融危机？	是	否
2. 1997-2000 年间增长减速是否反映了中国处于“剩余经济”的状态？		否
A. 多种商品的人均消费是否接近 OECD 的入门级别？	否	否
B. 所有商品的人均消费是否在 2000 年后继续快速增长？	是	否
3. 政府显而易见的减速政策是否导致了 1997 年的暴跌？		是
A. 政府是否在 1993 年大幅削减货币增长，信贷及投资？	是	是
B. 投资在 1994—97 年间对增长的贡献是否持续下滑？	是	是
C. 1997—2000 年间票面利率下滑是否过慢，尽管通货膨胀很低？	是	是
D. 较慢的增长及通货膨胀减弱政策是否是 1997 年的重点？	否	否
E. 货币增长是否在 1995—96 年间回到两位数字水平？	是	否
F. 政府在 1996 年的较高的消费是否曾经刺激经济？	是	否
4. 政府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减速政策是否延续了 1997—2000 年间的减速？		否
A. 政府在 1997 年后是否继续其减速政策？	否	否
B. 政府在这一时期是否施行（不成功地）刺激政策？	是	否
C. “西进”策略是否是刺激计划明显的一部分？	是	否
D. 政府消费的贡献是否在 1996 年暴涨并持续在高点？	是	否
E. 预算数据是否显示赤字作为刺激措施的一部分有所增长？	是	否
5. 城市企业改革及工人下岗是否造成了 1997—2000 年间的增长下跌？		否
A. 下岗计划是否包括重要的补偿及财务支持？	是	否
B. 调查数据是否显示出这个时期城市消费的健康增长？	是	否
C. 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是否显示城市增长 1997 年后维持在高点的增长贡献？	是	否
6. 农村收入及消费的减少能否解释增长下跌？		是
A. 国务院 1996 年出台的粮食责任制系统是否在寻求低价格？	是	是
B. 粮食种植面积及产出是否在 1996 年大幅增加？	是	是
C. 粮食价格是否在 1996—2000 年中大幅、稳定地下滑？	是	是
D. 所有农产品的价格指数是否比粮食的下跌更多？	是	是
E. 农村真实消费是否在 1997—99 年中持续 3 年下滑？	是	是
F. 农村无力的消费是否造成了乡镇企业投资的疲软？	是	是

注意：一个论据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仍然不能检验一条假设；同样，对相关论据的不成功的检验也有可能支持假设；这都决定于已知关系的逻辑。来源及解释：见正文。

对经济过热的威胁的及时处理，特别是对流通中现金增长的控制，避免了对严峻

的降温政策的使用。最后，全部这一时期都见证了中国提高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而不产生通货膨胀的能力。投资的如此高速的增长率自身就会推动经济增长。

表 4-9 - 2001-2005 快速增长时期

日期	政策及事件
2001	扭转通货紧缩性价格下滑的政策努力继续并加强
2001	北京加快改革来消除城市—农村双重公民系统
2001 晚秋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2-05	非法资本流入，投资于房地产，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
2003 春	非典型性肺炎危机引发了政府引导的金融、投资扩张
2003 秋	中央政府 要求 地方官员提高粮食产量
2004	农场产出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被行政提高
2004-05	政府全面的投资降温开始，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
2004-06	“新农村”运动来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农村
2005	废除农业税；农村费用废除改革完成

来源：作者的面谈，多份金融及经济报告。

与这一阶段成因相关的因素还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带动的出口需求的强劲增长及最终的净出口增长，显性的政府刺激，鼓励投资，政府赤字开支，持续保持刺激性的信贷及货币政策，以及允许农民进行粮食作物以外的经济作物的多样化种植临时性农村政策改变。

首先，2001-05年间的强势增长是否由出口引导？“出口引导型经济增长”（Export-led growth）是一个用来描述依靠出口来维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策略的短语。与其处在相反极端的对等物是“进口替代型”发展策略。图4-13显示的国内及国外需求的组合对国内生产总值做出的贡献使国外净需求直到2005年还仅是中国整体增长的一个可以忽略的次要贡献者的事实变得明显。甚至净出口在2004年后的强劲井喷也没有反映出出口增长加速而仅仅反映了一次与国内2004-05年间（图4-2）投资繁荣的降温政策相关的进口增长下滑。回顾此时期开始时出口的表现，图4-2揭示了事实上出口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1年—快速增长时期的第一年—中下滑，之后才在2002年开始稳定的出口增长爬升。

确实，中国的出口（及对应的进口）于2002年美国步入衰退期时开始的飞速增长是有意义的。一个出口引导型经济增长的解释，应该能够预期美国的衰退会引发中国经济增长的减慢而不是加速。但是真实情况恰恰与其相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1997-2000年的慢速增长时期对应着美国的互联网热潮，然而这次热潮并没有极大地提高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些观察联合起来排除了对中国2000年后扩张做出的出口引导型经济增长的解释。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否解释这一阶段增长的持续性？当然，众所周知的是这一阶段进出口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入世”带来的中国国内外贸相关的、国内及国外商业投资的增长。其中大部分是对需要在中国国内组装、完成后运往他国销售的原材料，零件及部件的进口。在此程度上，中国进口及出口浅显的增长并没有扮演与其表面相当的角色。不过，即使不考虑过港组装贸易，纯统计学证据也显示出口及净出口即使是影响此阶段增长井喷形成的因素之一，也是非主要因素。

考虑到中国在2004年后半年突然出现并持续到2005-06年的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更加难以排除之后贸易的促进增长的角色。尽管其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性比整体国内需求要小的多—4个百分点对国内需求的11个百分点（见图4-13）—它还是暗示了此次长久的经济扩张时期中的一个可能的新阶段。中国的出口部门，作为入世及其他因素影响的结果，会否成为之后几年中的主要增长动力？现在猜测还为时过早。中国整体的贸易体系及其贸易伙伴的体系中有太多层面仍在快速变革，使得对未来前景的理解异常困难。这些因素蕴涵的能量在未来几年里还不会被完全释放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当前这个高速增长时期的早期，贸易并不是一个主要的成因。

如果不是对外贸易，那会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当前的增长井喷呢？在这一时期的最初一年，2001年，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存活的增长。国内资本结构中的借贷在这一时期始终扮演着强大的角色，但是在2001年这大部分是由于其存货变动部分占总体国内生产总值的需求中所占的2.6个百分点所造成（见图4-15）。如果我们也单独考虑FDI那年的十分之六个百分点的增长额度，则源于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度提升为零（图4-12）。

因城市家庭消费增长在2001年的急剧下滑以及政府消费在2003年中的下滑（图4-17），在那段时期刚开始时，国内消费甚至还不如源于国内的投资增长更引人注目。因此，消费扮演的总体角色在前面的高速时期（1991-1996）一直低于其重要性，至少在2004-05年之前是这个样子。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农村家庭（消费）在那个时期的前期保持着弱势。到那段时期后期的2004-05年的时候，农村消费需求才开始复苏并体现出其重要性（图表4-17）。也因此在前面提到的缓慢时期（1997-2000），城市家庭主导着消费增长，导致城乡增长水平的不平衡。

我们必须总结出既不是国内消费需求也不是源于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催生了2001年的增长。相反，源于存货从降低到增长的逆转的强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占总体2.6个百分点）和FDI中的提升（0.6个百分点）在2001年形成了不常见的同盟。它们加在一起对于增长的提高在2001年中是3.2个百分点（解释了图4-14中资本结构的贡献在那年中的大涨）。在1985年和1993年的早期繁荣中，资本结构的真正贡献增长在2001年赶上了

同期的消费水平(图4-14)。

2001年的强势存货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提升是否有可能有联系呢? 最明显的假设是中国在2001年12月的等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鼓励了新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前面四年存货补给的衰竭(见图表4-15)。这条结论要求我们调整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评估。尽管贸易图形可以说是在刺激加速增长中担当不了什么重要角色, 但对于更高效生产的期待和总体的需求刺激了外国投资, 最重要的是增强了信心即便更多的产品会暂时成为存货, 但会很快销售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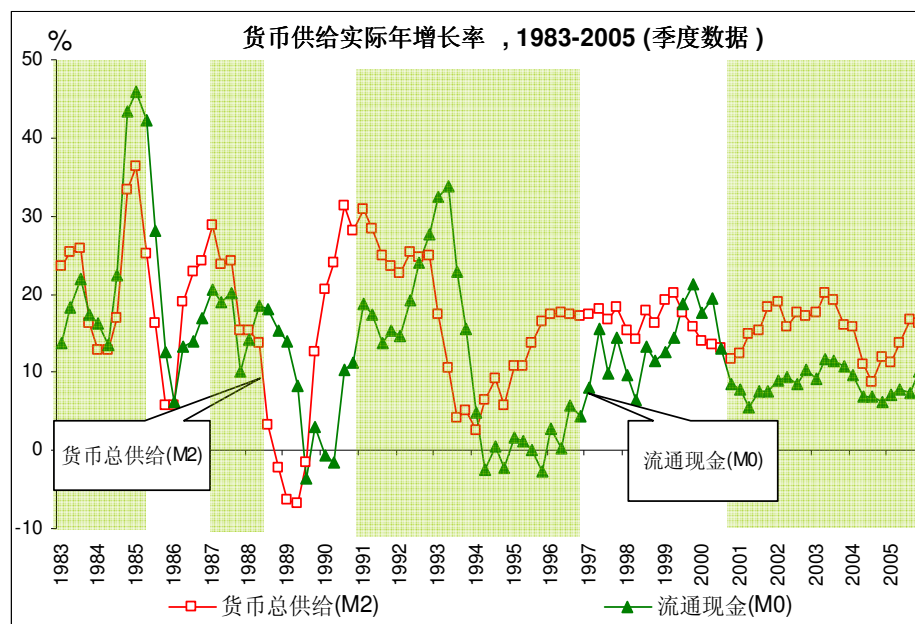
关于存货需求上涨的另一种解释是90年代后期政府颁布的关于重新刺激经济和抵抗通货紧缩压力的政策, 于2001年停止, 并通过劳动资本顺利流通进一步提高生产量。

货币政策和趋势支持关于2001年强势存货恢复的信用和货币政策方面的解释。货币扩张在2001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好几年。当1997年中以后通货膨胀接近零甚至有时为负时, 央行在1999年显著的调低了金融机构的利率, 从1997年的高于百分之十到低于百分之四。并在2003年进一步的调低到接近百分之三。在同时, 如我们所见, 其他产权利率也在逐渐的降低, 比如存款利率从1997年的高于百分之十到2002年的只高于百分之五(图4-16)。

尽管这些利率下调可能延长了1997-2000年间的缓慢增长时期, 它还是启动了2000年后一次比以往时期更加循序渐进的增长恢复。图4-13呈现了国内资本结构及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巨大贡献及其与净出口所提供的微小的贡献的对比, 显示了国内需求确实在1999-2000年间逐步加强的证据。

图 4-18. 1995-2005 总货币供给及流通中现金的季度增长

货币整体（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增长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出现大幅下滑，除去 1999—2000 年间流通中现金的一次短暂的上扬。流通中现金在最近的快速发展时期（2001—05）年中要比整体货币增长慢，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通货膨胀在这一整个时期被控制住。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财政年鉴，多年及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报告，多期。

图4-18中呈现货币供给数据为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流通中货币（M0）在1997-98年间再次开始非负增长。但是直到1999-2000年间，流通中货币才得到一次一次性的快速增长，其原因是储蓄利率出现了一系列下跌（在1999年6月中）中跌幅最大的一次下跌及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在1999年中的重大调整，给予了银行更多的自由来发放新的贷款（见图4-19）而且免除了工业及商业企业的繁重的偿债职责。图4-19显示银行各种借贷在1999年跳升到与1992-93年繁荣时期相等的水平。

真实货币增长在2001年后仍然继续保持适中，同时流通中货币的增长及其引发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都被控制在相对低点。因此，利率调整及货币供给控制都显示了温和、逐步的货币与流动性供给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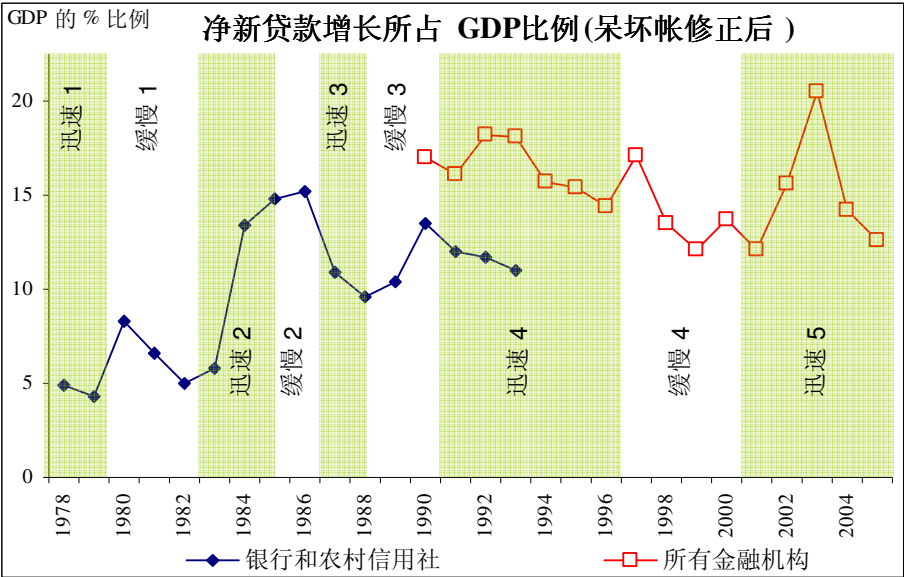
新贷款的走向也解释了借贷，作为政府在面对非典型性肺炎时对经济继续增长做出的鼓励，是如何在2003年激增到决策者认为是过度的水平。

2004-05年间非典型性肺炎过后的宏观紧缩将新借贷净额削减到比1990-97年间暴跌前期更低的水平。但同时国内生产总值却加速增长。银行贷款在2004-05年间剧烈减少的事实正像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在同样两年中超过40%一样，显示了银行贷款在资助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缩小。证券投资及未分配利润（中国统计学中称为“自筹资金”）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并且在2005年占了所有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相比

之下2001年只有53%。

图 4-19. 1980-2005 净新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净新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与中国快慢周期一同波动，虽然并不完全一致。自 1990 年以来的记录特别令人感兴趣。在 1997—2000 年间的的第一年中借贷保持强劲，并在 1999 年银行重组时再次高涨，之后两年稍稍放缓。非典型性肺炎爆发的 2003 年明显见证了过渡的借贷—被 2004—05 年的较慢的借贷快速取代。



注：新净贷款与 1998 年后年终借贷数据的统计不良贷款的转移引入了误差。这里的走势显示所有的金融机构都使用了中国人民银行所研究司统计。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财政年鉴，国家统计局，国内生产总值开销数据及金融机构贷款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多年。

尽管国外直接投资及存活增加说明了2001年中的增长，但是它们的影响到2002年即降到零点。代替它们的是源自国内的固定资本投资1.5%的增长以及净出口不到1%的增长，为国内生产总值的继续增长提供了动力。

因此在非典型性肺炎在2003年上半年爆发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形势仍然一片大好。为了对抗非典型性肺炎为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政府对投资进行了相当的刺激—政府迅速地控制住了病情爆发—甚至出现过度刺激。

成因图表 4-10. 2001-2005 年间快速时期的解释

总成因结论:

假设是否被验证? 其所需的论据及数据是否有效?*	有效?	证实?
1. 2001—05 年的增长是否为出口引导?		否
A. 净出口对国内生产宗旨增长的贡献是否知道 2004—05 仍可被忽略?	是	否
B. 在大幅增长开始时的 2001 年, 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是否下降?	是	否
C. 在 2002 年中国 经济 增长加速时美国是否步入了衰退期?	是	否
D. 国内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是否更大, 甚至是在 2004—05 年间?	是	否
E. 紧缩政策是否在 2004—05 年减缓进口, 造成净出口猛涨?	是	否
2. 我们能否肯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导致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否
A. 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是否在 2005 年突然暴涨?	是	是
B. 紧缩政策是否在 2004—05 年减缓进口, 造成净出口猛涨?	是	否
C. 现在是否为时过早, 中国贸易体系中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改变还不能全部显现出来?	是	否
D. 对这一时期来说, 新增的以加工为目的进口能否解释大部分出口增长?	是	否
3. 非国外直接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否对 2001 年的飞速增长有所贡献?		否
A. 非国外直接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在 2001 年是否没有变化?	是	否
4. 存货增加及外国直接投资的组合能否说明 2001 年的增长加速?		是
A. 2001 年存货增加是否导致了国民生产总值 2.1% 的增长?	是	是
B. 2001 年外国直接投资增加是否导致了民生产总值 0.6% 的增长?	是	是
C. 2001 年家庭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有所下降?	是	是
D. 2001 年政府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有所下降?	是	是
5.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否解释 2001 年存货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刺激的结合?		是
A. 中国在 2001 年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在 2001 年前期就成为定居?	是	是
B.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否提升了外国直接投资的盈利信心?	是	是
C.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否使投资敢于采购存货?	是	是
6. 货币及信贷政策能否解释 2001 年存货增长的刺激?		是
A. 扩张性的货币及利率政策开始于 1998 年早期?	是	是
B. 总货币增长是否在 1997—98 年间从个位数回复到两位数字?	是	是
C. 票面利率是否在 1996 至 2002 年间系统下降?	是	是
D. 1999 年六月利率大幅下落是否降低了真实利率?	是	是
E. 1999 年利率下滑是否造成了 1999—2000 年间流通中现金的增长?	是	是
F. 1999 年后, 金融机构的贷款是否只在 2001 和 2002 年激增?	是	否
7. 2000—2001 年间的粮食种植责任的放松能否解释增长暴涨?		否
A. 农民是否在 2001 年突然舍弃粮食开始多样化种植?	是	是
B. 粮食价格及所有农作物价格是否从 2004 年起显著改善?	否	否
C. 农村家庭消费增长是否在 2001—2002 年间大幅回复?	否	否

注: 一个论据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仍然不能检验一条假设; 同样, 对相关论据的不成功的检验也有可能支持假设; 这都决定于已知关系的逻辑。

来源及解释: 见正文。

当非典型性肺炎被迅速控制住后, 政府把工作的重心改变到了减缓投资上。这些旨在控制通货膨胀及对如房地产等过热部门进行降温的工作在 2004 年开始并持续到 200

6年后期。在之前的一个周期，如此的快慢时期组合中会出现更为剧烈的起起伏伏一而且会伴有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在2006年全年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增长，特别考虑到非法国外游资的涌入。不管用了什么手段，中国的经济成功地在2005年全年及之后维持了高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及微弱的通货膨胀。

最后，另一个与2000-2001年增长复苏明显相关的事实是粮食种植面积在2000开始减少。这一种植模式的改变直接跟随着允许农民进行非粮农作物多样化种植的政策决定。农民对此的敏捷反映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器，显示了在放弃其它更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而种植粮食上的官方压力所带来的财政负担。期望中的结果是更高的农场收入和消费水平。到2004-05年间，农村收入及消费图形的恢复终于出现在统计记录中（表4-17）。下一章中将会对这些因素做进一步介绍。

D. 结论

对中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的经济周期的快速分析确定了中国经济在不久以前还被经济循环所支配而且这些循环大多是国内政策动作及反应的结果。仍然伟见的是这些周期是否对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以及有哪些冲击在两个地区间传递。这里还存在农村经济循环影响了国家经济循环的可能性，部分是由于农村经济似乎有着某种内部动力，这种动力赋予了农村经济比国家循环接受者这个角色更加重要的角色。

第五章 宏观经济周期与农村经济

传统上，中国的农村经济被当作是分布在辽阔内陆的灵活自由的农耕经济，能够提供粮食、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来支持正规城市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更加仔细的观察表明，农村经济与中国更现代化的部门之间的关系比这要复杂的多。这种复杂性表现为，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呈现快速和慢速发展周期，农村经济与中国的其他经济部门相互作用和影响。本章的分析说明，中国农村经济所做的，不是仅仅被动地承受现代化经济部门扩张和痉挛所带来的冲击——它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那些痉挛。最突出的是，中国政府限制从外国进口粮食的政策，把农村经济置于不利的境地，造成农民收入降低，迫使大量农民工以更快的速度涌向城市。

A. 介绍——四个问题

本章的分析探究了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周期性的快速和慢速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和问题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农村经济是否拥有其独立的发展动力，在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或者，农村经济是否是更为现代化的城市经济的被动伙伴，仅限于满足城市对食物、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和慢速发展的某些阶段而非所有阶段，农村经济似乎形成了自己的增长和增收的方式，农村自身的需求促进了农村地区非农业商品和服务的产出。承认农村地区本身具备独立的经济发展能力，有助于正确评价农村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事实性问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交替的快速和慢速发展周期使农村经济比其他经济部门面临更多的困难么？通货膨胀、过度投资的经济高峰和增长缓慢、消费疲软的经济萧条，在中国农村比在中国城市更为严重么？答案是“是的”，通常是这样，但并不总是这样。此外，长期摇摆是一种更好的概括。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经济的发展时好时坏；到了9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再次得到迅速发展。而在其他时期，宏观经济的摇摆给农村带来了比城市更多的不利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国家、城市的政策和波动对农村经济的波动有多大的直接影响？答案是，这种影响很大。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物价政策的变化、信用放松和信用紧缩，以及城乡贸易间障碍的减少，都是国民经济的波动和相关政策影响农村经济的几种最明显的方式。

最后一个问题：农村经济是否独立地对国民经济产生了影响？答案同样是肯定的，但并不总是这样。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后期，农村经济对国

民经济产生了单独的影响。而在其他时期，农村经济只是跟随在影响中国其他经济领域的同样的结果和趋势之后。

B. 农村经济独立发展的动力

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共同解释了中国农村经济为何有时能发挥其独立性的经济动力这一问题。首先，是农村经济中粮食生产部门的波动。粮食——更准确地说，食物的原材料——在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生活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农村中的非农业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制造业和服务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农村的非农业经济——最初叫做乡镇企业（TVE）行为，已经以多种方式比整个国民经济更多地对市场和个人发出的信号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第三种趋势和上述两种农村经济的构成要素一样重要，并且看起来将逐渐占据这两者的上风，那就是农民在城市打工并把所得的报酬寄回家乡。这笔收入很快成为农村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更好的道路和更便捷的通讯大大地削弱了早些时候妨碍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近年来，这一新趋势让人们越来越难以把农村经济看作是与国家的其他经济领域完全割裂的存在。尽管存在这种趋势，但农村经济仍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未曾被利用的机会，来平衡和调整其经济扩张的结构和速度。

1. 中国的粮食周期——充满矛盾的起伏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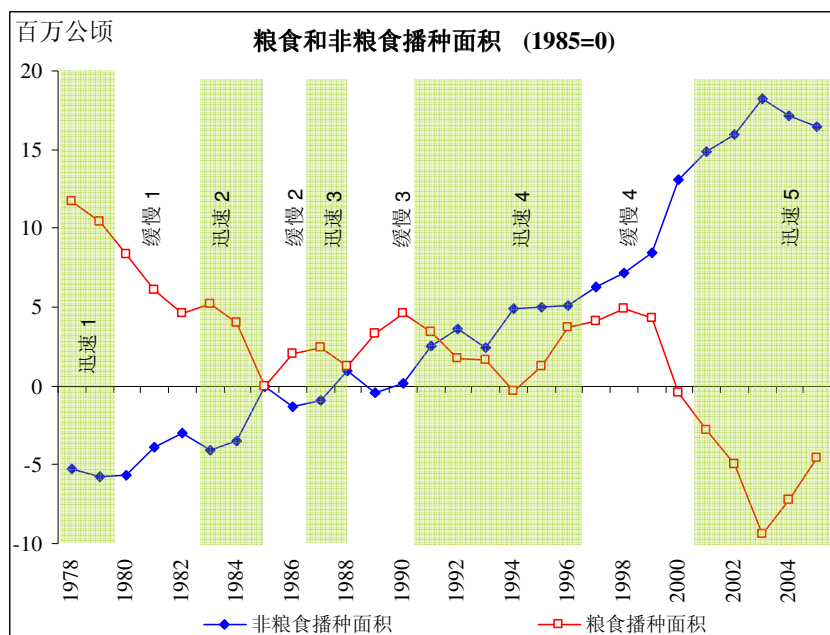
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包括国家安全的原因，中国的粮食经济在农业经济及其在中国的周期性宏观经济不稳定中扮演的角色，施加了有力但并不总是有利的影响。

如果把粮食价格维持在城市人口的食物预算可以接受的水平上，中国粮食产业的起伏和兴衰，反映了抵制粮食进口的国家政策和农民必须从粮食中获得的低收入之间的不断争战。

从经济学角度看来最好的一种选择，被中国官方拒绝了。这种选择允许中国从世界市场上大量进口粮食，让更多的中国农民选择经营其他多样化的、利润更高的产品，达到更好的生活标准。这种选择之所以遭到否定，是因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如同未来一些国际冲突中的应急计划——把国际社会实施制裁、停止粮食进口时中国可能承受的打击，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至少，有一种观点是这样认为的。也有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例如，中国政府关心的是，用宝贵的外汇来维持农村居民或“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而不是用它来发展现代化的经济部门。

图 5-1 与 1985 年种植面积有关的粮食种植周期

在得到政府的允许后，农民们开始从粮食种植转向其他农作物的种植——特别是在 1985 年、1988 年、1994 年和 2000 年至 2003 年间。当政府再次提出农民有种粮的责任和义务后，粮食种植面积又开始大大增加。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拒绝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最好的选择，坚持限制粮食的进口——这实际上会断绝国内的粮食来源，让中国大体上面临两个选择。首先，中国会允许国内的粮食价格上升到足够高的水平，使农民自觉自愿地种植足够多的粮食。这将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粮价偏高；需要增加城市居民的工资，以提供其粮食补贴；各种产品的价格相应升高；城市居民抱怨由此引发的大量通货膨胀。作为选择，中国也可以采取将施加压力和说服劝导结合起来的办法，以保证农民种植足够多的粮食，从而通过粮食高产来保持市场粮食价格的低水平，使城市的通货膨胀得以控制。然而，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是，农民的收入更低了——至少在那些官方指定的专门生产粮食的地区。后面这种方法是中国政府采取的基本粮食战略，但是它遇到了麻烦，因为它只能间断性地取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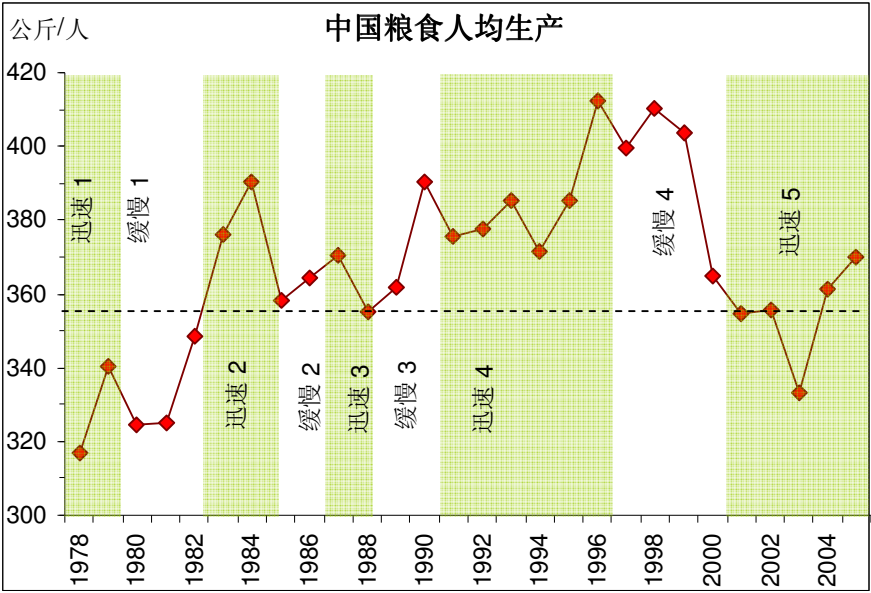
这种战略之所以陷入麻烦，是因为有些时候，当农民开始种植更多的粮食后，遇到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价格随即下跌，不足以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农村生活标准。在过去的25年中，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政府都要插手帮助农民，抬高粮食收购价格，对农民给予补贴，以便农民能够维持稳定的生活标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政府都要支付难以承受的高昂补贴费用。

当粮食收购补贴过于昂贵、粮食供应充足、粮价低廉时，政府开始松动它的“压

力加说服”战略。于是，农民转而种植其他农作物——有时候这种转移非常之快。然后，经过几年的时间，粮食产量开始收缩，粮价逐步回升。这时候，一个新的粮食种植周期就会重新开始。由于政府采取这种“时上时下”的鼓励种粮政策，从1982-1983年实行包产到户以取代人民公社以来，粮食种植的周期频繁更迭。在1986至1987年、1995至1996年和最近的2003至2004年间，这种周期都反复出现。图表5清楚地显示了由于政府的粮食政策发生变化而形成的粮食种植周期。随着1979年官方粮食价格上升，1982-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粮食种植面积逐渐比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有所减少。1983年至1984年，由于政府制定了以最高的价格收购农民超额上缴的余粮的政策，粮食收购价格趋于更高，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加之天公作美，粮食产量开始上升。但是，到了1984年底，政府的粮食收购站已经拿不出钱支付给农民了，许多收购站甚至被关闭了。这是政府第一次支付不起它的粮食生产激励金。

图 5-2 1978-2005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

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随图表 5-1 中的粮食种植面积的变化而波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 1978 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的宏观经济快速和慢速发展周期。在 1982 年人民公社解体后，快速周期最终经历了粮食低产，而慢速周期则以粮食高产为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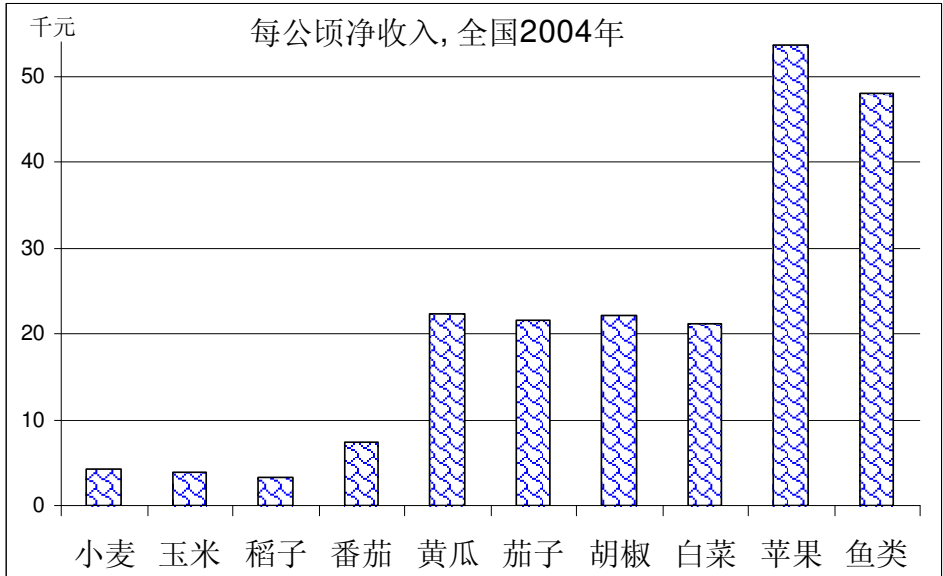
*注：1985 年的人均粮食产量是一个基准，因为当年的粮食产量水平受到了政治上的批评。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到了1984年，在某种程度上，城市人口已经没有能力承受更高的农产品价格了。在农村地区，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之为“难卖难买”时期。“难卖”是因为农民手中有许多粮食，但是粮食收购站却被关闭了——尽管它们有义务购买农民的粮食。“难买”是因为尽管农民手里握着许多现金，零售店里却没有消费者和生产者需要的商品，如衣服、

工具和其他在城市里生产、制造的日常生活用品。政府在1985年做出的反应是，降低农产品的保证价格（guaranteed farm prices），在新的“合同体制”下，让农民自己决定他们是否种植粮食。结果，粮食种植面积大量减少（见图表5-1中1984年至1985年粮食种植面积的变化，以及图表5-2中所显示的人均粮食产量）。在政府管制不严的其他时期——如1988年、1994年和2000至2003年，类似的从粮食种植转向其他农作物种植的情形也十分普遍。

图 5-3. 不同农产品的净收入（2004）

即使在政府的官方政策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价格的 2004 年，种植粮食的农田带给农民的回报也比种植其他从农作物的农田带给农民的回报要低的多。



*注：“收入”指的是家庭劳动收入加上扣除所有成本之后的利润——包括现金和以货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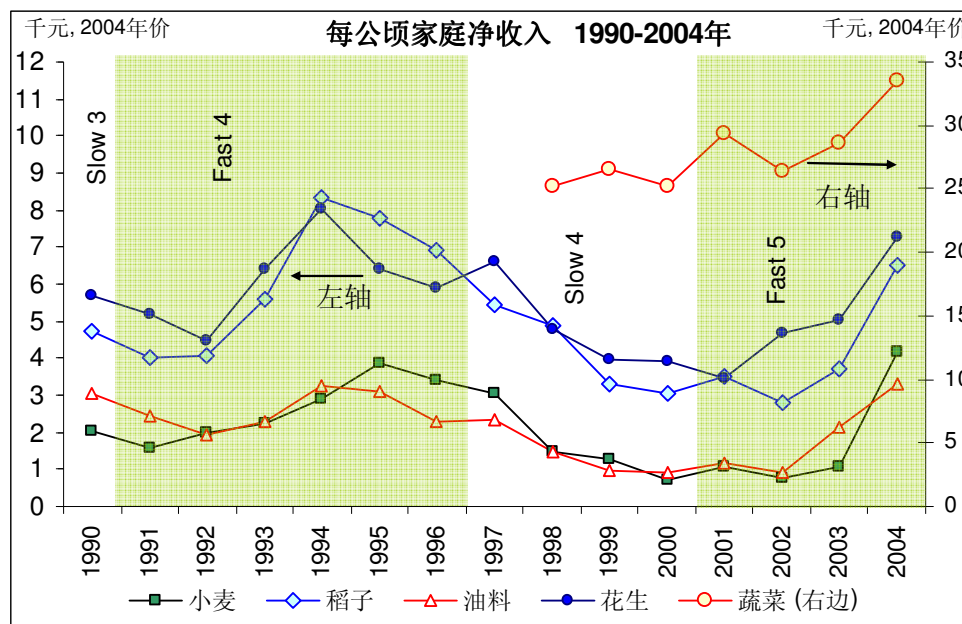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全国粮食、城市蔬菜、水果和渔业经营成本与收益（2004 年）（《2005 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6 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这种周期性变化对农民的收入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原因不难看出：种植粮食给农民带来的利润是十分微薄的，如果农民以适中而合理的工资来估价他们的劳动时间，其结果甚至是造成了损失⁵。从有关农产品的成本和销售收入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每公顷农田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差异。图表5-3和5-4显示，以单位农田面积计算，种植非粮食作物给农户带来的收入比种植粮食作物带来的收入高出4到10倍。要保持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必须大幅度提高向许多农民收购粮食的价格。

⁵ 这种观点是 2006 年夏天河南省某个主要种植粮食的县的一位农民向作者提出来的。

图 5-4 每公顷非粮食农产品的净收入（1990-2004）

多年来，把种植粮食的农田用来种植其他农作物的诱惑力一直很强。即使农产品价格（farm prices）上升，单位面积农田产出的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特别是蔬菜）的利润之差也仍然持续很大。



*注：“收入”指的是家庭劳动收入加上扣除所有成本之后的利润——包括现金和以货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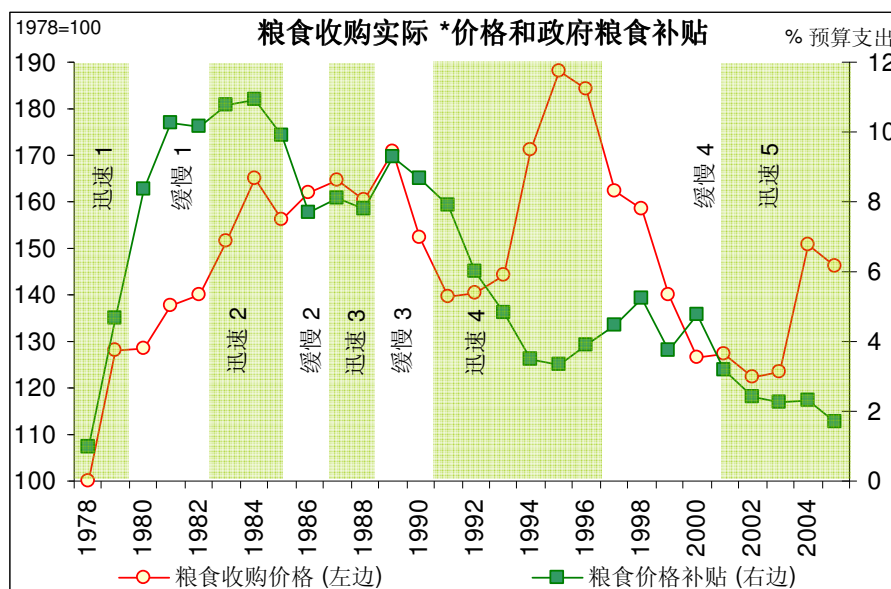
来源：同图表 5-3

回顾一年多来，在单位面积农田上种植不同农作物所产生的回报一直存在着差距。一直以来，中国的农作物价格经历了强烈的起伏和摇摆，但是，在恢复粮食种植和恢复其他农作物种植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关系。大多数争夺土地（如养鱼的池塘）的非粮食作物和产品都明显比粮食有利可图。图表5-4显示了不同农产品带来的持久的收入差异，证明了随着2004年粮食价格的上升，其他农作物的价格也在上升，两者带来的收益一直存在着差异。

图表5-5提供了有关政府粮食补贴态势的有限的证据，揭示出这种补贴在许多时候是何等的重要，特别是在1979年至1982年粮食收购价格上升之后。政府提供的粮食补贴，有助于使城市的粮食销售价格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随着粮食价格在行政干预下的飙升和1991年至1992年间粮食配给票（即粮票）的废除（见第四章的图表4-10），这种粮食补贴的需要明显降低了。

图 5-5. 政府预算的粮食价格补贴*趋势（1978-2005）

政府补贴在农村价格高的时候保持城市价格的水平，或者在市场价格低的时候维持农村价格。90 年代价格放开以后，各种补贴急剧下降。



*注：这里显示的补贴不包括 90 年代后期农业银行提供的支持采购的那些资金。
来源：价格——来自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价格数据；补贴——来自《中国财政年鉴》。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自 1996 年开始），政府一直强迫农民种植粮食，粮食产量居高不下，由此造成了粮食市场价格的大幅跌落（见图表 5-6 和第四章的图表 4-11）。这种情形导致政府采取了第二种粮食补贴政策，以补偿农民的经济损失，维持其收入水平。这次补贴在图表 5-5 中没有明显的显示——除了 1997 年至 1998 年间，显示了程度有限的补贴增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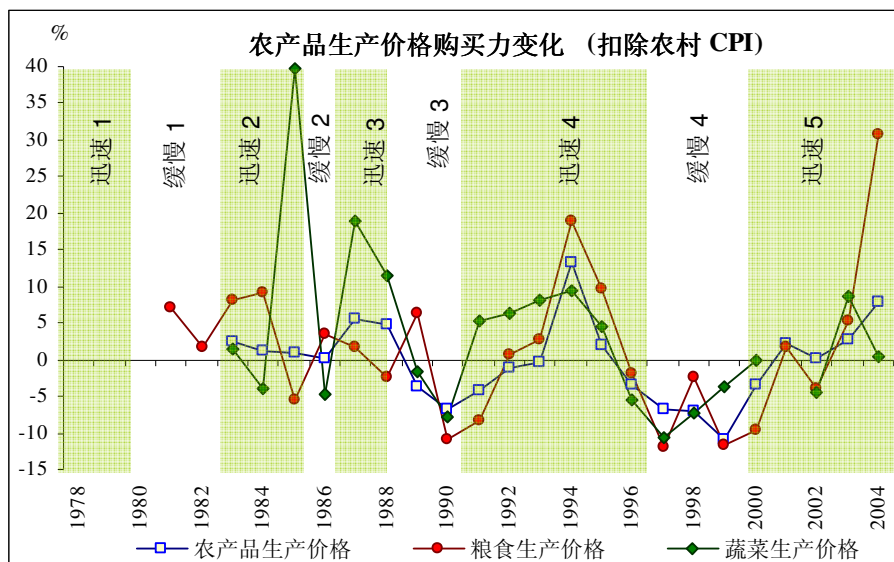
2004 年以前，粮价补贴的预算支出都是微不足道的。有关农村消费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 2001 年种粮面积减少，农民收入得以增加，但整个 2003 年，农村家庭的消费增长仍然保持低水平（见第 4 章图表 4-17）。当政府再次提出或强调 2004 农业年度种植粮食的要求时，它也抬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与此同时，政府还免除了农民的农业税和农民向地方政府缴纳的大部分费用。

免除这些农村税费相当于增加了政府对农村的补贴。这种财政支持不是通过增加支出，而是通过降低财政收入预算来提供的⁶。然而，税收减免并不只给那些与低收入抗争的专门种植粮食的地区（所谓“粮食基地”）的农民带来了好处，它让所有农民同时受益。结果，这些政策对一些农民的偏见并没有消除——主要是那些在偏远的、孤立

⁶ 2006 年 6 月，湖南省省会长沙市的统计官员向作者强调，用税收减免取代向农民支付农业补贴费用，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免农业税免除了征收这些赋税的相关费用和实际操作困难，同时避免了管理复杂的农村补贴计划的额外负担和费用。

图 5-6. 农产品价格的实际*变化 (1981-2004)

自 80 年代初期开始, 农产品价格持续变化。总的来说, 农作物价格在经济慢速发展周期下降, 在快速周期则回升。在 1997 年至 2000 年的慢速周期内, 农村价格全盘急剧下跌。



*注: 农产品名义收购价格由于消费者价格 (CPI) 对家庭购买力的影响而调整。

来源: 国家统计局消费者物价 (CPI) 和农产品价格数据

的、被“鼓励”多种粮食的地区的农民。

于是, 粮食产量和粮食种植政策以及农民的行为产生了它们自己的波动。有时候, 这种波动与城市和国家的宏观经济的快速和慢速周期直接相连。自从1978年以来, 城市和国家的快速发展周期——冒着过热的价格通货膨胀的风险, 特别是对粮食价格的格外关注——定期导致压力政策出台, 以“说服”农民耕种更多的粮食, 从而导致他们的收入降低, 消费增长速度降低——如果不是负增长的话。

2. 1978 年之后迅猛发展的非农业农村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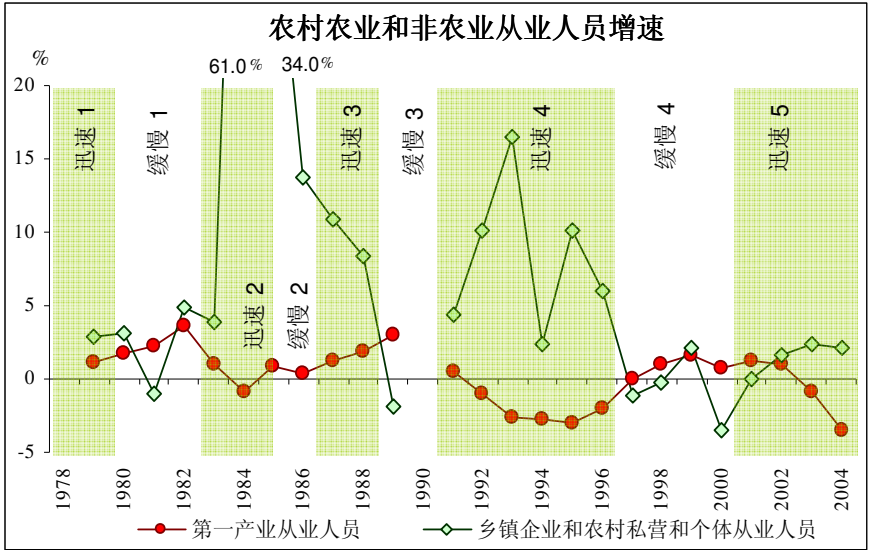
在中国农村, 与宏观经济的快速和慢速发展周期密切相连的第二个要素, 是农村制造业和其他非农产品生产业, 即官方所谓的乡镇企业 (TVE) 行为。农业部负责监管乡镇企业, 然而事实上, 这种经济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的范畴。甚至“镇”这个词本身就暗示着乡镇企业的许多生产设施是建在城镇里的, 其他的生产设施则建在发展良好但仍被官方划定为农村的大城市的郊区。尽管如此, 乡镇企业与农村经济的联系——最重要的是, 乡镇企业与农村劳动力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 农村劳动力占主导地位。几乎没有城市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官方提供的有关乡镇企业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1978年 (当时乡镇企业被称为“公社产业”) 至2005年, 乡镇企业增加值 (value added) 从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6%, 上升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⁷这个数字明显高于整个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5年, 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跌至12.6%。此外, 在国家宏观经济膨胀的周期内, 乡镇企业的增值产量水平会大幅

⁷ 《中国乡镇企业统计年鉴》, 2006 年, 北京: 农业部出版社。作者进行了计算。

提高；而在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慢速周期，其产量水平则会下降。

图 5-7 农村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

中国最大的经济部门（事实上就是农业部门）的就业，随着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速度发生了逆向的流动。在经济快速活动周期，农村就业人口急剧减少，非农就业人口显著上升。在经济慢速活动周期，非农就业则呈衰落的景象。



*注：1990 年人口普查之后进行的统计法修改，导致就业增长率统计的连续性被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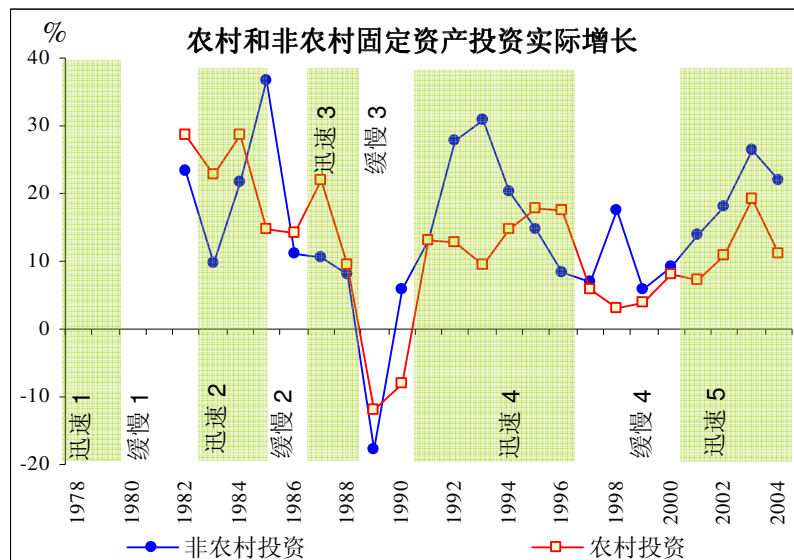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有关农村就业的数据证明了乡镇企业行为的周期性变化。图表5-7显示了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农村非农就业的扩增与农业劳动力的减少之间的对比。1990年之后，这种变化模式显得更为突出。总的说来，在1991年至1996年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农业就业人数呈下降的趋势，而乡镇企业和农村私人企业的就业人数则迅速增加。1996年之后，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减慢，农业就业人数重新开始回升；而在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工人的数量则变得很不稳定，并就总体而言呈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转变滞后了几年，2000年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得到恢复，农业就业趋势再次出现逆转。事实上，直到2003年，农业就业人数才再次下降。这揭示出农村劳动力对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增长和复苏的参与被大大地延迟了。

图表5-7所反映的劳动力就业趋势也显示了1991年至1996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周期内农村非农就业率的两次攀升。第一次非农就业的快速攀升与基于城市的快速增长是一致的。1993年下半年的信贷紧缩结束了这一轮的快速增长。1994年非农就业的减速似乎反映了这些影响。但是，尔后，1995年至1996年，农村非农就业再次激增，显然独立于较慢的经济增长对更正规的城市的影响。同时，农业就业也持续下滑。在1995至1996这些年头里，中国的农村经济释放出了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其他经济部门的活力。

图 5-8.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状况（1981-2004）

1991年至1996年，非农村投资（如：城市投资和外国投资）和农村投资呈不同步的变化态势。特别是在1994年至1996年，城市投资的增长明显减速，而农村投资的增长则加快了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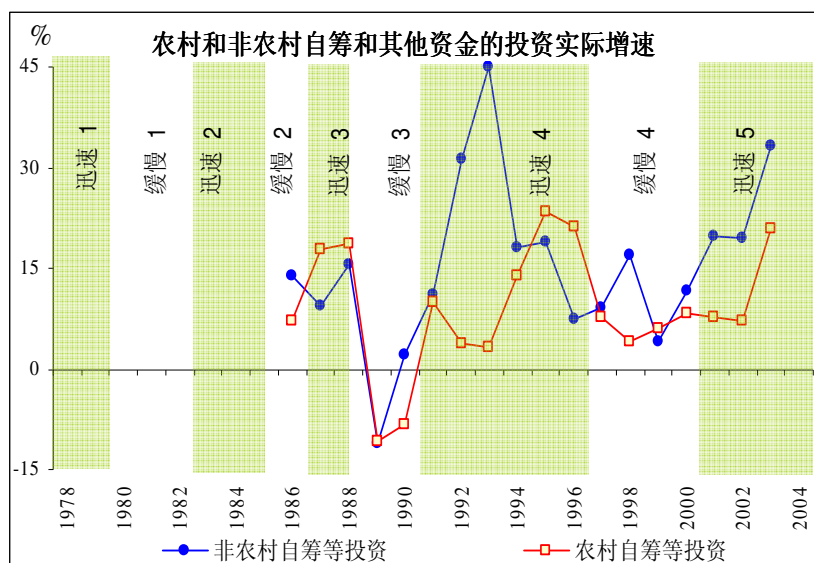
*注：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用国家投资价格缩减指数对两种投资系列进行了修正。
来源：国家统计局投资数据。

1994年至1996年间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也被证实呈暴涨的趋势，并没有与城市地区的投资趋势保持同步。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资金最大的组成部分，即所谓的“自筹资金”，都有明显增长。自筹资金主要是指投入资金和企业留存收益。图表5-8和5-9显示的趋势说明，尽管1993年的信用紧缩影响了对城市地区的经济投资，但它不仅没有影响到农村地区，而且相反，对农村地区的投资还马力十足地飞速上升。

图表5-8和5-9 反映的农村投资趋势，也反映了在1997年至2000年的经济慢速周期内，农村投资如何不受城市投资1998年的暂时成功的影响而出现暴跌。最后，这些数据还显示，农村投资反映了图表5-7中所显示的劳动力的流动趋势；农村投资直到2003年才恢复活力，融入目前的经济快速发展阶段。

图 5-9. 自筹资金给农村投资带来的实际*增长（1986-2003）

农村和非农村自筹资金投资增长趋势的对比，比图表 5-7 中展示的两者的总体增长趋势间的对比更加鲜明。1994 年至 1996 年农村自筹资金投资独立攀升的势头强劲。



*注：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用国家投资价格缩减指数进行了修正。

来源：同图 5-8。

3. 结论：中国的农村经济展示了自我维持的独立性

以上罗列的证据有力地表明，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农村经济证明了其独立地发生周期性的经济行为的潜力。这种行为不受传统的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即便这只是暂时的。

以上数据和第四章的数据分析说明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第一步把粮食价格的影响更紧密地与它们的国内市场价值和种植多种农作物的自由结合起来——每公顷非粮食农作物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这种宽松的环境与图表5-1种显示的1990年至1999年的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是一致的，与1991年至1992年继城市粮价改革后粮食和其他农作物价格的飙升（见图表5-6和第四章的图表4-11）也是一致的。

第二步把农村收入的增长转变为农村消费者对制造业商品和质量更高的农产品（如肉类和蔬菜）的需求。这种对农产品的更高需求增加了最初的第一步从农耕中获得的收入；对非农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增长，则扩大了超出农业范围的需求的增长。这种农村消费需求的影响与第四章图表4-17中反映的农村消费需求的明显上升是一致的。1994年至1996年，农村消费的增长达到了1980年代早期和中期实行最初的农村改革

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

农村自我激励模式的第三阶段反映了农民日益增长的对非农产品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即对家庭生活用品、加工食物、交通工具和娱乐这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长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生产和分配这些产品的农村企业的就业。这方面的因果关系与图表5-7中所显示的农村非农就业的增长是一致的。随着1994年至1996年农村消费增长的加速和达到高峰，1995年至1996年，农村就业出现第二次攀升。

最后，半独立的农村增长的第四步体现了农村企业对需求与销售的健康发展的反应。它们投资建厂，而这种投资又带来了新的建筑行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村的收入，并进一步引发农村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提高。图表5-8和5-9显示的1994年至1996年农村投资增长的规模、时间和构成，就是这种投资在发挥作用的证明。1994年至1996年，不仅农村投资上涨，而且其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自筹资金——是这种增长的主要来源。

因此，总的结论是，如果提供有利的初始价格和多样化的环境，即各种各样的经济催化剂（引爆药），农村经济有能力增强自己的发展，并在国家政策可能不想让它这样发展的时期，继续保持这种发展。农村经济拥有潜在的广泛的活力，如果很好地运用和操控这种活力，它将对保持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同样的道理，如果最初的有利条件不存在了——如同1996年那种情形，农村经济的自我激励的特性就会变成自我抑制的过程。限制农作物和其他产品的多样化，比如像在1995年至1996年那样，推行“粮食责任制”政策，对农村收入有双重的影响。首先，这些限制大大增加了粮食的供应量，导致市场粮食价格的下跌。其次，这种限制导致农田不能得到多样化的利用，以种植面向市场的、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

当农村处于呈螺旋形向下发展的阶段时，更少的农民收入的总体影响自然是弱化了农村家庭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并对农村的非农就业——最终对农村投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向下的螺旋形发展模式与1997年至2000年（甚至2002年）的经济慢速时期的农村价格、消费、就业和投资趋势是一致的。1995年至1996年，政府推行“粮食责任制”，对农民施加压力，迫使其把种植非粮食农作物的农田重新用来种植粮食，新的粮食种植模式最终转化为1996年末的粮食大丰收。1997年初，农村收入的影响第一次显现出来。1997年，农村家庭消费开始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此后一直到2000年以前，由于政府持续大规模地强制农民种植粮食，导致农村的收入和消费需求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一直被动地保持下降的态势。

中国农村经济的自我激励和自我抑制能力，对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周期和农村经济的变化周期之间关系是特别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过去几年来，农村经济显示出它

有能力扩大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刺激和政策效果。只有正确评价这种能力，才会对中国农村经济在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和速度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

C. 中国的周期性宏观经济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更大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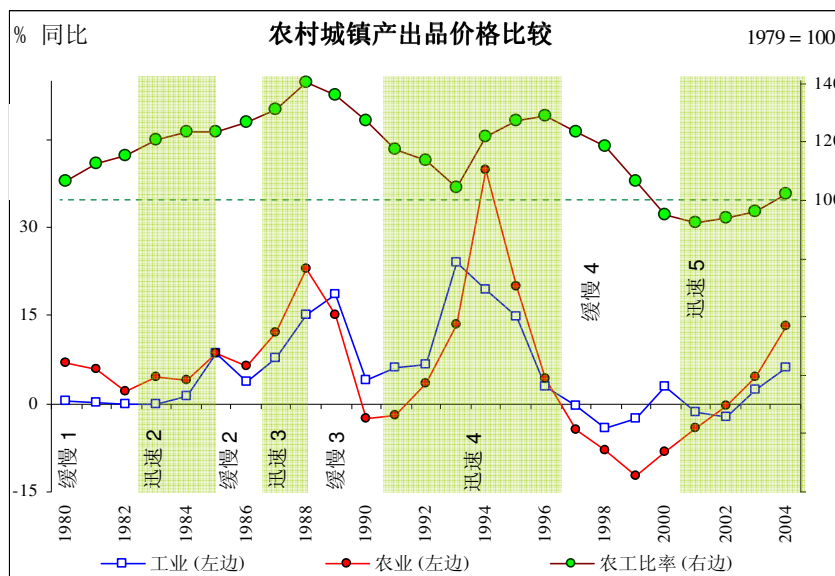
由于农村经济具有自我增强的挥发性，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价格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方面，中国的国家快速和慢速发展周期常常在农村地区比在城市地区经历更为坎坷。在经济周期性向下降时，尤其如此。而在经济周期性向升时，城市地区也通常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得到良好的发展。这种态势要求政策的制定者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无意之间对农村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些政策对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减少不平等和贫穷的努力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生产者价格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农村地区的传统农产品如何在经济周期的每个阶段比典型的部门的产品经历了更极端的变化。图表5-10展示了工业和农业部门总的产品代理价格索引。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顺利进行，每个重要的快速发展周期都会促使农产品的价格都比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得快；但是，每个慢速发展周期都会使农产品的价格比工业产品的价格下降得更慢，甚至把农业价格收缩得比工业价格更多。因此，在1984年至2004年的20年间，农业和工业的贸易价格比率呈强烈变化的态势。

图表5-10 显示，农产品对工业产品的购买力比率两次跌至谷底。第一次是在1989-1990 年为控制通货膨胀而放慢发展速度的时期。此后一直到1993 年，城市里爆发了通货膨胀。第二次发生在 90年代后期价格通货紧缩之后的几年里。在这两个时期，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价值降到了1980 年的水平。既然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贸易条件对城市和农村地区都适宜，那么，农产品价格的跌落又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双方的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一样的，但它导致的名义价格的变化——无论上升还是下降——对农村家庭比对工业公司的冲击要来的更加猛烈。因此，面值预算、管理和预期所需要的实时调整，对农村地区来说就更加困难。

图 5-10. 农村与城市贸易条件的波动（1980-2004）

农业和工业产品的价格以总体上相同的变化曲线飙升和下降，但是农产品价格上升和下降的幅度更大，使调整更加困难。



*注: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交货价格指数隐含在各自的 GDP 部门的实际和名义增长率中。
来源:国家统计局 GDP 生产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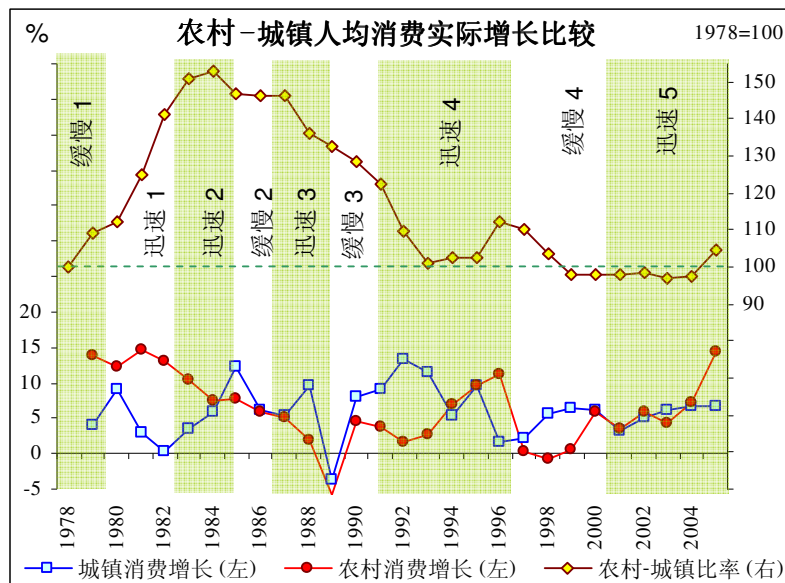
尽管产品价格数据显示，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和下降都呈现更激烈的态势，但其他索引没有就中国经济周期对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影响提供更为清晰的结论。例如，第二章的图表2-2中的城乡生活费用变化索引几乎没有反映通货膨胀给城市和农村家庭的日常购物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差异。这种模式的一个例外就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农村地区出现的所谓“周期性市场”的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

就最重要的与福利有关的变量——收入和消费而言，在经济慢速发展周期，农村经济面临着更为极端的体验，而城市地区则发展得较好。然而，在快速发展周期——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外，城市地区在总体上至少也和农村地区发展得一样好。因此，结论必然是，不是农村受到的冲击impact 在快速和慢速发展阶段更为极端，而是农村地区在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情况都不太好。

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90年代末期，这种不同的城乡消费实践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是，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图表5-11 清楚地显示，自80年代早期的改革时期到1999年，农村人均消费收益 (consumption gains) 一直十分微薄。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相比，农村的人均消费水平直到1999年才恢复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水平，并将这个水平一直保持到2004年。只是到了本研究跨越的时间段的最后，即2005年，农村家庭的消费才呈现出恢复的迹象。

图 5-11. 城市和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实际*增长

1984 年，农村消费水平相对于城市地区达到高峰，随后下跌，并于 1996 年和 2005 年再度回升。因此，随着 1985 年第一次打击通货膨胀的努力开始的宏观经济管理，与 2004 年加剧的农村与城市之间消费差距一致。



*注：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分别用相应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城市和农村消费量进行了修正。

来源：国家统计局 GDP 支出账目数据和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加之作者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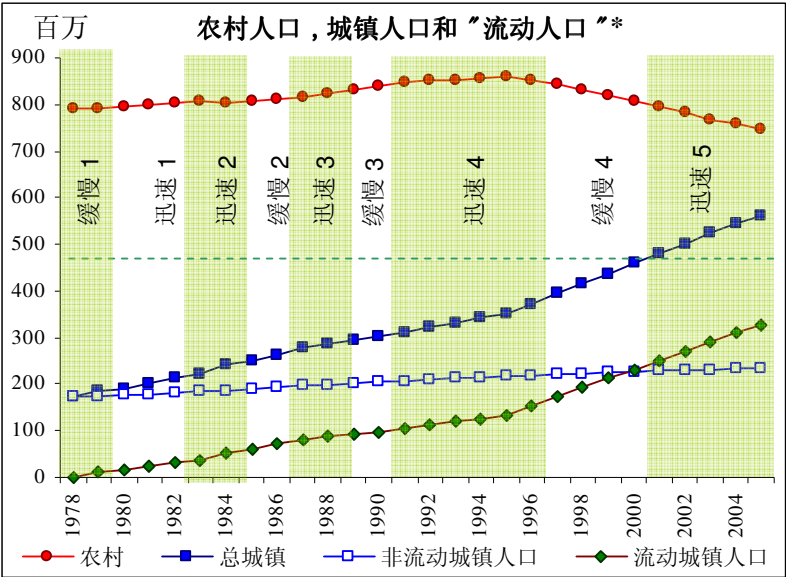
相对于城市消费水平而言降低的农村消费与经济活动的快速和慢速周期之间的联系，说明了有两种基本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其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周期内的通货膨胀增长。它增加了城市的收入，但在调整通货膨胀时延缓了农村消费的增长速度。第二个周期性的影响因素是，在经济慢速发展周期内政府重新强调的粮食种植政策——特别是在 1988 年至 1990 年和 1997 年至 1999 年之间。换句话说，在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和慢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记录都表现为对农村的消费行为造成了不利的影响。1996 年和 2005 年的情况是两个例外。1996 年，当城市的宏观经济发展减速时，农村经济自身的固有的动力为农村带来了收益。对 2005 年农村消费迅速增长的解释，包括政府对高粮价的支持，以及农村劳动力对正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的参与的持续增长。

的确，到 2005 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农村经济发展，也是最重要的农村经济发展之一。做一个最低的可能的估计，到 2005 年底，60% 的中国城市人口是在之前两年半（quarter decade）的时间里从农村地区移居到城市的。换句话说，在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口，最多只有 40% 的人口是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之时享受补贴的城市人口及其后代。2005 年，在总数为 5 亿 6 千万的城市人口中，有 3 亿多的人口原来是农村家庭的。图表 5-12 中显示的人口趋势表明了 1995 年之后农村人口的减少，以及到 2000 年时，中国城市人口中原本是农村人口的那部分如何超过了原本是

城市人口的那部分。

图 5-12. 中国城市人口中的移民大军

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的移居增加了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率，使之超出了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最保守的统计方法（见图后说明）显示，今天，超过 60% 的中国城市人口来自农村。这一事实突显了许多“农村”人目前居住在城镇，从而会影响到任何有关宏观经济波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的评估。



*注：这里所说的“移民”是一个事后回溯的概念，计算如下：姑且不论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执行不严而导致农村自然人口增长率更高这一有力的证据，如果假设原来的农村人口是按全国的人口增长比率增长的，那么据此计算的 2005 年农村人口和 2005 年实际的农村人口之间的差额意味着，有 3 亿多城市地区的人口来自中国的农村地区。

来源：国家统计局城市和农村人口统计资料，加之作者的计算

在分析城市-农村的差别时，中国城市人口中的“移民人口”（migrant urban）提出了重要的概念上的估测困难。移民人口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当我们评估经济政策和改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时，为了便于比较，3亿多目前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有农村背景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人群应该被看成是“农村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评估经济政策和改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时，把现有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进行比较，是没有分析的价值。的确，专门的和地方性调查得到的信息显示，在城市地区生活的农村移民的生活水准，远比他们仍然留守在农村地区的亲戚的生活水准高。如果经济改革和政策成为给3亿多农村人口提供城市生活标准的过程的一部分，那么，这显然给这些来自农村的人口带来了好处。

城市人口中的农村移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呢？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城市调查中移民的待遇一直在变化，所以中国的城市家庭调查设计得不好，无助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中国，从农村移居城市的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几乎肯定高于平均的农村生活水平，但是肯定达不到原来的城里人的家庭那么高的生活水准。大多数这类城市家庭保留着他

们作为城市的老居民所享有的重要利益。本报告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和相关政策的分析，必须包括对这三个层次的人口结构的评估。目前在城镇生活的来自农村的家庭所获得的利益是一个重要的显示器——尽管难以估测，但事实上揭示了中国的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如何帮助农村人口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总的来说，统计数据不支持这种观点，即在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快速和慢速阶段，中国的农村经济比城市经历了更多的困难。然而，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并且如果仅仅考虑到那部分依然生活在农村的人口，那么，就中国的农村经济和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来讲，实际情形更为糟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明显地把农村地区置于相比较城镇而言更加不利的境地。在许多方面，这种对农村的宏观经济政策偏见，是控制通货膨胀和刺激发展的实际努力在无意之中带来的后果。

D. 国家经济发展周期如何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周期？

第四章的分析认为，有相当多的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是政府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改革经济体制，刺激经济发展，控制通货膨胀和其他方面的过度增长。国际因素的作用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回顾第四章中分析的每一个周期阶段，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政策的措施步骤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周期都有影响。也就是说，在非常多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周期和造成这些周期的政策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周期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主要的结论已经在前面的论述中讨论过，就是中国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使中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为什么有这样的影响呢？无论是刺激政策还是紧缩政策，国家的宏观影响看来都是于城市人口有利而非有害的。

国家宏观经济趋势和政策对农村发展产生影响的首要例外情况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第四章引用证据表明，这一段时间，农村经济表现与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是相背的，只是到了最后，才屈服于它们的压倒性的影响。

总地来讲，国家经济力量对农村的影响在快速增长阶段和慢速增长阶段都是明显的。刺激快速增长的政策使城市得到不成比例的收益，而放慢发展的政策则是农村经济受到更大的伤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快速增长阶段，除了2004-2005年，银行存款增加，通常将款项贷给城市项目，特别是基础建设项目。同时，调整工资意味着弥补为了帮助减少改革的负效应而进行官方市场价格调整带来的代价——但这些补偿性调整只针对正式城镇职工。

在慢速增长阶段，宏观紧缩的一个重要方面通常是努力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粮食价格。这些措施在第一章内有所论述，经常被用来迫使农民种植更多的低收益

农作物，作为增加食品供应和控制价格增长的方法。此外，对城镇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纳入农村人口。这样，再就业培训补贴、失业保险以及最低收入保障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改革困境的安全阀，并没有覆盖到农村人口。

总之，无论是刺激措施还是紧缩措施，从本质上看，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都使城市人口受益更多，而在慢速阶段也对他们没有造成更多伤害。

只集中在对农村的影响来看，中国的宏观管理工具包括一套市场和行政手段。刺激农村本身经济发展周期的最重要的国家发展措施和政策是1979年进行的价格改革，1982年解散公社，1983年自由创办村办企业，1985年放开蔬菜销售，1987年以行政手段提高农副产品价格，1991-1992年市粮食价格改革，1994年行政确认较高的粮食收购价格，以及2004年再次以行政手段提升粮食收购价格。与这些时期相应的是逐渐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后来乃至整个家庭迁移到城镇或城市。第四章对这个发展历程和缘由做了详尽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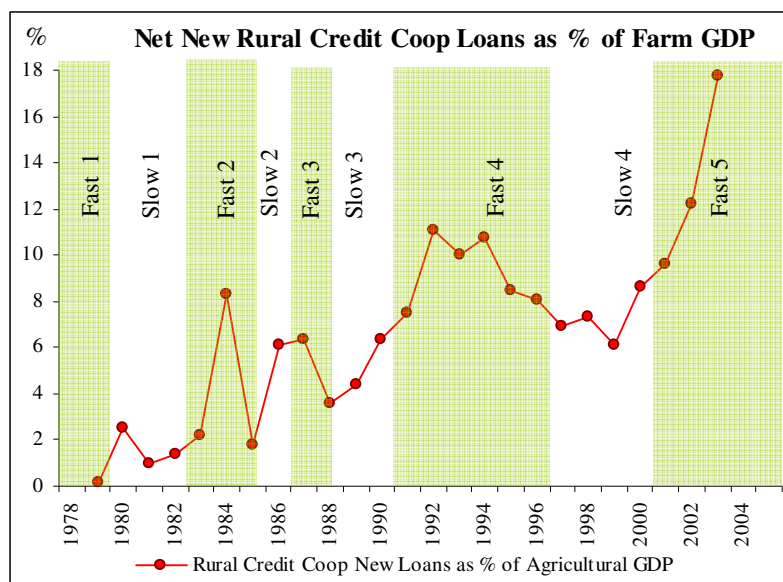
一个更多由经济发展决定而非行政干预农村生活的国家政策是货币和信贷政策。很多农村家庭将储蓄存入国家银行，所以第三章论述的关于利率政策的巨大调整也适用于很多农村家庭。至于贷款，第四章概括了国家信贷流动的变化（参见图 4-19），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放慢时段新增净贷款额占GDP的比例，例如1981-1982年和1988-89年；或者在冷却过热的经济发展时，如1994-1996年和2004-2005年。这些信贷方面的变化也对农村有自身产生的影响。

在农村，很多信贷办理是由地方控制，而且不正规，但国家的政策以农村信用社的形式强烈地体现出来。农村信用社增加更多的贷款或召回更多的旧贷款都体现在表5-13的新净借款走势图中，例如1984年，1986-87年，1991-92年和 2000-2001年。

国家在1985年和1989年突然实行的信贷紧缩政策在农村也感受特别强烈。而另一方面，国家1993年实行的更严格的紧缩政策却直到1995年才在农村信用社的借贷中体现出来整整滞后了两年。即便在这个时候，国家信贷紧缩政策直到1997年还没有放缓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与以上和第四章的分析是一致的，1994-1996年是农村经济发展呈现非同寻常的独立性的时期。而且放开高粮价和多样化经营模式为消费和投资都提供了独立的资金。

图 5-13. 农村信用社新增净贷款，1979-2003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正式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新增加净借款严重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努力冷却国民经济发展期间，例如 1985 年，1988 年和 1997-1999 年，其借款呈陡然下降趋势。相反，国家采取刺激或放松政策期间，也刺激农村信贷的增长，例如 1984 年，1986-1987 年，1991-1992 年，以及 2001-2002 年。



*注：新净贷款是根据年末贷款余额变化的统计数据而计算的。由于政府在 2004 年突然加快了从农村信用社到农业合作商业银行转变过程，使得 2003 年以后的这一数据的可靠性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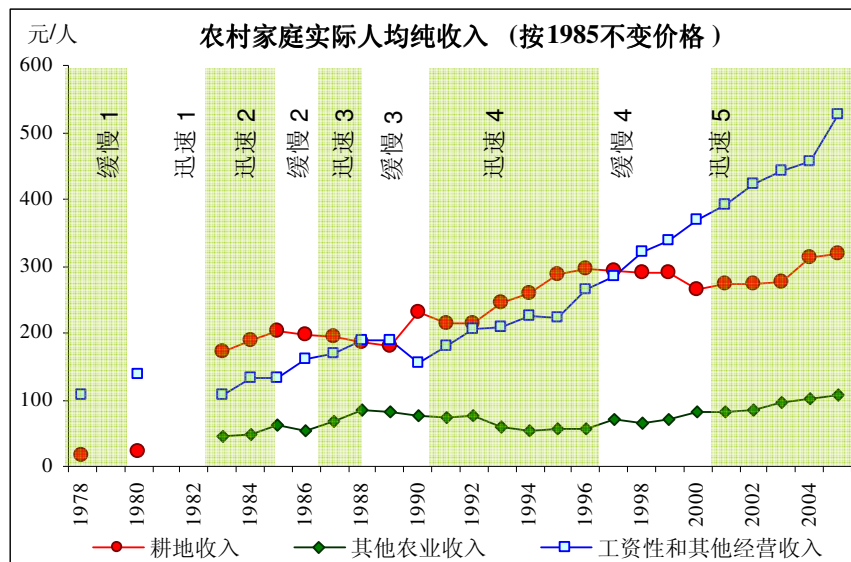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各年。

最后，对于国家如何影响农村经济波动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明显了，也就是，除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几个特例之外，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不过，最后一点值得关注。国家经济波动周期对农村经济的实际长期影响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脱离农业劳动，被非农业部门雇佣。不仅很多家庭迁移到城镇，而且那些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家庭日益依靠农民工带回的工资和其他非农部门的收入来维持生活。这种模式在表5-14中明显地体现出来。2004年，由于粮食价格提高带来的净收入增加非常明显，但与增长更多的非农收入相比，黯然失色。因此，以农村经济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进行分析固然意义重大，非常重要，但是，农民工流动和非农收入却是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

图 5-14. 农村家庭收入 - 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来源

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在内, 与工资和其他非农业收入相比, 以农业为来源(无论是农作物还是非农作物)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微不足道。这种趋势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农产品价格和整体农村消费大幅下降时表现最为明显。



*注：城镇和农村消费已根据相应的通货膨胀指数扣除了价格因素。1983 年以前, 中国农村是由人民公社组成的. 无论种地与否, 人们的主要的劳动报酬是工资。因此, 那些年的数据与 1983 年开始的家庭承包种植的调查统计数据无法比较. 另外, 1990 年风调雨顺使得农作物收入异常的高。随后, 1991 年则遇大旱。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按支出法计算的数据和农村住户调查报告, 各年数据。

E. 农村经济发展周期如何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周期？

本章讨论的是, 在一些周期内, 特别是 1994-2000 年, 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在这个以及其他时期, 农村经济作为一个影响国家宏观经济周期表现的独立因素, 其影响有多大呢? 第四章的原因探析认为, 一般来讲, 农村经济在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中是被动的参与者。其中的例外只出现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当农村投资帮助提高国家建材价格时, 以及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当农村经济在整个 GDP 需求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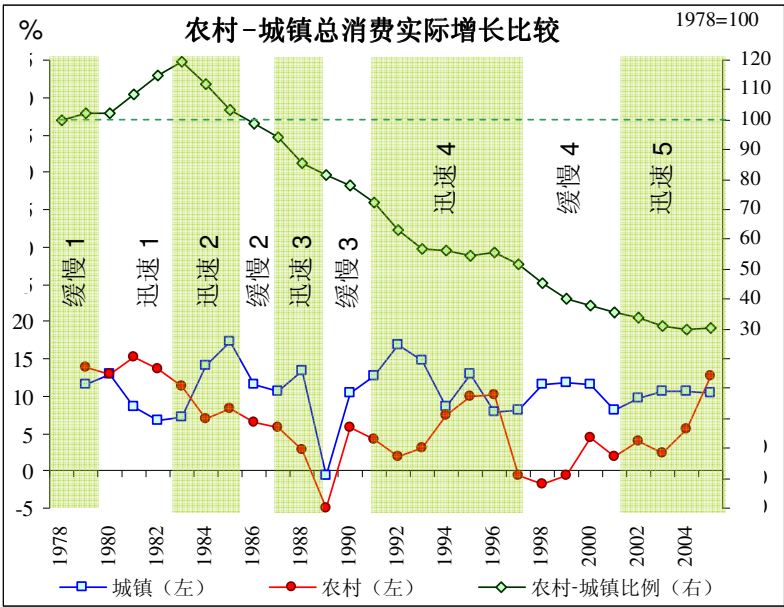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的现象, 也就是农村需求如何推动了木材、玻璃、砖材和水泥的城市价格, 让人们说起来, 就像传闻一样。而 90 年代就有清楚的统计了。1994-1996 年农村消费的强劲增长平衡了政府和城市消费增长的疲软 (参见表 4-17)。本章的表 5-8 和 5-9 也清楚地表明, 乡镇企业和住宅投资正是在 1995-1996 年政府和城市投资大幅下降时, 开始增长。

从 20 年来虚弱的农村家庭消费需求产生的恶劣影响来看, 表 5-15 中显示, 1997 年开始的需求加速下降是农村经济周期对国家经济周期产生的第二个影响, 不过, 这次影响是负面的。实际上, 第四章已经得出结论, 认为农村收入和消费状况的恶化最 1997-

1999年GDP增长的下降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农村消费需求的长期下降是因为农村人口的下降，但是80年代后期消费需求的虚弱以及1997-1999年彻底崩溃表明，当考虑到什么政策应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恶化负责时，认为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起重要作用的。那么，整个国家经济的下滑则难逃其咎。

图 5-15. 城市和农村*家庭消费实际增长

1997-2003 年农村人均消费的虚弱和人口的下降强化了农村消费在整个 GDP 中的重要作用。80 年代中期，农村消费占国民总体消费的一半以上，而到 2003 年，下降为不到三分之一。2005 年的数据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的复苏，这一下滑趋势可望得到制止。



*注：城镇和农村消费已根据相应的通货膨胀指数扣除了价格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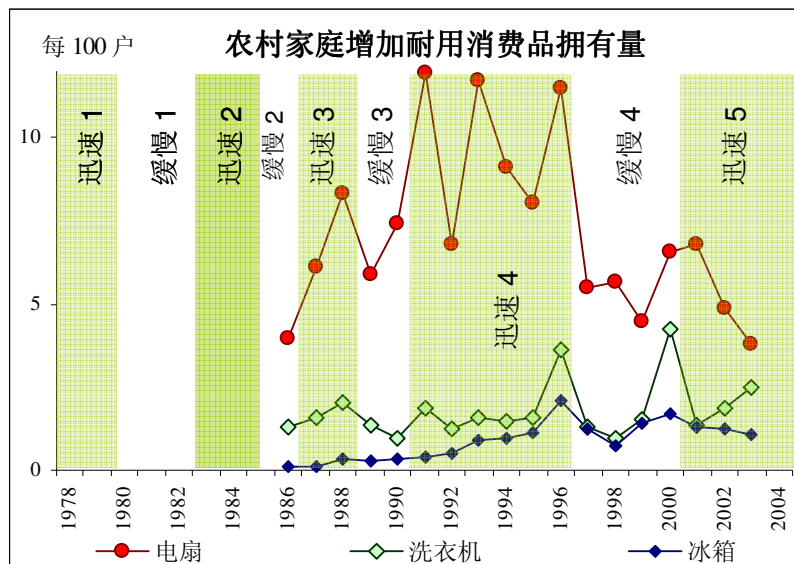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按支出法计算的数据和农村住户调查报告数据，及作者自算结果。

附录的农村家庭耐用品购买力数据强调表明，1997-1999年农村消费的下降使这几年国家GDP需求的增长更加虚弱。农村对电扇、洗衣机和冰箱的需求表明农村家庭和城市制造业销售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电扇算不上外国货，但是冰箱却是奢侈品购买能力地位的标志。表5-16中的统计趋势图表明，在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些家用电器的家庭净购买力也明显攀升，特别是在90年代后期。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分析的那样，是农村经济在支撑这个时期的国家经济增长率。

1997-1999年耐用品购买力对GDP增长放缓产生了影响，这与1994-1996年耐用品购买力对GDP快速增长的支持一样重要。表 5-1表明，农村对这三种耐用品的购买力在这几年里相当虚弱，也有助于解释第四章的分析中，这些产品库存量在这段时间增加的原因。

图 5-16. 农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的变化

90年代农村对耐用消费品购买力发生了由快到慢的变化。因为这些耐用品 大部分都是城市国有工厂生产的，所以这些需求的变化表明了时而具有独立性的农村经济与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之间有一种直接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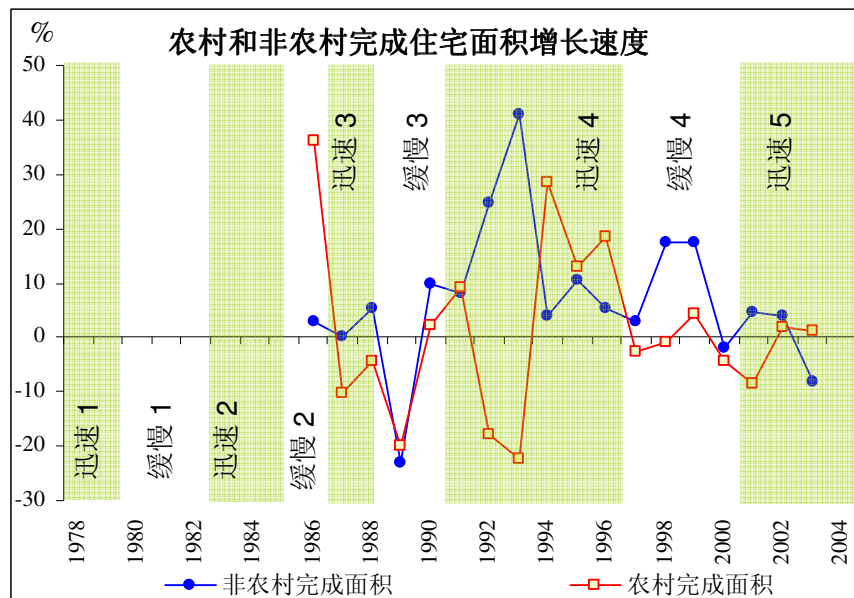
*注：
来源：

农村经济对国家宏观经济产生影响的第二个具体例子是农村住宅投资。第四章中，对1991-2000年间GDP增长变化的分析突出了资本构成，特别是固定资本投资的重要作用。（参见表 4-14 和 4-15）。本章开始列出的表 5-8和 5-9强调了农村投资的作用，特别是自筹资金（积蓄和分配收入）的作用，以及当城市投资受到信贷紧缩的压力而停滞时，这两中投资如何急剧增长。

对农村住宅竣工的数据使上述同期内的发展趋势得到补充，更加全面。在1994-1996年间，如表5-17呈现的那样，农村住宅竣工出现了少有的增长。与其他时期的既有数据相比，农村住宅竣工率在这三年里呈两位数增长是一个突出的例外。正因为增长太快了，1997-1998年，农村住宅竣工量停止增长，而且后来也没有恢复，甚至到2003年还是如此。农村住宅建设用的建材，例如砖瓦大多经常由农村自产，而窗户玻璃、电线、铅管和其他一些硬件，则越来越多地来自城市国有企业。

图 5-17. 农村和城市住宅竣工率

在 1994-2000 年国家经济从快到慢的周期发展中，农村住宅竣工是农村经济发挥独立影响的另一个渠道。在 1994-1996 年努力放缓经济发展期间，农村住宅竣工率快速上升，然后在 1997-2001 年间又迅速下降，尽管这段时间国家采取措施努力恢复整体国内生产需求。



*注：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和农村住户调查。

对农村经济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周期的均衡评估必须得出的结论是，在大多数时期，农村经济对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反应是被动的，没有明显的独立影响。但是，在90年代从快到慢的发展周期中，根据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宏观经济的独立性，进而对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产生一种独立的刺激作用。

这个结论是重要的，主要在于可以用来证明农村经济是否具有潜力，主要是未实现的潜力，来平衡和补充城市需求，推动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健康增长，也就是以一种使国际市场带来的不稳定性最小化，同时提高农村生活水平，进而可能促进劳动力和生产利润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方式增长。

相反，如果无法认识到农村在平衡中国GDP增长中的作用所具有的潜力，那么，结果可以造成，而且已经造成一些无意识的后果，采取突然措施对宏观经济的过分波动进行控制。本章的研究已经表明，如果不是受到农村经济的意外波动的影响，9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这些来自农村经济的波动接着又反映了粮食种植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乡镇企业的影响扩大。中国2004年最新采取的强制种植粮食政策表明，农村经济不稳定之后的同一战略仍然是中国宏观经济决策者采取的标准措施。

参考书目

布劳尔，2004年。韦基·布劳尔（Vicki Brower），“将病毒与癌症联系起来：研究是如何从关联走向因果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学刊》，第96卷第4册，第 256-257页，2004年2月18日(DOI: 10.1093/jnci/96.4.256)。http://jncicancerspectrum.oxfordjournals.org/cgi/content/full/jnci;96/4/256

伊特韦尔，1987年。约翰·伊特韦尔（John Eatwell）等人编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有限公司。

葛兰杰（C.W. J. Granger），1987年。葛兰杰，“因果推论”，见伊特韦尔，1987年，第380页。

勒罗伊，2004年。斯蒂芬·勒罗伊（Stephen F. LeRoy）“经济学中的因果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自然与社会科学哲学中心——因果律：形而上学与方法，技术报告20/04。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CPNSS/pdf/DP_withCover_Causality/CTR%2020-04-C.pdf

利维-弗尔，2006年。戴维·利维-弗尔（David Levy-Faur），“比较研究中的因果推论”，海法大学“比较方法”课程的在线学习材料。http://poli.haifa.ac.il/~levi/inference.html

尼德尔曼，2001年。罗伯特·尼德尔曼（Robert Needleman），“社会科学家如何验证因果关系”，斯波科博士公司，http://www.drspock.com/article/0,1510,5630,00.html

西蒙，1987年。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经济模型中的因果关系”，见伊特韦尔，1987年，第382页。

陈慕华，1986年；陈慕华等人编辑，中国金融年鉴（1986年），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译注：该年鉴于1986年创刊，1990年出英文版，1986年的主编是刘鸿儒，陈慕华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董辅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高，1992年。高尚全，“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见薛暮桥，1992年，第45页。

洪虎等编辑，“1994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见薛暮桥，1994，第37页。

李，2003年。李晓西，“2003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薛，1987年。薛暮桥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87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薛，1992年。薛暮桥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92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薛，1994年。薛暮桥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94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王丙乾,《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见《中国经济年鉴》编辑部、《经济管理》杂志出版社,《中国经济年鉴》(1991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第II-79到II-87页。

王,1987年;王松奇,“应当重视货币调节与经济成长问题的研究”,《中国金融》,1987年第10期,第32-34页。

大卫·休谟,“必然联系与因果关系的确定”,“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2002年: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hume/#Necessary>。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2006年中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文内“穆勒的经验主义:知识的相对性”一节里的“枚举与排除”的讨论。<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mill/>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年鉴》,各年份

中国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报告”各期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展望》,1998年,北京

中国财政部,中国财政年鉴 2003

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6 统计年鉴

中国经济咨询服务中心(香港),中国经济新闻,多期,1980—1985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多期

Keidel 2001. Albert Keidel, “China’s GDP Expenditure Accounts”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指出法账户 [China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2月), 2001

